

[美] 南希·弗雷泽 著 蓝江 译

Nancy Fraser

食人 资本主义



CANNIBAL
CAPITALISM

HOW OUR SYSTEM IS DEVOURING
DEMOCRACY, CARE, AND THE
PLANET—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食人资本主义

作者：南希·弗雷泽

译者：蓝江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04-01

ISBN：9787208180987

品牌方：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进行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版权申明

Cannibal Capitalism: How our System is Devouring Democracy,
Care, and the Planet—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by Author

Copyright © 2022 Verso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23 by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Verso

ALL RIGHTS RESERVED

献给罗宾·布莱克本和拉合尔·耶基
不可或缺的对话伙伴和挚友

致谢

在通常意义上，人们认为一本书是作者个人的劳动成果。但这种观点是有误导性的。每个作家都依赖于让其成书的前提条件——财政支持和图书馆、编辑的建议和研究上的帮助、同事的批评和灵感、朋友的鼓励，以及密友和家人的关怀。用后面正文中一个关键词来说，这些构成了作者身份的“隐秘场所”。当作者在前台秀场时，他们往往在幕后，但他们是一本书出版不可或缺的条件。没有他们，本书很难面世。

显然，一本从理论上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隐秘支撑的书，必须承认让其成为可能的基础。这些支撑有诸多形式，也有诸多来源。在机构方面，社会研究新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为我提供了一个十分灵活的教学安排，一年的休假，以及（最重要的）一个充满知识生机的环境。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在2017—2018年以罗斯家族杰出访问学者的名义接待了我，给予我第二个学术家园，这里有一流的图书馆、充裕的资金和成就斐然的同事。

其他几个研究机构也给了我宝贵的时间和共同的环境，使我得以推进本书的思想。热烈感谢裘德·布朗(Jude Browne)和剑桥大学性别研究中心；感谢米歇尔·维沃卡(Michel Wieviorka)和世界研究学院(Collège d'études mondiales)；感谢莱纳·福斯特(Rainer Forst)和法兰克福发展正义(Justitia Amplificata)高级研究中心以及巴德洪堡人文科学研究院(Forschungskolleg Humanwissenschaften)。感谢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和耶拿的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Friedrich-Schiller-Universität)的后增长社会研究小组，以及温弗莱

德·弗拉克(Winfried Fluck)、乌拉·哈塞勒斯坦因(Ulla Haselstein)、柏林的爱因斯坦基金会和柏林自由大学的JFK美国研究学院。

我自始至终都在依靠一群杰出的研究生助理的研究和友谊。我衷心感谢布莱尔·泰勒(Blair Taylor)、布莱恩·米尔斯坦(Brian Milstein)、梅内·伊尔迪里姆(Mine Yildirim)、梅拉·科塔(Mayra Cotta)、丹尼尔·博斯科夫-埃伦(Daniel Boscov-Ellen)、塔蒂亚娜·拉古诺·尼维斯(Tatiana Llaguno Nieves)、阿纳斯塔西娅·卡尔克(Anastasiia Kalk)和罗莎·马丁斯(Rosa Martins)。

一些杂志，特别是《新左派评论》和《批判历史研究》，给了我宝贵的机会，使我能够在他们的杂志上传播本书观点的早期版本，并得到一些反馈，帮助我完善这些观点。以下是我对他们和其他帮助发表过这些观点的人的具体感谢。

沃索出版社提供合作的编辑是我梦寐以求的杰西·金迪格(Jessie Kindig)，她的热情、创造力和处理文字的方式使一切变得与众不同。同样是在沃索，制作编辑丹尼尔·奥康纳(Daniel O'Connor)和复印编辑斯坦·史密斯(Stan Smith)将一份杂乱无章且经过大量修改的手稿变成了一套完整、干净的页面。在梅丽莎·韦斯(Melissa Weiss)的指导下，大卫·吉(David Gee)设计了一个十分亮眼的封面，既雅致又（我敢这么说）十分尖锐。

在这本书的背后，也有同事和朋友不可缺少的支持。我在个别章节的注释中感谢了他们中的一些人，他们的影响特别大。但也有一些人更广泛、长期地启发了我的思考。在这些坚定的同伴和对话伙伴中，我感谢辛西娅·艾露撒(Cinzia Arruzza)、巴奴·巴尔古(Banu Bargu)、塞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理查·J.伯恩斯坦(Richard J. Bernstein)、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克拉格·卡洪(Craig Calhoun)、迈克尔·道森(Michael Dawson)、杜肯·弗莱(Duncan Foley)、莱纳·弗斯特(Rainer Forst)、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大卫·哈维(David Harvey)、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约翰娜·奥克萨拉(Johanna Oksala)、安德雷阿斯·马尔姆(Andreas Malm)、珍妮·曼斯布里吉(Jane Mansbridge)、尚塔尔·墨

菲(Chantal Mouffe)、唐纳德·匹斯(Donald Pease), 还有后来的莫伊舍·普殊同(Moishe Postone)、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安托妮娅·苏勒斯(Antonia Soulez)、沃尔夫冈·斯特里克(Wolfgang Streeck)、康奈尔·韦斯特(Cornel West)、米歇尔·维弗奥尔卡(Michel Wieviorka)。

还有两个人, 这本书是献给他们的, 在写作过程中, 他们一直在我的思想和心里。我感谢罗宾·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 我一再依赖他的博学、洞见和仁慈; 感谢拉合尔·耶基(Rahel Jaeggi), 我真正的“对话”伙伴, 这里提出的许多想法最初是与她一起提出的, 后来又得到了发展。

最后, 还有艾礼·撒雷茨基(Eli Zaretsky), 他对这本书的支持是如此深入、多面和普遍, 以至于难以用一句话来表达感谢。我们只能说, 如果没有他探究的智慧、宽广的视野和持续的爱, 《食人资本主义》就不会存在。

这些章节的早期版本以前已经出版, 在此以修订版出现, 并已得到原出版商的许可。

第一章的早期版本于2014年2月7日作为2014年狄安娜·米德尔布鲁克(Diane Middlebrook)和卡尔·德杰拉西(Carl Djerassi)讲座主题在剑桥大学发表, 后来发表在《新左派评论》第86期(2014年), 标题为《在马克思的隐秘场所背后: 一种扩展版的资本主义概念》。它的论点经历了火的洗礼, 通过与拉合尔·耶基的挑战性讨论, 出版后变得更加强大, 其中许多内容都记录在我们合著的《资本主义》一书中。由布莱恩·米尔斯坦(Brian Milstein)编辑的《资本主义: 批评理论的对话》(Capitalism: A Conversation in Critical Theory, 将于2023年4月由沃索出版社重新出版)。再次感谢耶基的探究性智慧和热情洋溢的友谊。

第二章的早期版本于2018年1月5日在佐治亚州萨凡纳举行的美国哲学协会第114次东部分部会议上首次作为主席讲话发表, 后来在《美国哲学协会会议录和文集》第92卷(2018年)中以《资本主义是

否必然是种族主义的？》的名义发表。我感谢罗宾·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萨拉·查理(Sharad Chari)、拉合尔·耶基和艾礼·撒雷茨基对本章的有益评论，感谢丹尼尔·博斯科夫-艾伦(Daniel Boscov-Allen)的研究协助，尤其感谢迈克尔·道森(Michael Dawson)的启发和激励。

第三章的早期版本于2016年6月14日在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作为第三十八次年度马克·布洛赫讲座主题首次发表，后来在《新左派评论》第100期（2016年）以《资本主义与护理的矛盾》为题发表。其中许多论点是在与辛西娅·艾露撒和约翰娜·奥克萨拉的交谈中形成的，我对他们深表感谢。

第四章的早期版本于2021年5月4日在维也纳作为卡尔·波兰尼客座教授职位的就职演讲，题为《焚烧自然》。并在《新左派评论》第127期（2021年）上发表，题为《资本的气候：一种超环境的生态社会主义》。

第五章的早期版本首先发表在《批判性历史研究》第2卷（2015年），题为《合法化危机？论金融化资本主义的政治矛盾》，后来以德文出版，标题为《民主怎么了？克劳斯·多尔、南希·弗雷泽、斯蒂芬·勒塞尼希、哈特穆特·罗萨辩论》，由汉娜·科特雷(Hanna Ketterer)和卡丽娜·贝克（Karina Becker，编辑）出版（Suhrkamp Verlag,2019年）。

第六章的早期版本首先在2019年5月8日华盛顿大学举行的2019年所罗门·卡茨人文科学杰出讲座上发表，后来发表在《社会主义记录》第56卷《超越市场乌托邦：一种新的生活方式》（2019年）上，题为《社会主义在21世纪意味着什么？》。

序言

食人资本主义：我们被烤焦了吗？

这本书的读者并不需要我告诉他们，我们有大麻烦了。他们已经注意到，事实上，他们已经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受困于现实痛苦：沉重的债务、不稳定的工作和日薄西山的生计；不断减少的服务、摇摇欲坠的基础设施和日益加强的边界；种族化的暴力、致命的疫情、极端天气——政治功能失调笼罩着这，而这些功能失调让我们无法看到这些问题，也无法给出解决方案。这些都不是什么重大新闻，也无需我们在此赘述。

本书要对所有这些令人后怕的事情的根源进行深入探讨。本书诊断导致这些弊病的原因，并指出了罪恶的名字。“食人资本主义”是我对这一社会制度的称呼，正是这一制度让我们陷入这样的泥淖。为什么这个用词是恰当的？让我们看一下，构成它的词语都带有字母C。

“食人” (cannibalism)有几种意思。我们最熟悉的意思，也是最具体的意思，指的是人吃人肉的仪式。由于长期的种族主义历史，这个词的逻辑发生了倒置，应用于那些被欧洲帝国掠夺的非洲黑人身上。因此，在这种逻辑倒置中，将其用作资产阶级（这个组织）的描述词，会让人感到满足，本书将表明，这个群体以吃其他所有人为生。但这个词也有一个更抽象的含义，它抓住了关于我们社会的一个更深刻的真相。动词“食人” (to cannibalize)意味着剥夺一个机构或企业运作的基本要素，以创造或维持另一个机构或企业的运转。我们将看到，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与该系统非经济领域关系的一个合理领

地：与家庭和社区、定居点和生态系统、国家能力和公共权力的关系，其经济就是消耗这些实体来让它吞噬自己的根基。

这个词还有一个专门的天文学含义：当一个天体通过引力从另一个天体中吸收质量时，它被说成是吃掉了(cannibalize)另一个天体。我将在此表明，这也是一个十分恰当的描述，表示资本从世界体系的周边地区吸食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让其进入资本主义的轨道。最后，还有本书封面上描绘的“衔尾蛇”(ouroboros)，一条吃自己的毒蛇。这是一个恰当的形象，我们也会看到，对于一个系统来说，它就是在吞噬自己的社会、政治和自然基础——被吞噬的这些东西也是我们社会的基础。总而言之，食人比喻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几个有希望的途径。它邀请我们把这个社会看作一个体制化的狂欢——其中的主菜是我们自己。

我们也需要澄清一下“资本主义”一词。这个词通常被用来命名一个基于私有制和市场交换、雇佣劳动和生产营利的经济体系。但这一定义过于狭隘，掩盖而不是揭露了该体系的真正本质。我将在此论证，“资本主义”指定了更大的东西：一种社会秩序，使利润驱动的经济能够捕食它运作所需的经济以外的支持——从自然和臣民那里掠夺财富；各种各样的护理，尽管它们没有被完全否定，但长期以来遭到低估；资本既需要这些公共产品和公共权力，也试图削减这些公共产品和公共权力；劳动人民的能量和创造力。虽然它们没有出现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但这些形式的财富是获得利润和收益的基本前提。它们是资本积累的重要基础，也是资本主义秩序的基本组成部分。

因此，在本书中，“资本主义”不是指一种经济类型，而是指一种社会类型：在这种社会中，官方授权了经济可以为投资者和所有者积累货币化价值，同时吞噬其他所有人的非经济的财富。这个社会把财富放在餐盘里提供给企业，邀请他们聚餐，食物就是我们的创造力和维持我们生存的地球——没有必要补充他们已经吃掉的东西，或修复被他们破坏的东西。而这就是麻烦的要害所在。就像吃自己尾巴的大蛇，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准备好吞噬自己的实体。资本主义是一个真

正的自我失衡的动力系统，它隔段时间就会产生危机，同时吞噬着我们的生存基础。

那么，食人资本主义就是我们当下危机所依赖的系统。坦白说，这是一种十分罕见的危机，在这种危机中，汇聚了多种贪婪的行为。由于几十年里社会的金融化，我们所面临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巨大的不平等和低薪、不稳定工作的危机；也不“仅仅”是一个照料或社会再生产的危机；也不“仅仅”是一个移民和种族化暴力的危机。它也不“仅仅”是生态危机，在这个危机中，一个日益变暖的星球会释放出更加致命的瘟疫；也不“仅仅”是政治危机，其特点是日益荒废的基础设施，强化军国主义，以及强人政治的流行。哦，不，这是更糟糕的事情：整个社会秩序的普遍危机，所有这些灾难交织在一起，相互加剧，有可能吞噬我们的整体。

本书描绘出功能紊乱和统治之间的巨大纠葛。它将我们对资本主义的看法扩大到资本餐食菜单中在经济以外的成分，并将目前所有的压迫、矛盾和冲突集中到一个框架之中。在这个框架中，结构上的不公正当然意味着阶级剥削，但也意味着性别支配和种族/帝国压迫——这两者都是社会秩序的并非偶然的副产品，它让社会再生产隶从于商品生产，并要求种族化的掠夺来支撑可供牟利的剥削。同样，在这里，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这个系统的矛盾不仅让社会倾向于陷入经济危机，而且也倾向于陷入关怀、生态和政治的危机，所有这些在今天都开花结果，这要归功于所谓新自由主义的企业长期狂欢。

最后，我的看法是，食人资本主义催生了一系列广泛而复杂的社会斗争：不仅是生产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有各个系统衔接点上的边界斗争。在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相抵触的地方，这个系统煽动了对公共和私人、有偿护理和无偿护理的冲突。在剥削与掠夺交集之处，它煽动了关于“种族”、移民和帝国的斗争。然后，在资本积累遇到自然基础的地方，食人资本主义引发了关于土地和能源、植物和动物、地球命运的冲突。最后，当全球市场和大公司遇到国家和跨国治理机构时，它引发了对公共权力的形式、控制和范围的斗争。我们目前的困

境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可以在一个增强版的资本主义概念中找到它们的位置，这个资本主义既是单一的，也是分化的。

有了这个概念的加持，《食人资本主义》提出了一个迫切的生存问题：“我们被烤焦了吗？”我们能否思考出如何废黜这个将我们推向毁灭边缘的社会体系？我们能否一起解决这个系统所产生的整个危机综合体——不“仅仅”是全球变暖，也不“仅仅”是我们集体的公共权力逐渐遭到破坏，也不“仅仅”是我们互相关怀和维持社会关系的能力遭到全面攻击，也不“仅仅”是将那些不成比例的恶劣结果倾泻到贫困、工人阶级和种族族群那里，而是这些各种不同破坏交织在一起的总体危机？我们能否设想一个解放性的、反霸权的、具有足够广度和视野的生态社会转型项目，以协调多个社会运动、政党、工会和其他集体行动者的斗争——一个旨在一次性彻底解决食人者的计划？我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是唯一有用的计划。

此外，一旦扩展对资本主义的看法，我们也必须发展我们对如何取代资本主义的看法。无论我们是否称之为社会主义，我们寻求的替代方案都不能仅以重组系统经济为目标。它还必须重组后者^①与它目前正在吞噬的所有财富形式的社会关系基础。那么，必须重塑的是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私人与公共权力的关系，人类社会与非人类自然的关系。如果这听起来是一个很高的要求，那是我们最美好的希望。只有从大处着眼，我们才能给自己一个奋斗的机会，战胜食人资本主义，避免让它把我们整个无情地吞噬掉。

1. ^① 原文为latter，应指代“资本主义系统的经济”。——译者注

第一章

杂食：我们为什么扩展我们的资本主义概念

资本主义回来了！几十年来，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著作之外几乎找不到这个词，现在不同的评论家公开担心它的可持续性，各个流派的学者争先恐后地对它进行系统化的批评，全世界的活动家动员起来反对它。当然，“资本主义”的回归是一个可喜的发展，如果需要的话，它是一个清晰的标志，表明了当前危机的深度，以及人们普遍渴望对它进行系统的解释。所有关于资本主义的讨论表明，从症状上看，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围绕我们的各种弊病——金融、经济、生态、政治、社会——都可以追溯到一个共同的根源，而那些不能解决这些弊病的深层结构基础的改革注定都会失败。同样，资本主义一词的复兴也表明，许多人希望通过分析来澄清我们这个时代不同的社会斗争之间的关系——这种分析也可以促进最先进、最进步的潮流在一个反体系的集团中的密切合作，甚至完全联合起来。这种分析应该以资本主义为中心的预感是正确的。

然而，目前议论资本主义的热潮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修辞性的——更多的是对系统性批判资本主义的渴望的症状，而不是对它的实质性贡献。由于几十年的社会健忘症，整整几代年轻的活动家和学者已经成为精通话语分析的实践者，而对资本批判(Kapitalkritik)传统几乎一无所知。他们现在才开始问，后者^{注1}在今天如何才能进行资本批判，以澄清当前的局势。

他们的“前辈”，即以前反资本主义时期的大师们，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指导，但他们自己带有盲目性。尽管他们有良好的意图，但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将女性主义、生态学、后殖民主义和黑人解放思想系统地纳入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之中。

结果是，我们正在经历一场非常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却没有一种批判理论来说明这场危机，更不用说为我们提出一个解放性的解决方案。当然，今天的危机并不符合我们所继承的标准模式：它是多维的，不仅包括官方的经济和金融，也包括诸如全球变暖、“关爱赤字”和各种被掏空的公共权力等“非经济”现象。然而，我们之前所接受的危机模型往往只关注经济方面，它们将经济方面与其他方面分离开来，并赋予经济以优先地位。同样重要的是，今天的危机正在产生新的政治格局和社会冲突的话语。对自然、社会再生产、掠夺和公共权力的斗争是这一组合的核心，牵涉多个不平等的轴线，包括民族/种族、宗教、性和阶级。然而，在这方面，我们所接受的理论模型也颇让我们失望，因为它们仍然优先考虑的是生产上的劳动斗争。因此，总的来说，我们缺乏适合我们时代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危机的概念。

我认为，食人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概念。我在这一章中通过追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主要论点来介绍这一概念。然而，《资本论》没有系统地考察性别、种族、生态和政治权力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平等的结构性轴心，更不用说社会斗争的利害关系和前提。因此，需要重新构建其见解。于是，在这里，我的策略是先看马克思，然后再看他之后的那些思想家，希望能对一些老问题提供新的启示。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它如何更好地对其进行概括？我们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个经济体系、一种道德生活的形式，还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秩序？我们应该如何描述它的“危机”，以及我们应该将其放在什么位置上？

一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特征的界定

我首先来看看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因此，我所谈的食人资本主义的思路，初看起来，似乎十分正统。但我打算很快不再依循其正统性，说明这些特征何以需要以其他特征为前提，这些特征构成了它们可能性的条件。正如马克思为了发现资本主义的秘密而在交换领域的后面，进入生产的“隐秘场所”，我将在这个领域的后面，在更隐蔽的场所里，寻找生产可能性的条件。

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的第一个主要特征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它预先假定了所有者和生产者之间的阶级划分。这种划分是由于之前的社会世界被打破，在这种社会世界中，大多数人，无论处境如何不同，都可以获得生存手段和生产资料，换句话说，可以获得食物、住所和衣服，以及工具、土地和工作，而不必通过劳动力市场出卖劳动力。资本主义决定性地颠覆了这种社会结构。它围住了共有土地，废除了大多数人的使用权，并将共有资源转化为少数人的私有财产。

这直接导致了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的第二个主要特征：自由劳动力市场。一旦与生产资料分离，绝大多数人不得不通过这种奇特的制度来工作，以获得他们赖以为生和抚养子女必要的物资。值得强调的是，自由劳动力市场十分诡异，也极为“不自然”，在历史上十分反常和特殊。在这里，劳动力“自由”有双重意义：第一，就法律地位而言——不受奴役、不受制约、不受牵连，也不受特定地点或特定主人的管制，因此能自由流动，能够签订劳动合同。但是，第二，它是“自由的”，无法获得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包括土地和工具的使用权——因此他们没有这样的资源和权利，即他们没有不去劳动力市场的权利。因此，资本主义的定义，一部分来自它对（双重）自由工资劳动的构成和使用——尽管正如我们会明白，它也依赖于大量不自由或依赖性的、不被承认或无报酬的劳动。

接下来是同样奇怪的“自我”价值增殖的现象，这是马克思提出的第三个主要特征。^②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在于它有一个客观的系统问题：资本积累。因此，作为资本家的所有者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他们的资本增殖。像生产者一样，他们也处于特殊的系统压力之下。每个人满足其需求的努力都是间接的，受到其他东西的束缚，那些东

西具有更高的权力——一个非人系统中的绝对律令，即资本自身对无穷无尽的“自我”扩张的驱动。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很有见地。他说，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本身成为主体。人类是它的棋子，沦落到要找出如何在夹缝中求生存，获得他们需要的东西，来喂养资本这头巨兽。

第四个特征具体说明了市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殊作用。市场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在非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存在着市场。然而，资本主义下的市场，又有两个特点。首先，市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作用是分配商品生产的主要投资。这些投资被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解为“生产要素”，最初，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本。除了利用市场来分配劳动力之外，资本主义还利用市场来分配房地产、资本财货、原材料和信贷。只要它通过市场机制分配这些生产性投入，资本主义就把它们转化为商品。用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的话来说，它是一个“以商品为手段生产商品”的系统，尽管我们会看到，它也依赖于一个非商品的背景。^③

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市场还承担着第二个关键功能：它们决定了社会的剩余将如何用于投资。所谓的“剩余”，马克思指的是社会能量的集体基金，它超过了再生产特定形式的生活和补充在生活过程中消耗能量所需的能量。一个社会如何使用它的剩余的能力是绝对的核心，它提出了关于人们想要如何生活的基本问题——他们选择在哪儿投资他们的集体基金，他们建议如何平衡“生产劳动”与家庭生活、休闲和其他活动，他们渴望如何与非人类自然发生关系，以及他们旨在留给后代的東西。资本主义社会倾向于将这些决定交给“市场力量”。这也许是他们最重要和最反常的特征，把最重要的事情交给一个以货币化价值的量的增殖为导向的机制，而先天性地忽视了社会财富和人类福祉的品质评判标准。它与我们的第三个主要特征密切相关：资本在方向上比较稳定，但十分盲目，即资本的“自我”增殖，在增殖过程中，资本将自己视为历史主体，取代创造它的人类，将人类变成资本的仆人。

通过强调市场的这两个作用，我旨在反驳一种广为人知的看法，即资本主义推动了生活的日益商品化。我认为，这种观点导致了一个完全商品化世界的反乌托邦幻想。这种幻想不仅忽视了市场的解放性方面，而且忽略了世界体系理论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强调的事实，即资本主义经常在“半无产阶级化”(semi-proletarianized)家庭的基础上运作。在这些安排下，业主被允许少付工人工资，许多家庭从现金工资以外的来源获得部分收入维持生计，包括自给自足（园地、缝纫）、非正式互惠（互助、以物易物）和国家转移支付（福利、社会服务、公共产品）。^④这样的安排使相当一部分的活动和商品不在市场的范围内。它们不仅仅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残留物，也不是即将消失的东西。因此，举例来说，20世纪中期的福特制能够在主要工业化国家促进工人阶级的消费主义，只是通过半无产阶级化的家庭，将男性就业与女性家务相结合，以及通过抑制外围的商品消费来得到发展。半无产阶级化在新自由主义中更加明显，它通过将数十亿人从官方经济中驱逐到非正式的灰色地带，建立了整个资本积累战略，资本从这些灰色地带中掠走财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种“原始积累”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资本从中获利，并赖以生存。

那么，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化方面与非市场化方面共存。这不是侥幸或经验上的偶然性，而是镌刻在资本主义DNA中的特征。事实上，“共存”这个词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化和非市场化方面的关系来说，实在是太孱弱了。更好的术语是“功能重叠”(functional imbrication)或“依附性”(dependence)，但这些都不能表达“这种关系的反常性(perversity)”。我们很快就会明白，“食人”是形容这个方面的最好表达。^⑤

二 在马克思的“隐秘场所”之后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阐述了一个相当正统的资本主义定义，那四个特征似乎都具有“经济”特征。我已经在实际上追随着马克思，在关注市场交换的常识视角之后，寻找生产的“隐秘场所”。然而，现在，我想看看在这个隐秘场所背后，还有什么更隐秘的东西。我的

主张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描述，只有在我们开始补充了让其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之后，才会具有意义。因此，下一个问题将是：在这些主要特征的背后，还必须有什么前提条件，它们才能成为可能？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末尾关于所谓“原初”或原始积累的章节中提出了这个问题。^⑥他问道：资本从何而来？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如何出现的，生产者又是如何与之分离的？在前面的章节中，马克思已经把资本主义经济逻辑从其可能性的背景条件中抽离出来，人们常认为这些条件是直接给定的。但事实证明，资本的来源有一个完整的背景故事——暴力的掠夺和劫掠的故事。此外，正如从罗莎·卢森堡到大卫·哈维的理论家们所强调的那样，这个背景故事不仅仅在过去是资本主义的“起源”^⑦。掠夺是一种不断进行的（尽管是非正式的）资本积累机制，它与正式的剥削机制——马克思的“正面故事”——齐头并进。

这种从剥削的正面故事到掠夺的背面故事的转变，构成了一个重大的认识论的转变，它把以往的一切都置于不同的谱系当中。这类似于马克思早先在《资本论》第一卷开始时的举动，当时他让我们远离市场交换领域，以及与之相关的资产阶级常识的视角，去寻找生产的隐秘场所，这提供了更为批判的视角。而这样做的结果，让我们在那里发现了一个肮脏的秘密：资本积累是通过剥削实现的。换句话说，资本的扩张不是像市场观点所说的那样，是通过等价交换来实现的，而恰恰是其反面：在工人的部分劳动时间里，他们没有获得报酬。同样，当我们在第一卷末尾从剥削转向掠夺时，我们发现了一个更肮脏的秘密：在更高级的雇佣劳动的胁迫背后，隐藏的是公开的暴力和公开的盗窃。换句话说，构成《资本论》第一卷大部分内容的对资本主义经济逻辑的长篇阐述，并不是最后的结论。接下来，《资本论》换了一个角度，即掠夺的角度。这种转向“隐秘场所”背后的东西，也是转向了历史——转向我一直称之为让剥削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

然而，可以说，马克思并没有展开这种从剥削到更隐蔽掠夺的认识论转变的全部含义。他也没有从理论上说明他对资本主义的描述中

所隐含的其他同样重要的认识论转变。这些转移到更隐蔽的地方的东西，仍然需要我们去进行理论概括，正如“原始”积累的全部含义一样。如果我们要对21世纪的资本主义有一个充分的理解，若你们愿意，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写进新版本的《资本论》之中。

三 从商品生产到社会再生产

一个基本的认识论转变是从生产到社会再生产的转变——自给自足、护理和互助的形式，产生和维持人类和社会关系。这种活动被称为“护理”“情感劳动”或“主体化”，它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人类主体，使他们作为自然存在得以生存，同时也使他们成为社会人，形成他们的习惯和社会伦理实体，或称德性(Sittlichkeit)，让他们在其中活动。这里的核心是培养社会化的年轻人，建立共同体、共同价值、情感倾向和支撑社会合作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活动大部分（尽管不是全部）是在市场之外开展的，在家庭、邻里和许多公共机构中，包括学校和托儿所，而且其中大部分（尽管不是全部）并没有采用雇佣劳动的形式。然而，社会生产活动对于雇佣劳动的存在、剩余价值的积累以及资本主义的运作是绝对必要的。但如果没有家务、养育子女、学校教育、情感关怀以及其他一系列有助于产生新一代工人和补充现有工人的活动，以及维持社会关系和共同价值的活动，雇佣劳动就无法存在。因此，与“原始积累”一样，社会再生产是商品生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此外，从结构上看，社会再生产和商品生产之间的划分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事实上，它是资本主义下的一个伪命题。正如许多女性主义理论家所强调的那样，这种区分具有深刻的性别特征，再生产与妇女有关，而生产与男子有关。从历史上看，“生产性”的有偿劳动和无偿的“再生产”劳动之间的划分，支撑着现代资本主义形式下的妇女从属地位。就像工厂主和工人之间的划分一样，这种划分也是建立在之前的世界被摧毁的基础上的。在这种情况下，被摧毁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妇女的工作虽然与男子的工作有别，但妇女仍然是可见的，为大众所公认，是社会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相比之下，在资本主义下，再生产劳动被区分开来，被归入一个独立的、

“私人”家庭领域，从而掩盖了其社会价值。在这个新的世界里，金钱是权力的主要媒介，社会再生产的无偿劳动或低偿劳动的事实决定了如下问题：那些从事这种劳动的人在结构上从属于那些在“生产”中赚取现金薪资的人，即使他们的“再生产”劳动是有偿劳动的必要前提。

那么，生产和再生产之间的划分远不是普遍的划分，而是一定历史阶段上资本主义导致的划分。但它不是永恒的。相反，这种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形式。在20世纪，社会再生产的某些方面被转化为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去掉了私有化的方面，但没有商品化。今天，这种划分再次发生变化，因为新自由主义将这些服务重新私有化和商品化，同时也首次将社会再生产的其他方面商品化。此外，通过要求缩减公共服务，同时大量招募妇女从事低薪的服务劳动，目前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正在重新划分之前将商品生产与社会再生产区分开来的体系界限，并在此过程中，重新配置性别秩序。同样，新的资本主义形式正在吞噬社会再生产，允许资本自由地吞噬后者，而无需给出任何补偿。正如我们将在第三章看到的那样，其后果是将资本积累的这一重要前提变成了爆发资本主义危机的导火索。

四 从商品到生态

我们还应该考虑第二种认识论视角的重要转变，它将我们引向另一个隐藏场所。这一点在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家的工作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他们现在正在写另一个背后故事，重点是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吞噬。这个故事涉及资本对自然的蚕食——罗莎·卢森堡称之为征服(Landnahme)——既作为生产的“投入”来源，又作为吞噬后者丢弃废物的“深坑”。在这里，自然被变成资本的一种资源，它们的价值既得到了预设，又遭到了否定。在资本账册上，自然无需任何成本，资本可以自由或廉价地占有自然资源，不需要进行任何修复或补偿，人们默认大自然能够无限地自我恢复。因此，地球支持生命和自我更新的能力构成了商品生产和资本积累的另一个必要前提，也是另一个被吞噬的对象。

在结构上，资本主义假定，并在实际上开创了自然领域和经济领域之间的划分，人们常常认为自然领域为资本主义提供免费占有的和持续掠夺的“原材料”，并认为经济领域是由人类生产出来并为人类生产服务的价值领域。随之而来的是，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之间原有的、被视为精神的、社会文化的和历史性的区分被进一步巩固强化，认为后者是物质的、客观存在的和非历史的存在。这种区分的尖锐化也是由于之前世界的解体，在原来的世界里，社会生活的节奏在诸多方面与非人自然的节奏相契合。资本主义残酷地将人类从自然的、季节性的节奏中分开，强迫他们进入以化石燃料为动力的工业制造和以利润为导向的农业之中，并以化学肥料来增加产量。它引入了马克思所说的“物质变换裂缝” (metabolic rift)，开启了被误称为“人类世”的全新地质时代，其中“人类活动”（实际上是资本）正在吞噬地球。^⑧

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这种划分也在系统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当前的新自由主义阶段已经开启了新一轮的圈地运动——例如，水资源的商品化——它们将“更多的自然”（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带入了经济的正面故事。同时，新自由主义有望模糊自然/人类的界限：见证新生殖技术和日益推进的赛博格(cyborgs)的发展。^⑨然而，这些发展远没有让我们与自然“和解”，而是加剧了资本对自然的吞噬。与马克思所写的“仅仅”将已经存在的自然现象市场化的圈地运动不同，新圈地运动深入到了自然的“内部”，改变了其内在文法。最后，新自由主义正在使环境市场化：看一下碳许可证和抵消以及“环境衍生物”的活跃交易，这些交易将资本从长期的、大规模的投资中抽离出来，来转变以化石燃料为前提的不可持续的生活形式。我们将在第四章看到，这种对生态领域剩余部分的蚕食，正在将资本积累的自然条件变成引爆资本主义危机的另一根导火索。

五 从经济到政治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第三个主要的认识论转变，它指向让资本主义政治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资本主义依赖于公共权力，以建立和执行其基本规范。毕竟，如果没有一个支撑私人企业和市场交换的法

律框架，资本主义是无法想象的。它的正面故事关键取决于公共权力，以保证产权、执行合同、裁决争端、平息反资本主义的叛乱，以及维持构成资本命脉的货币供应。在历史上，有关的公共权力大多囊括在领土国家之中，包括那些作为殖民地的地区或帝国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亦是如此。正是这些国家的法律制度确立了看似非政治化的舞台的轮廓，私人行为者可以在其中追逐他们的“经济”利益，一方面不受公开的“政治”干扰，另一方面也不受来自亲属关系的赞助义务的影响。同样，正是领土国家调动了“合法武力”来镇压对掠夺的抵抗，而资本主义私有制正是通过镇压这些抵抗运动而得以产生和维持的。最后，国家实现货币国有化并为货币提供担保。^⑩在历史上，我们可以说，国家“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个主要结构性划分：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划分。随着这种划分的出现，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力、政治强权与经济强权在制度上出现了差异。像我们讨论过的其他主要划分一样，这种划分也是由于之前世界的解体而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被解体的是一个社会世界，其中经济和政治权力被有效地融合在一起——例如，在封建社会中，对劳动、土地和军事力量的控制被赋予了单一的领主和家臣。相比之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正如政治理论家艾伦·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所说的那样，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被区分开来，每一种权力都有自己的领域，有自己的媒介和运作方式。^⑪

然而，在地缘政治层面上，若要资本主义的正面故事成为可能，也需要一定的政治条件。这里的关键在于，需要更广阔的空间组织，让领土国家可以立足于其上。鉴于其扩张主义的目标，这是一个可以让资本更容易转移的空间。但它跨越边界的能力取决于国际法、大国之间的中介和超国家制度，这些制度部分地安抚了（以资本友好的方式）一个经常被视为自然状态的领域。在整个历史上，资本主义的正面故事取决于一系列全球霸权的军事和组织能力，正如布罗代尔(Braudel)学派的历史社会学家乔瓦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所说的那样，这些霸权试图在一个多国制度的框架内促进资本积累的规模日益扩张。^⑫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更深层的结构划分：一方面是“国内”和“国际”之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划分，另一方面是核心和边缘之间的帝国主义划分——两者的基本前提是，在作为“世界体系”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作为领土国家的国际体系组织的政治世界之间的更进一步划分。我们将在第五章中看到，这些划分目前也在发生巨大转变，因为新自由主义在国家和地缘政治层面上吞噬了资本在历史上所依赖的地缘政治能力。其结果是把“政治”变成另一个系统性危机的主要场所。

六 从剥削到掠夺

最后，我们应该回到这样的观念，它启发了整个思路：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是资本积累的历史前提的观念。通过重新认识这一思想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恒定特征，而不是在当下资本主义被取代的不成熟的标志，我们可以概括出另一个“场所背后的场所”，其运作在结构上对这个社会系统是必要的。这里隐秘的必要性是掠夺——在长期的基础上，强行掠夺被劫掠和被忽视的人民的财富。虽然它通常被视为资本主义标志性剥削过程的对立面，但我们最好将掠夺视为让剥削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

要知道为什么，请考虑这两个exes^{⑩13}都有助于资本积累，但它们的方式不同。剥削在自由契约交换的幌子下将剩余价值转移给资本：作为使用他们的劳动能力的回报，工人得到的薪资（应该）能支付他们的生活费用；虽然资本占有他们的“剩余劳动时间”，但它（应该）至少支付他们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里的费用。相比之下，在掠夺方面，资本家省去了所有这些细枝末节，转而粗暴地没收他人的资产，他们几乎没有为此付出代价；通过将掠夺的劳动力、土地、矿产和/或能源输送到他们公司的运营中，他们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利润。因此，掠夺和剥削并非相互排斥，而是携手并进。双重自由的雇佣劳动者在由掠夺而来的能源驱动的机器上转化被掠夺的“原材料”。他们的薪资被压得很低，因为有负债的农民在偷来的土地上种植食物，以及由不自由或依赖他人的“其他人”在血汗工厂生产的消费品，他们自己的社会再生产成本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回报。因

此，掠夺是剥削的基础，并使其有利可图。掠夺并不是从资本主义时期开始的，但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内在特征，与剥削一样具有构成性和结构性的基础。

此外，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对应着一种等级制度。一方面，可被剥削的“工人”是有权利的个人，具有公民地位；有权得到国家的保护，他们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能力。另一方面，被掠夺的“他者”是不自由的、依附性的生命；没有任何政治保护，他们毫无防备，实质上随时会遭到侵犯。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把生产阶级分为两类不同的人：一类适合于“纯粹”剥削，另一类注定要被野蛮掠夺。这种划分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条制度化的划分线——与已经讨论过的生产与再生产、社会与自然、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划分一样，都是构成性的、结构性的划分。

此外，就像其他那些划分一样，这个划分支撑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特定的统治模式：种族—帝国压迫 (racial-cum-imperial oppression)。正如我们将在第二章中看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任何政治保护并遭受反复掠夺的人绝大多数是种族化人口。我们只需要提到产权奴隶(chattel slave)、殖民者、被征服的“土著人”、欠债的农民、“非法移民”、被定罪的重刑犯、种族隔离国家的种族化主体及其后代——所有这些人不仅仅是被掠夺一次 [就像那些成为公民—工人(citizen-worker)的人一样]，他们一次又一次被掠夺。因此，剥削与掠夺的区分线与全球的肤色区分线大致吻合，一点也不模糊。它牵涉一系列的结构性的不公正，包括种族压迫、（新/旧）帝国主义、被掠夺和种族灭绝的土著人。

因此，这里是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种结构性划分。这种划分也取决于历史发展，也是食人化的基础。它与这里对其他部门的概括——以及现在困扰它们的危机——深深纠缠在一起。当然，危机政治、生态和社会再生产方面都与外围和核心的种族化掠夺密不可分：它见证了资本对国家和跨国政治权力的依附，以确保获得和拥有被掠夺的土地、受胁迫的劳动力和掠夺的矿物；它对种族化地区的依附，在那里倾倒有毒废物，让他们提供低薪护理劳动者；它诉诸等级地位

划分和种族怨恨来化解、取代或煽动政治危机。简而言之，经济、生态、社会和政治危机与帝国主义和种族压迫以及与之相关的不断升级的对抗密不可分。

七 不限于经济的资本主义

对于上述每一点，我都可以说得更详细——在以后的章节中还会讨论。但到现在为止，我的论点十分清楚。在补充我对资本主义的初步描述之后，我表明，其经济前景特征取决于非经济背景条件。一个由私有制、价值的“自我”增殖的积累、社会剩余和商品生产的主要投资[包括(双重)自由劳动]的市场分配所定义的经济体系，有四个关键的前提条件，它们分别涉及社会再生产、地球生态、政治权力以及从种族化人口那里掠夺的财富日益增多。因此，为了理解资本主义，我们需要重新思考马克思的正面故事与这四个背后故事。我们必须将马克思的观点与其他批判理论的解放潮流联系起来：女性主义、生态学、政治、反帝国主义和反种族主义。

-
1. [◎](#) 原文为latter，应指代上一句话中的“精通话语分析的实践者”。——译者注
 2. [◎](#)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资本经常被定义为价值的自我增殖。但这种表述是有误导性的。实际上，资本既通过从被剥削的雇佣工人那里剥削剩余劳动时间，也通过从护理人员、种族化人口和自然界那里剥削未被资本化和资本化不足的财富而增殖。换句话说，它的增殖并不全靠自己，而是通过吞噬我们而增殖的。为了强调这一点，我为“自我”这个词打上了引号。
 3. [◎](#) Piero Sraffa,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 Prelude to a Critique of Economic Theor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4. [◎](#) Immanuel Wallerstein, *Historical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1983), 39.
 5. [◎](#)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5); Nancy Fraser, “Can Society Be Commodities All the Way Down?”, *Economy and Society* 43 (2014).
 6. [◎](#) Karl Marx, *Capital*, Vol. 1, trans. Ben Fowkes (London: Penguin, 1976), 873—6.
 7. [◎](#) Rosa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8); David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137—82.

8. [!\[\]\(57e6eaa370c11c0a8b197170cf41ea3b_img.jpg\)](#) Karl Marx, *Capital*, Vol. III, trans. David Fernbac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81), 949—50; John Bellamy Foster, “Marx’s Theory of Metabolic Rift: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 no. 2 (September 1996). 关于对人类世概念的批判，参看本书的第四章。
9. [!\[\]\(dbb5925b453b6e9e7a1719382db80907_img.jpg\)](#) Donna Haraway,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Socialist Review* 80 (1985).
10. [!\[\]\(04c2c12129b7b86c4fdf9dd599794af8_img.jpg\)](#) Geoffrey Ingham, *The Nature of Mon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David Graeber, *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 (New York: Melville House, 2011).
11. [!\[\]\(36bb223857a09d55e764be5cd85bd32e_img.jpg\)](#) Ellen Meiksins Wood, *Empire of Capital*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3).
12. [!\[\]\(e547f5f938aec4f3824ce0f9f2875501_img.jpg\)](#)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4).
13. [!\[\]\(d02b5b693bb89ec29e346bfb9279e371_img.jpg\)](#) 弗雷泽的意思是，剥削 (exploitation) 和掠夺 (expropriation) 这两个词都是以ex开头的词，所以在这句话中她将其简化为“这两个exes”，意思是这两个以ex开头的词。——译者注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我在这里阐述的情况与我们熟悉的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制度的想法有很大不同。诚然，乍看之下，我们所说的主要特征似乎是“经济”。然而，这种外表具有误导性。资本主义的一个特点是，它会把它结构性社会关系看成经济关系。事实上，我们很快会发现有必要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即让这样的“经济体系”得以存在的“非经济”前提条件。这些不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而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特征。我们并不是抹去经济特征的痕迹，而是需要把它们纳入我们对“什么是资本主义”的理解之中。这意味着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认识到它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同样，我所勾勒的图景也不同于将资本主义视为统一的道德生活形式的观点，其特点是普遍的商品化和货币化。在这种观点中，正如卢卡奇在《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那篇著名文章所说的那样，商品形式殖民了我们所有的生活，在法律、科学、道德、艺术和文化等各种现象上打上了商品的烙印。^①在我看来，相比之下，商品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尚未达到普遍存在。相反，在它存在的地方，它的存在依赖于非商品化的区域，而这些区域也逐渐被资本系统地吞噬。

无论是社会、生态还是政治，这些非商品化的区域都不是简单地反映商品逻辑。每一个都体现了它自己独特的规范和本体论语法。例如，面向再生产（相对于生产）的社会实践倾向于生产关怀、互助和团结的理想。^②同样地，相对于经济而言，面向政治的实践也经常提到民主、公共自治和集体自我决定的原则。然后，与资本主义在非人类自然中的背景条件相关的实践也倾向于培养诸如生态管理、不再支配自然和代际间的正义等价值观。最后，与掠夺相关的实践，或者说与抵抗掠夺相关的运动，往往一方面促进总体化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促进共同体自治的价值观。

当然，这些“非经济”的规范性往往具有等级性和狭隘性（在再生产的情况下）、限制性或排他性（在政治的情况下）、浪漫性和宗派性（在非人类自然的情况下），以及对阶级不敏感性和物化性（在掠夺的情况下）的伪装。因此，不应该将其理想化。但重要的是，要

记录下它们与资本主义前景相关的价值观的分歧：首先是增长、效率、等价交换、个人选择、消极自由和贤人政治的进步。

这种分歧让我们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发生了很大变化。资本主义社会远非单一的、无所不在物化的逻辑，它在规范上是有差异的，包含了各种不同但相互关联的社会本体论的明显的多元性。当这些本体论发生冲突时，会发生什么事情，这需要进一步观察。但支撑它们的结构已经十分清楚：资本主义独特的规范拓扑学产生于我们所确定的前台/后台关系。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发展一个关于它的批判性理论，我们必须用一个更为特别的、结构性的观点来取代将资本主义作为道德生活物化形式的观点。

如果资本主义既不是一种经济制度，也不是一种道德生活物化形式，那么它是什么？我的答案是，最好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制度化的社会秩序，与封建主义等差不多。以这种方式理解资本主义突出了它的结构性区分，尤其是我所谓的制度性区分。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的构成是“经济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制度性区分，这种性别上的区分是男性统治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基础，即使它也使资本主义对劳动力的剥削成为可能，并通过这种剥削使其官方认可的资本积累模式成为可能。资本主义的主要因素还包括“经济”与“政治”制度性的区分——可以将这种区分定义为将经济议程从领土国家的政治议程之中驱逐出去，使资本在跨国的“非人”区域中自由驰骋，在逃避政治控制的同时获得霸权主义秩序的益处。对资本主义来说，最根本的也是本体论上的划分，（非人）“自然”背景和它（显然非自然）的“人类”前景之间的划分是预先给定的，但却得到高度强化。最后，同样基础的划分是剥削与掠夺的划分，它将资本主义工人阶级的（双重）自由与种族化的“他人”没有得到认可的主体性相关联。把资本主义说成是以这种划分为前提的制度性的社会秩序，是为了表明它与性别统治、生态退化、种族/帝国压迫和政治统治的非偶然的、结构性的混合——当然，所有这些都与它同样结构性的、非偶然的（双重）自由劳动剥削的前景动态条件密切相关。

八 边界斗争

然而，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的制度划分是恒定的。相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和再生产、经济和政治、人类和非人类自然、剥削和掠夺之间的划分的位置和方式，会随着资本积累制度在历史上的发展而有所不同。事实上，我们可以在这些方面对商业资本主义、自由殖民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进行概括：在历史上，有四种不同的方式。

同样重要的是，在任何地方和时间，资本主义秩序的精确布局都取决于斗争——取决于社会权力的平衡和政治斗争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制度性的划分绝不是简单的给定，这些划分经常成为冲突的焦点，因为行为者们会组织起来挑战或捍卫彼此分离经济与政治、生产与再生产、人类与非人类自然、剥削与掠夺的边界。由于其目标是在系统的制度性地图上重新定位各种争议过程，资本主义主体在我们已经确定的不同区域基础上，得出了规范的视角。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例如，一些新自由主义的反对者利用与再生产的关怀和责任有关的理想，来反对教育商品化的努力。另一些人援引与生态学相关的自然管理和代际公正的概念，来推动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化。还有一些人援引政治性的公共自治的理想，来倡导国际资本控制，并将民主责任扩大到国家之外。还有一些人引用了关于抵抗掠夺的共同体自治的规范，提出取消监狱和警察的津贴。这些主张，它们必定会引起的反诉，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斗争的基本内容——与马克思认为的争夺商品生产和剩余价值分配控制权的阶级斗争一样重要。这些斗争，我称之为“边界斗争”，决定性地塑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③这些斗争在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秩序的看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我们不要误解边界斗争，我所勾画的观点是功能主义的观点，也就是说，侧重于证明每一个实例是如何支持这个系统的。当然，我一开始就把社会再生产、生态学、政治权力和掠夺描述为资本主义经济正面故事的必要前提，强调它们让商品生产、劳动剥削和资本积累成为可能。但这一理解并没有把握到资本主义的前台/后台关系的全部故事。相反，它与另一个我们曾经暗示过的要素共存，这种要素同样重

要，它出现在社会、政治、生态和边缘化/可掠夺区域作为“非经济”规范的资源特征中。这意味着，即使这些“非经济”秩序让商品生产成为可能，它们也不能被还原为这种功能。这些隐秘场所远没有完全被资本积累的动力揭示出来，或完全服从于资本积累的动力，每一个隐秘场所都蕴藏着独特的社会实践和规范性理想的本体论。

此外，这些“非经济”理想包含着批判性政治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危机时期，它们可以被用来反对与资本积累相关的主要经济实践。在这种时候，各种规范性划分，在它们自己的制度范围内的结构中往往会被削弱。当这种划分无法维持时，资本主义的主体——他们毕竟生活不止在一个的领域之中——就会经历规范性的冲突。他们远没有从“外部”引入思想，而是利用资本主义自身复杂的规范性来批判它，反过来，在之前以前景/背景划分为前提的制度性社会秩序中，彼此共存的多样性的理想被动员起来，有时候没有那么容易。因此，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制度性的社会秩序，有助于我们理解如何从其内部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然而，这种观点也表明，把社会、政治、自然和边缘地区浪漫地解释为资本主义“外围”，并与其内部对立，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今天，相当多的反资本主义思想家和左翼活动家，包括文化女性主义者、深度生态主义者、新无政府主义者和非殖民主义者，以及许多“多元”“后增长”“自给”和“社会团结”经济的支持者都有这种浪漫的观点。这些潮流往往把“关怀”“自然”“直接行动”“公共化”或（新）“共同体主义”（communalism）视为内在的反资本主义的策略。因此，他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所钟爱的实践不仅是批判的来源，也是资本主义秩序的组成部分。

与之相反，在我看来，社会、政治、自然和可掠夺的边缘区域与经济同时出现，并与之共生发展。它们实际上是后者的“他者”，只是在与经济的比较中获得了它们的具体特征。因此，再生产和生产是一对概念，每个术语都是由另一个术语共同定义的。两者都不可能脱离对方而产生任何意义。政治/经济、自然/人类、中心/边缘的情况也是如此。作为资本主义秩序的一部分，没有一个“非经济”领域提供

了一个完全外在的立场，可以支撑起一个绝对纯粹和完全激进的批判形式。相反，那些诉诸他们所想象的资本主义“外部”的政治项目，最终只会重蹈资本主义的覆辙，因为他们将女性的抚育与男性的侵略、自发的合作与经济计算、自然的整体有机主义与人类中心的物种主义、自给自足的共同体主义与西方的个人主义相对立。把自己的斗争建立在这些对立上，不是为了斗争，而是在不知不觉中映射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性的社会秩序。

由此可见，对资本主义的前台/后台关系的适当说明，必须将三个不同的观念结合起来。第一，资本主义的“非经济”领域充当让资本主义经济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后者的存在依赖于前者的价值和投资。第二，资本主义的“非经济”领域有其自身的分量和特性，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为反资本主义的斗争提供资源。尽管如此——这是第三点——这些领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部分，在历史上与资本主义经济共同构成，并以其与经济的共生关系为标志。

九 食人化危机

还有第四个观念，它使我们回到了我一开始提到的危机问题。资本主义的前台/后台关系包含了社会不稳定的内在来源。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生产不是自给自足的，而是依赖于社会再生产、自然、政治权力和掠夺。然而，它对无穷无尽的资本积累的导向，威胁着破坏其可能性的这些条件的稳定。就其生态条件而言，面临风险的是维持生命并为社会供给提供物质投资的自然过程。就其社会生产条件而言，受到威胁的是社会文化过程，它提供了支撑社会合作的团结关系、情感倾向和价值视野，同时也提供了构成“劳动力”的社会化人才和技术人才。就其政治条件而言，受到损害的是国家和跨国的公共权力，它们保证产权，执行合同，裁决争端，平息反资本主义的叛乱，并维持货币供应。在资本依赖掠夺财富的情况下，受到威胁的是这个系统的普遍性——因此也是它的合法性——以及它的统治阶级通过包括同意和武力在内的混合方式实施霸权统治的能力。在每一种情况下，这个系统都有一种内在的自我稳定的倾向。由于未能补偿或修

复其隐秘场所，资本不断吞噬它所依赖的支撑。就像一条吃自己尾巴的蛇，它吞噬了让自己成为可能的条件。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里有四种“资本主义的矛盾”——生态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种族/帝国的——每一种都对应着一种食人类型，体现着不同的“危机倾向”。然而，与马克思所强调的危机不同，这些危机并不是源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矛盾。相反，它们的基础是经济体系与其背景的可能性条件之间的矛盾——生产与再生产、社会与自然、经济与政治、剥削与掠夺之间的矛盾。^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们的作用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煽动广泛的社会斗争：不仅是狭义上的生产中的阶级斗争，而且还有关于生态、社会再生产、政治权力和掠夺的边界斗争。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危机的回应，这些斗争是我们扩展的将资本主义视为制度性社会秩序的观点所特有的内容。

从这里勾勒的资本主义作为制度性的社会秩序的概念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资本主义批判？将资本视为食人者意味着一种多重的批判性反思形式，很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发展的那样。正如我对他的解读，马克思综合了对资本主义固有的（经济）危机的系统性批判，对其内在的（阶级）统治动态的规范性批判，以及对其特有的（阶级）斗争形式中固有的解放性社会变革潜力的政治性批判。我在这里概述的观点要求类似的各种批判线索的交织，但这里的交织更加复杂，因为每条线索的内部都有多重线索。系统危机批判不仅包括马克思所讨论的经济矛盾，也包括这里所讨论的四个领域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通过危害社会再生产、生态、政治权力和持续的掠夺，破坏了资本积累的必要前提的稳定性。同样，统治性批判不仅包括马克思所分析的（以生产为中心的）阶级统治形式，还包括性别统治、政治统治、对自然的统治和种族/帝国的统治。最后，政治性批判包括多种行动者——阶级、性别、弱势群体、“种族”、国家和人民(demos)——以及斗争的载体：不仅是阶级斗争，而且还包括边界斗争，即社会、政治、自然和可掠夺的边缘区域与“经济”的分离问题。

因此，今天，为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内容比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的斗争要广泛得多。只要我们把目光投向正面故事的背后，那么剥削劳工的所有不可或缺的背景条件就会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冲突焦点——不仅仅是生产上的劳资斗争，而且还有关于性别统治、生态、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民主的边界斗争。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后者现在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在资本主义内部、边缘，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反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斗争。如果他们从这些方面来理解自己，这些斗争的参与者可以合作或联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解放潜力就在于他们有能力设想新的架构(configurations)，不仅仅是经济架构，还有经济与社会、自然和政治的关系的架构。因此，重新看一下历史上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划分，将是21世纪致力于解放运动的社会行动家和批评理论家的主要任务。

这一议程是本书的核心和灵魂。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仔细研究我在这里概述的四个隐秘场所中的每个场所。我将结构分析与历史反思，以及政治理论结合起来，揭示每种形式的食人现象。资本主义掠夺/剥削划分的种族/帝国形态，它助长了食人资本主义对人口的饥渴，它们可以不受惩罚地吞噬他们（第二章）；其再生产/生产配对的性别形态，使这个系统成为消耗了大量护理工作的系统（第三章）。其自然/人类的对立造成的生态掠夺形态，将我们的地球家园置于资本的饕餮大嘴中（第四章）；以及吞噬公共权力和戕害民主的形态，这是该体系在经济和政治之间的标志性划分（第五章）。最后两章探讨了将资本主义重新视为食人者会产生什么实际差异：这种观点如何改变我们对社会主义（第六章）和新冠疫情（后记）的理解。

-
1. [©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London: Merlin Press, 1971\).](#)
 2. [© Sara Ruddick, Maternal Thinking: Towards a Politics of Peace \(London: Women's Press, 1990\); Joan Trento, Moral Boundaries: A Political Argument for an Ethic of Ca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3. [© Nancy Fraser, "Struggle over Needs: Outline of a Socialist-Feminist Critical Theory of Late-Capitalist Political Culture," in Unruly Practices: Power, Discourse, and Gender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4. [◎](#) 参见James O'Connor,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1, no. 1 (1988), 1—22.

第二章

贪食的惩戒：为什么资本主义在结构上是种族主义者

资本主义总是与种族压迫深深联结在一起。这一主张显然对应于17至19世纪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种植园资本主义。但对于20世纪的吉姆·克劳法^①(Jim Crow)下的工业化资本主义来说，这也同样是事实。任何人都不能合理地怀疑种族压迫在当今时代的非工业化、次贷化、大规模监禁的资本主义中继续存在。尽管它们之间有明显的区别，但这些“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形式没有一个是不涉及种族问题的。在其迄今为止的所有化身中，资本主义社会都与种族压迫联结在一起。

这种联结的性质是什么？它是偶然的还是结构性的？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之间的联系是偶然产生的吗，在原则上，是否不会是这样？还是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准备按种族来区分不同的人了？那么今天呢？种族主义是否被硬塞回到当代资本主义之中了？或者说，在21世纪的今天，是否可能出现一个非种族的资本主义？

这些问题绝不是新问题。恰恰相反，这些都是十分深刻但未被重视的批判理论潮流，它们被称为黑人马克思主义。这一传统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蓬勃发展，包括C.L.R.詹姆斯(C.L.R. James)、W.E.B. 杜波依斯(W.E.B. Du Bois)、埃里克·威廉姆斯(Eric Williams)、奥利弗·克伦威尔·考克斯(Oliver Cromwell Cox)、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沃尔特·罗德尼(Walter Rodney)、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曼宁·马拉布尔(Manning Marable)、芭芭拉·菲尔德(Barbara Fields)、罗宾·D.G.凯利(Robin D.G. Kelley)和科内尔·韦斯特

(Cornel West)这些杰出人物。^②尽管他们在具体细节上有分歧，但这些思想家都深入地探讨了资本主义与种族主义的关系。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的思考处于现在许多人所说的批判种族主义理论的最前沿。^③

然而，随后，资本主义与种族问题的关联就从批判理论中消失了。随着新左派激进主义的衰落和真正存在的共产主义的崩溃，资本主义在许多地方不再被看作是一个严肃话题，而越来越多人也不再关心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因此，种族和种族主义的问题实际上让位于自由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思想家。尽管这些思想家也对主流和批判种族理论作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贡献，但他们并没有说明资本主义和种族压迫之间的关系。

然而，今天，新一代的批判性种族理论家正在为这个问题注入新的活力。由迈克尔·道森(Michael Dawson)、鲁特·威尔森·吉尔摩(Ruth Wilson Gilmore)、塞德里克·约翰逊(Cedric Johnson)、芭芭拉·蓝思必(Barbara Ransby)和基安加·亚玛塔·泰勒(Keeanga-Yamahatta Taylor)等思想家组成的这一代人正在根据21世纪的发展^④，重新思考资本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关系。一方面是新一代的极端种族主义激进分子的崛起，另一方面是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和极右的白人至上的民粹主义的崛起，这极大地提高了批判性种族理论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现在觉得应当更好地理解他们正在与什么东西战斗。许多人现在也意识到，这两种发展的大背景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日益加深，这种危机同时加剧了种族压迫的形式，并使其越来越明显。最后，“资本主义”不再是一个禁忌词，马克思主义正在经历着复兴。在这种情况下，黑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问题再次变得十分重要。资本主义是否一定与种族主义相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能克服种族压迫吗？

在前一章中，我提出了一个扩展版的资本主义的观点，在这里，我借此推进这一问题。我提出的方法打乱了结构与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通常的尖锐对立，这些对立掩盖了资本主义与种族主义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与那些认为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关系是偶然的人相

反，他们认为种族主义不是资本主义所必需的，资本主义体系与种族压迫始终存在着关联，我坚持认为，这种关联有一个结构性的基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基础就是资本主义体系依赖两个资本积累的过程，这两个资本积累过程判若云泥但彼此纠缠在一起，即剥削过程和掠夺过程。正是剥削和掠夺的区分，让我们可以区分两群不同的人，从而支撑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种族压迫。

然而，有人坚持认为不可能存在不带种族压迫的资本主义，对于这样的拥趸，我将论证资本主义的剥削和掠夺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它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可以被看作是一系列不同性质的种族化资本积累制度。在每个阶段，剥削和掠夺的历史性具体配置支撑着独特的种族区分的景观。若我们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我们会发现一些新东西：有一种资本主义形式，它模糊了剥削和掠夺的历史区分。这种形式不再把人们区分成两个不同的人群，这似乎正在消解四百年来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种族压迫的结构。不过，我认为，种族压迫仍然会以既非严格必要，亦非纯然的形式继续存在。其结果是，它为21世纪的黑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反种族主义行动派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难题。

在本章中，我分三步来阐述这一论点。首先，我为这样一个论点辩护：鉴于资本主义依赖掠夺作为剥削的必要条件，这就为种族压迫提供了结构性基础。然后，我描绘出剥削和掠夺在资本主义历史的主要阶段的变化形态，从历史上来思考这一结构。最后，我思考了一个新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下，克服种族压迫的前景，这个社会仍然以剥削和掠夺为基础，但不把人们区分成两个不同的人群。自始至终，我阐明了这个系统带有将人口种族化的倾向，以便更好地吞噬他们——因此，我们应该把资本主义理解为对他们贪食的惩戒。

一 交换、剥削、掠夺

资本主义一定是种族主义的吗？一切都取决于“资本主义”的确切含义——以及我们从什么角度来看待它。有三种方法值得探讨。第一种方法，在经济学课程中讲授，在商业中假设，并形成常识，通过

市场交换的视角来看待资本主义。第二种是社会主义者、工会成员和其他劳工斗争的人物熟悉的角度，从更深的层次看待资本主义的关键，即在商品生产中对雇佣劳动的剥削。第三种观点是由帝国主义的批评者发展起来的，它把焦点放在资本对被征服民族的掠夺上。在此，我建议，通过结合第二和第三种观点，我们可以获得这三种方法中每一种方法所遗漏的东西：资本主义社会中种族压迫的结构性基础。

首先，看一下交换的角度。从这个角度看，资本主义似乎是一个简单的经济体系。它被组织起来以实现增长和效率的最大化，它以市场制度为中心，在那里，自利的、公平的交易者彼此交换等价物。以这种方式来看，资本主义不会关心人的肤色。如果没有其他干扰，它会遵循自己的经济逻辑，这个系统就会废除业已存在的种族等级制度，避免形成新的等级制度。从交换的角度来看，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系是完全偶然的。

对于这种观点，人们会有很多不同看法，但目前来说，最重要的是：它通过定义，让资本主义与种族主义脱钩。将资本主义狭义地定义为一种本身不关心人的肤色、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逻辑，以交换为中心的观点将任何种族化的冲动归结为市场之外的力量，这些力量扭曲了市场运作。因此，罪魁祸首不是（它所理解的）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之外的更大的社会。种族主义来自历史、政治和文化，所有这些都将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外部因素，只是与资本主义有偶然的联系。其效果是将资本主义形式化，将其还原为一种手段/目的经济化逻辑，并剥离其历史和政治内容。这样一来，以市场为中心的观点就掩盖了第一章所阐述的关键点，也是我在此论点的核心：由于结构性原因，资本主义经济需要“非经济”的前提条件和投资，包括一些产生种族压迫的条件。由于没有考虑到这种依赖性，这种观点掩盖了资本主义体系独特的资本积累、支配和吞噬机制。

相比之下，我们的第二个视角揭露了资本主义中的一些奥秘。马克思提出了这一观点，他将资本主义重新视为一个剥削体系。最主要的是，他从市场交换规范视角深入到商品生产的更基本层面。在那

里，他声称在资本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中发现了资本积累的秘密。对马克思来说，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的工人既不是农奴，也不是奴隶，而是合法的自由人，也就是说，他们可以自由地进入劳动市场，出售他们的“劳动力”。当然，实际上，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任何实际的选择；由于被剥夺了直接获得生产资料的机会，他们只能通过签约为资本家工作以换取薪资来确保活下去的手段。这种交易也没有给他们带来太多好处。在马克思看来，第一个角度是等价交换，是一种花招。资本主义的工人只得到了他们自身再生产的平均社会必要成本的补偿，他们对自己的劳动所产生的剩余价值没有提出任何要求，这些剩余价值反而都归资本家所有。这正是问题关键所在。对马克思来说，这个体系的核心是剥削，而这就是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拥有社会生产资料并占有其剩余劳动的资本家；另一方面是自由但没有私有财产的生产者，他们必须零散地出售他们的劳动能力才能生存下去。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不是纯粹的经济，而是一种阶级统治的社会制度，其核心是资本在商品生产中对自由劳动的剥削。

马克思的视角有许多优点，其中有一个优点毋庸置疑。通过从剥削的角度来看待资本主义，它揭露了在交换视角下所掩盖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双重）自由工人的阶级统治的结构性基础。然而，这种关注未能揭露种族压迫的任何重要的结构性基础。至少在这一点上，剥削视角与交换视角非常近似。虽然证明了资本是在剥削自由的雇佣劳动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但它对种族如何在这个系统中出现，以及为什么它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发挥了如此巨大的作用，几乎没有任何启示。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它只能给人这样的印象：这个系统与种族压迫的关系是偶然的。

然而，这一结论过于草率。问题在于，在紧紧围绕着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过程时，马克思没有系统考察一些与剥削有关的同样基本的过程。我想到了两个这样的过程，它们在被探究时可以揭示出与种族压迫的根深蒂固的联系。第一个是不自由的、依赖性的和无报酬的劳动在资本积累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我指的是被掠夺的劳动，而不是被剥削的劳动，受制于不以薪资合同为中介的统治。第二个问题是政

治秩序赋予了“工人”自由个人和公民地位，同时将其他人作为更低级的存在者——例如，作为产权奴隶、契约仆人、被殖民者、“附属国”的“当地人”、债务人、“非法移民”和重罪犯。^⑤

然而，当我们从第三个角度来看待资本主义时，这两个问题——依附性劳动和政治奴役——就会浮现出来：掠夺的视角。如前一章所述，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思考方式由帝国主义理论家发展而来，它将框架扩大到“大都市”之外，包括对“边缘”地带人民的征服和掠夺。采用全球视角，其实践者披露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个隐秘的野蛮底层：在同意和合同的表面礼节下，隐藏着野蛮的暴力和公开的盗窃。其效果是为交换和剥削提供了新的视角，而这些现在似乎是更大、更险恶的冰山一角。

可以肯定的是，掠夺的观点可以给我们启示。但我们不太清楚，帝国扩张是否在结构上与资本主义是一体的，如果是的话，对依附的、被征服的民族的掠夺与对（双重的）自由工人的剥削有什么关系。我们没有得到一个系统的说明，如果有关系的话，这第三个视角——掠夺——与种族压迫有什么关系。

我的主张是，掠夺确实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组成部分，也是它与种族主义的关联。简而言之，我将说明，那些被资本掠夺的人的臣服是它所剥削的人的自由的一个隐性前提。如果不揭示出第一种情况，我们就不能完全理解第二种情况。我们也无法瞥见资本主义与种族压迫的历史关联的结构基础。

为了解读这一主张，我将使用第一章中介绍的经过扩展的资本主义概念，它结合了这里所阐述的后两种视角的要素。它深入到我们熟悉的交换层面之下，将马克思的剥削“隐秘地”与更加模糊的掠夺要素结合起来。通过对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关系的理论考察，我将确定资本主义与种族压迫的长期关联的结构性基础。

二 作为资本积累的掠夺：经济论断

让我首先扩展一下我对掠夺作为资本主义结构性要素的定义。在前一章中，大家看到，掠夺是另一种手段——剥削之外的其他手段——进行的资本积累。摒弃了资本购买“劳动力”以换取工资的契约关系，掠夺是通过没收人力和自然资源，并将它们加入到资本扩张循环之中。这或许是公然暴力的没收，如新世界的奴隶制；也可能是披着商业外衣的，如当今时代的掠夺性贷款和债务赎回权。被掠夺的主体可能是资本主义外围的农村或原住民共同体，或者是资本主义中心区的主体或从属群体的成员。一旦被掠夺，这些群体可能最终成为被剥削的无产者，如果够幸运，或者说如果不够幸运，可能沦为乞丐、贫民窟居民、佃农、“土著人”或奴隶，成为薪资合同之外的被持续掠夺对象。被没收的资产可能是劳动力、土地、动物、工具、矿藏或能源，但也可能是人、他们的性和生殖能力、他们的孩子和身体器官。然而，重要的是，被掠夺的能力被纳入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简单偷窃不够用。与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的那种掠夺不同，我在这里所谓的掠夺是用于资本积累没收+征用。

这种意义上的掠夺涵盖了许多罪恶，其中大部分都与种族压迫相关。这种关联与资本主义早期历史（尽管仍在进行中）通行的做法有关，很明显，比如领土征服、土地兼并、奴役、强迫劳动、绑架儿童和系统性强奸。但掠夺也有更多的“现代”形式——如监狱劳动、跨国交易、公司土地掠夺和掠夺性的债务赎回权，这些也与种族压迫有关，我们会看到，这与当代帝国主义有关。

然而，这种联系不仅仅是历史和偶然的。相反，资本不断求助于种族化的掠夺背后有着结构性的原因。基本上，一个致力于无限扩张和私人占有剩余价值的体系，让资本家没收主体人口的劳动和生产资料，会带来根深蒂固的利润。掠夺通过两种方式降低生产成本来提高他们的利润：一方面，通过提供廉价的投资，如能源和原材料；另一方面，通过提供低成本的生活资料，如食品和纺织品，使他们能够支付较低的薪资。因此，通过没收非自由或依附性主体的资源和能力，资本家可以更有利地剥削（双重）自由工人。因此，这两种情况是交织在一起的。在每一个曼彻斯特背后都有一个密西西比州。^⑥

即使在“正常”时期也是有利的，但在经济危机时期，掠夺特别有吸引力，因为它是恢复下降的利润率的一个重要的、暂时的解决办法。政治危机也是如此，有时可以通过将没收的财富从看似不威胁资本的人群手中转移到那些威胁资本的人群手中来化解或避免危机——这是另一个通常与“种族”相关的区别。^⑦

那么，总的来说，掠夺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结构性特征，是没有得到承认的让剥削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这两种掠夺绝不是分离和平行的过程，而是系统地交织在一起，是唯一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深深地彼此交织的两个侧立面。它们之间的区分线与杜波依斯所说的“肤色线”大致相关，非常清楚，一点也不模糊。总而言之，对种族化的“他者”的掠夺成为了对“工人”进行剥削的必要前提。

与马克思关于“原初”或原始积累的论述进行对比^⑧，我们可以说明这一观点，它在两个方面有所不同。第一，原始积累指的是资本在系统开始时掠夺最初储存的血淋淋的过程。^⑨与此相反，掠夺指的是一个长期持续的没收过程，对于在一个容易发生危机的系统中维持资本积累是必不可少的。第二，马克思引入了原始积累，以解释无财产的工人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阶级划分的历史根源。掠夺也解释了这一点，但它也带来了另一种社会分工，同样是结构性和后果性的，但马克思没有系统的理论思考这一问题：（双重）自由工人（资本在雇佣劳动中剥削他们）和不自由或依附性主体（它通过其他手段吃掉他们）之间的社会分工。

第二种划分才是本书研究的中心。我的论点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种族化形态已经固化，其基础是一种“标志”，它区分了被剥削的自由主体与被掠夺的依附主体。但要提出这一问题，需要将重点从“经济”转移到“政治”。因为只有通过将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秩序问题化，我们才能掌握这种区别的结构，以及随之而来的“种族”的产生。

三 作为臣民化的掠夺：政治论断

掠夺和剥削之间的区别同时是经济和政治的。从经济上看，这些词语指的是资本积累的机制，是分析上彼此有别但又相互联系的价值增殖方式。从政治上看，它们与统治模式有关，特别是与区分拥有权利的个人和公民与臣民、不自由的产权奴隶和从属群体的依附组织的地位等级有关。在资本主义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被剥削的工人具有自由人的法律地位，他们可以合法地出售他们的劳动力以换取薪资。一旦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并被无产阶级化，他们就会受到保护，至少在理论上，不会被（进一步）掠夺。在这方面，他们的地位与那些劳动、财产和/或人身仍受资本掠夺的人截然不同。后者从未受到政治庇护，他们没有任何防御手段，一次又一次成为公平游戏的掠夺对象。因此，人们认为这些人本身就可以被随意侵犯。由于他们可以限制他人，而他人被剥夺了限制他们的手段，这些他人的状况是敞露在最具惩戒性的食人形式之下。

那么，一般来说，掠夺和剥削之间的区别不仅是资本积累的功能，也是政治统治的功能。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机构——首先是国家——提供或拒绝保护。而且，国家主要是在制定法律和执行上决定了各种地位的等级制度，将公民与臣民、国民与外国人、有身份的工人与依附性的乞丐区分开来。构成了可以被剥削，可以被掠夺的臣民，同时将两者区分开来，国家的政治主体化实践为资本的“自我”增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⑩

然而，国家在这方面并不会单独行动。地缘政治的布局也牵涉其中。在国家层面促成政治臣民化的是一个国际体系，它“承认”国家和国家边界控制合法化，以区分合法居民和“非法外国人”。我们只需要想想目前围绕着移民和难民的冲突，就可以看到这些在地缘政治上促成的政治地位多么容易在种族上法定为等级秩序。

另一套地位等级制度也是如此，它植根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地理环境，将世界分为“中心”和“边缘”。从历史上看，中心区似乎是象征性的剥削中心地带，而边缘区则被认为是象征性的被掠夺场所。这种划分从一开始就被明确地种族化了，与之相关的地位等级制度也是如此：大都市公民与被殖民者，自由人与奴隶，“欧洲人”与

“土著人”，“白人”与“黑人”。这些等级制度也是为了区分被剥削的人口和地区与注定要被掠夺的人口和地区。

为了了解这一切，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政治臣民化——特别是将（双重）自由的、被剥削的公民工人与依附性的、被掠夺的臣民区分开来。这两种状态都是在政治上构成的，但方式有所不同。在资本主义中心，被剥夺权利的工匠、农民和租户通过阶级妥协的历史进程成为被剥削的公民工人，这使他们的解放斗争在民族国家的自由法律框架内走上与资本利益相一致的道路。相比之下，那些成为被掠夺的臣民的人，无论是在边缘地区还是在中心地区，都无法找到这样的妥协方式，因为他们的起义常常被武力镇压。如果说前者的统治是在同意和合法的情况下进行的，那么后者的统治则毫不掩饰地建立在赤裸裸的镇压之上。

此外，这两种身份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实际上共同定义了彼此。在美国，公民工人的地位获得了很多自由的光环，与产权奴隶和原住民的依附性、退化的状况形成对比，他们的人身和土地可以被反复没收而没有代价。^{⑩11}在设定第二种人的臣服地位时，美国国家同时确立了第一种人的常规地位。

然而，如上所述，资本主义内部依附性的臣民的政治形成总是超越了国家边界。由于系统性的原因，根植于地缘政治竞争和经济扩张主义的相辅相成的逻辑，强大的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在更远的地方构成被掠夺的臣民。欧洲殖民国家在全球最远的地方进行掠夺，随后是美帝国主义国家，将数十亿人变成了这样的臣民——没有政治庇护，成熟并准备再次被没收。这些国家创造的可掠夺对象的数量远远超过了他们为剥削而“解放”的公民工人的数量。这一过程也没有随着臣民从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而停止。恰恰相反，大量新的可掠夺对象每天都在产生，甚至是现在，通过后殖民国家、他们的前殖民主以及为资本积累机制加油的跨国家势力——包括通过债务促进掠夺的全球金融机构的联合行动。

这里的共同点又是政治遭遇：无法设定界限和援引庇护措施。事实上，遭遇是掠夺性的最深层含义，是将其与可掠夺性区分开来的东

西。而构成种族压迫核心的正是可掠夺性，即毫无防御和容易受到侵犯的条件。因此，区分剥削的自由主体和掠夺的依附臣民的，是“种族”作为可被践踏的人的标记。

在这一点上，我的主张是，资本主义隐藏有种族压迫的结构性基础。当我们过于狭隘地看待这个体系时，无论是从市场交换的角度还是从自由雇佣劳动的剥削角度，这个基础都被掩盖了。然而，当我们把框架扩展到包括第三种视角，即掠夺视角时，罪魁祸首就出现了，它被理解为让剥削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与后者不同，但与后者关联在一起。通过采用一个包括“政治”和“经济”的扩展版的资本主义视角，我们获得了这个系统对不自由或被掠夺的人的非偶然的依附性，在种族上被标记为天生暴力。在资本主义构成性的剥削与掠夺的气氛中，存在着它与种族压迫长期关联的结构性基础。

四 种族化资本积累的历史体制

然而，我所描述的结构是很容易变化的。它绝不是在资本主义开始时一次性形成的，而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几次重大转变。在某些阶段，剥削和掠夺明显地有所区分，剥削以欧洲核心区为中心，保留给（白人男性）“劳工贵族”，而掠夺则主要在边缘地区，针对的是有色人种。相比之下，在其他阶段，这些区别就变得模糊不清了。这种转变周期性地重塑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种族压迫的动态，我们不能抽象地理解它们。实际上，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结构性的，也是历史性的。

为了说明这一双重条件，我将资本主义的历史描述为一系列的种族化资本积累制度。在这里，在我论证的第二步，我强调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个主要阶段中掠夺和剥削之间的特定的历史关系。对于每个制度，我具体说明了剥削和掠夺的地缘关系和人口统计：它们彼此区分的程度，它们位于不同的区域，并区分了不同的人口。对于每个政权，我也注意到剥削和掠夺的相对比重，以及它们相互联系的独特方式。最后，我确定了每个阶段的政治臣民化的形式。

从16世纪到18世纪的商业资本主义或重商主义资本主义开始。这是马克思在创造“原始积累”这一用语的时代。通过这个短语，他发出信号，在资本主义的这个阶段，资本积累的主要动力不是剥削，而是掠夺。没收是这场游戏的名称，表现在核心区的圈地运动和对整个边缘地区的掠夺、抢劫和“商业狩猎黑皮肤的人”，这两方面都早于现代工业的兴起。^{⑩12}在大规模剥削工厂工人之前，欧洲，特别是非洲和“新世界”，身体、劳动力、土地和矿产财富被大规模掠夺。在商业资本主义中，掠夺与剥削相比简直相形见绌，这对地位等级制度有重大影响。

当然，这个制度产生了种族化臣民的先兆，在后来的阶段中变得如此重要。“欧洲人”对“土著人”，自由人对产权奴隶，“白人”对“黑人”。但是，在一个几乎所有失去财产的人都具有臣民地位，而不是有权利的公民地位的时代，这些区别就不那么明显了。在这个时期，几乎所有的人都缺乏免于被掠夺的政治保护，大多数人的状况不是自由，而是依附性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的后续阶段，当核心区的多数民族男性工人通过政治斗争赢得自由权利时，后一种地位的臣民并没有被专门污名化。只是到了后来，随着大都市国家的民主化和以工厂为基础的大规模剥削双重自由的雇佣劳动的兴起，“自由种族和臣民种族”之间的对比才变得尖锐起来，产生了我们与现代资本主义相关的全面的白人至上主义地位秩序。^{⑩13}

这正是19世纪商业资本主义让位于自由殖民资本主义时发生的事情。在这个新制度中，这两种形式更加平衡，关联更加密切。当然，土地和劳动力的没收仍在继续，因为欧洲国家巩固了海外殖民统治，而美国则在国内剥夺了土著人的财产，实现了永久的“内在殖民”，首先是通过扩大种族化的奴隶制，然后在废除奴隶制后，通过股份种植制度将自由人变成债务人。然而，现在，对边缘地区的不断掠夺与中心地区的高利润剥削密切相关。新的东西是以工厂为基础的大规模制造业的兴起，它塑造了马克思所想象的无产阶级，颠覆了传统的生活形式，引发了广泛的阶级冲突。最终，使大都市国家民主化的斗争为被剥削的工人提供了一个符合文明制度的公民权。然而，与此同时，对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残酷镇压确保了对边缘地区的长期奴役。因

此，依附和自由之间的对立更加尖锐，并且越来越种族化，被映射到人类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种族”上。这样一来，自由的“白人”，即被剥削的公民工人就成了自身让其成为可能的被贱民化(abjected)的人的反面：种族化的被掠夺的臣民。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结构中找到了现代种族主义的长期锚定点。

在自由主义—殖民主义政权中，掠夺和剥削的区分进一步强化了种族化。在这一阶段，掠夺和剥削似乎对应于不同的区域，并区分着不同的人口——一个是被奴役或被殖民的区域，另一个是（双重）自由的区域。然而，事实上，这种区分从来都不是那么清晰的，因为一些采掘业雇佣了殖民地居民从事雇佣劳动，而在资本主义中心区，只有少数被剥削的工人成功地完全逃脱了被反复掠夺。此外，尽管表面上看它们是分开的，但掠夺和剥削在系统上仍然混合在一起：正是对边缘地区（包括中心区的边缘地区）人口的掠夺，为他们提供了廉价的食物、纺织品、矿砂和能源，如果没有这些，对大都市产业工人的剥削就不会有利润。因此，在自由主义—殖民主义时期，这两个区域是不同的，但在单一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它们相辅相成地为资本积累机制服务。

-
1. [◎](#) 吉姆·克劳法泛指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主要针对非洲裔美国人，但同时也包含其他族群）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这些法律上的种族隔离强制公共设施必须依照种族的不同而隔离使用，且在隔离但平等的原则下，种族隔离被解释为不违反宪法保障的同等保护权，因此得以持续存在。但事实上黑人所能享有的部分与白人相较往往是较差的，而这样的差别待遇也造成了黑人长久以来处于经济、教育及社会上较为弱势的地位。——译者注
 2. [◎](#) “黑人马克思主义”这一说法来自塞德里克·罗宾逊(Cedric Robinson)，他提出了黑人解放思想的独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概念。参见Robinson, *Black Marxis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9)。但罗宾逊并没有认可这一传统，而是将自己定位为它的批评者。黑人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主要支持者的作品包括C. L. R. James, *The Black Jacobin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38)；W. E. B. Du Bois, *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 1860—1880* (1938)；Eric Williams, *Capitalism and Slaver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44)；Oliver Cromwell Cox, *Caste, Class, and Race: A Study of Social Dynamics* (Monthly Review Press, 1948)；Stuart Hall, “Race, Articulation, and Societies Structured in Dominance,” *Sociological Theories: Race and*

Colonialism(UNESCO,1980), 305—45;Walter Rodney,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Washington,DC:Howard University Press,1981); Angela Davis,Women,Race,and Class(London:Women's Press,1982); Manning Marable,How Capitalism Under-developed Black America(Brooklyn:South End Press,1983); Barbara Fields, "Slavery,Race,and Ide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New Left Review 181(May—June 1990), 95—118;Robin D.G.Kelley,Hammer and Hoe:Alabama Communists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0), Race Rebels:Culture,Politics,and the Black Working Class(New York:Free Press,1996); Cornel West, "The Indispensability Yet Insufficiency of Marxist Theory" 和 "Race and Social Theory, " 都收录于The Cornel West Reader(New York:Basic Civitas Books,1999), 213—30 and 251—67.

3. [◎](#) 这种说法最初是指旨在阐明法律与种族之间关系的学术研究。此后，它被美国的右翼分子所绑架，他们用它来指定和授权任何形式的系统性反种族主义研究。我在这里以及在本书中使用这个短语，并不带有贬义，而是褒义的，以指定广泛的反种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理论，但不限于黑人解放理论。
4. [◎](#) Michael C.Dawson,Blacks In and Out of the Left(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 Ruth Wilson Gilmore,Golden Gulag:Prisons,Surplus,Crisis,and Opposition in Globalizing Californi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7); Cedric Johnson,Revolutionaries to Race Leaders:Black Power and the Making of African American Politic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7); Barbara Ransby,Making All Black Lives Matter:Reimagining Freedo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8); Keeanga-Yamahtta Taylor,From #Black Lives Matter to Black Liberation(Chicago:Haymarket,2016); and Keeanga-Yamhatta Taylor,Race for Profit:How Banks and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Undermined Black Homeownership(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21).
5. [◎](#) 如果说马克思根本没有考虑这些过程，那是错误的。相反，他在《资本论》中写到的，例如，关于奴隶制、殖民主义、驱逐爱尔兰人和“劳工的后备军”等。但除了最后一点，这些讨论并没有得到系统的阐述。它们也没有形成在他的资本主义概念中发挥不可或缺的结构性作用的类别。见Karl Marx,Capital,Vol. I, trans. Ben Fowkes(London:Penguin,1976), 781—802;854—70;914—26; 和931—40。相比之下，后来的一系列思想家试图将对种族压迫的分析纳入马克思主义。见第46页注释1和第47页注释1。我自己的努力建立在他们的基础上，也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概念论证。
6. [◎](#) 这一表述与杰森·摩尔(Jason Moore)的想法相呼应，他指出，资本不断依赖于（从自然界以及从人身上）掠夺无偿工作，以此作为资本主义营利性生产的条件。他写道：“当生产力最大化的技术开始大量掠夺未被资本化的

自然界时，它们就会恢复系统的理想的资本积累。每一个阿姆斯特丹背后都有一个维斯塔拉盆地。每一个曼彻斯特背后都有一个密西西比河三角洲。” Jason W. Moore, “The Capitalocene, Part II: Accumulation by Appropriation and the Centrality of Unpaid Work/Energy,”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5(2018).

7. [◎](#) 我会在下一节解释，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产生了各种种族的地位等级，将公民与臣民、国民与外国人、自由人与奴隶、“欧洲人”与“土著人”、“白人”与“黑人”、有身份的“工人”与依附性的“乞讨者”区分开来。
8. [◎](#) Marx, *Capital*, Vol. 1, 873—6.
9. [◎](#) 关于将原始积累的概念延伸到原初储存之外的另一种说法，参见Robin Blackburn, “Extende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in *The Making of New World Slavery: From the Baroque to the Modern, 1492—1800*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0)。
10. [◎](#) 资本积累对臣民化的依赖是一个更宏观现象的特殊情况。在其他方面，资本主义的“经济子系统”的存在也依赖于它的外部条件，包括一些只能由政治权力保证的条件。显然，资本积累需要一个法律框架来保证产权、执行合同和裁决争端。同样需要的还有镇压力量，镇压叛乱，维持秩序，管理异议。然后，旨在管理危机的政治举措也被证明在资本主义历史的不同阶段是不可或缺的，就像公共提供的基础设施、社会福利，当然还有货币。请参考本书第五章和“Legitimation Crisis? On the Political Contradictions of Financialized Capitalism,” *Critical Historical Studies* 2, no. 2(2015), 1—33。相比之下，我在这里着重讨论政治臣民化的同样必要的功能。
11. [◎](#) Judith Shklar, *American Citizenship: The Quest for Inclus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2. [◎](#) Marx, *Capital*, Vol. 1, 915.
13. [◎](#) Nancy Fraser and Linda Gordon, “A Genealogy of ‘Dependency’: Tracing a Keyword of the US Welfare State,”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19, no. 2 (Winter 1994), 309—36. 再版收录于Nancy Fraser, *Fortunes of Feminism: From State-Managed Capitalism to Neoliberal Crisi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3)。

在接下来的时代里，掠夺和剥削的关系再次发生变化。从战时开始，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得到进一步巩固，国家资本主义新制度软化了这两种形式的区分，但并没有废除这个区分。在这个时代，掠夺不再排除剥削，而是直接与之结合——如在资本主义中心区的分工的劳动力市场。在这些情况下，资本从种族化的工人那里索取带有没收性质的溢价，支付给他们的薪资远远低于“白人工人”，也低于他们再生产的社会必要成本。因此，在这里，掠夺与剥削直接结合，以二元化工资账目的形式进入了雇佣劳动的内部。

非洲裔美国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农业机械化，许多人被驱赶到北方城市，加入了工业无产阶级队伍之中，但他们沦为二等工人，被分配最肮脏、最琐碎的工作。在这个时代，对他们的剥削被掠夺所覆盖，因为资本未能支付他们再生产的全部成本。支撑这种安排的是他们在吉姆·克劳法下持续的政治奴役。在整个国家资本主义时代里，美国黑人被剥夺了政治保护，因为种族隔离、剥夺公民权和无数其他制度化的羞辱继续剥夺了他们的完全公民权。即使在北方工厂或西方造船厂工作，他们仍然被视为或多或少可以被掠夺的人，而不是完全自由权利的拥有者。因此，他们同时被掠夺和剥削。^①

即使它混淆了这两种情况之间的界限，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也提高了与之相关的地位差异。在资本主义中心区新建立的福利国家为公民—工人的地位提供了额外的象征和物质价值，因为它们扩大了对那些可以申请的人的保护和福利。建立劳动权利、公司谈判和社会保险，它们不仅稳定了资本利益的积累，而且在政治上纳入了那些“仅仅”被剥削的“工人”。然而，其效果是加剧了与那些被排除在这一名称之外的人的令人反感的对比，进一步羞辱了种族化的“他者”。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民权和黑人权力活动家(Black Power Activists)走上街头，后者的脆弱性成为持续的激进抗议的目标，因为这种对比过于不正常，也在经验上是不正义的。

与此同时，在海外的边缘地区，非殖民化的斗争爆发了，在某个时期，掠夺和剥削的区分被合并了。独立承诺将前殖民地居民的地位从附属国臣民提升到有权利的公民。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工人阶级确

实实现了这种地位的提升，但不稳定且条件较差。在一个以不平等交换为前提的全球经济中，对他们的剥削也充满了掠夺，因为尽管殖民统治被推翻，但对他们不公平的贸易制度将价值掠夺到了中心区域。此外，一些人享有的有限的进步被剥夺了，绝大多数人仍然在工资关系之外，被公开征用。然而，现在，掠夺者不仅是外国政府和跨国公司，还有后殖民国家。后者的发展战略主要以进口替代工业化为中心，往往需要征用“自己”的原住民。即使那些认真努力改善农民和工人状况的发展型国家也不能完全成功。紧张的国家资源、新帝国主义的投资和贸易制度，以及持续的土地剥夺，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确保了在后殖民时代，剥削和掠夺两种状态之间的界限仍然模糊不清。

因此，在国家资本主义中，剥削似乎不再与掠夺相区分。相反，一方面这两种现象在带有种族色彩的工业劳动中衔接在一起，另一方面，在彼此达成妥协的后殖民主义的公民身份中也衔接在一起。然而，这两种情况的区分并没有消失，因为这两种情况的“纯粹”变体在中心区和边缘区持续存在。大量的人口仍然被掠夺，纯粹的掠夺；而且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有色人种。其他人“仅仅”被剥削；他们更可能是欧洲人和“白人”。然而，新情况是出现了一些混合情况，一些人同时受到掠夺和剥削。在国家资本主义之下，这些人仍然是少数，但他们是未来世界的预兆。

当我们转向当前的制度时，我们看到掠夺/剥削混合体的巨大扩张。这个阶段，我称之为金融化的资本主义，建立在一个新颖而独特的关系上。一方面，这两个领域的地理和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大规模的工业剥削现在发生在历史上的中心区域之外，即所谓的金砖国家(BRICS)^②，这些国家曾经是半边缘地区。同时，掠夺也在上升——事实上，掠夺有可能再次超过剥削，成为利润的来源。这些发展是密切相关的。随着工业转移和金融转移，掠夺正在变得普遍化，不仅影响到它的传统主体，而且也影响到那些以前因其公民身份而受到保护的工人和自由人。

这里，债务是主要元凶，因为全球金融机构向国家施压，让它们与投资者勾结，从手无寸铁的人群中掠夺财富。事实上，在资本主义边缘地区，农民被剥夺了财产，企业对土地的掠夺也在加剧，这一切都是通过债务手段进行的。然而，他们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几乎所有没有财产的后殖民国家都是以主权债务的形式被掠夺的，因为后殖民国家在国际贷款人的胁迫下，陷入了“结构调整”的困境，被迫放弃发展，转而采取自由化政策，将财富转移给公司资本和全球金融资本。此外，这种结构调整非但没有减少债务，反而使其更加复杂，使偿债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急剧上升，并使无数代人都被掠夺，有些人在出生前就被掠夺了，甚至无论他们是否受到剥削。

在历史中心区，资本积累也越来越多地通过掠夺来进行。由于低龄不稳定的服务工作取代了工会的工业劳动，工资下降到社会必要的再生产成本以下。过去“仅仅”被剥削的工人，现在也被掠夺了。这种双重状况，以前是少数人的专利，但越来越普遍，由于对福利国家的攻击而变得更加严重。社会工资下降了，因为以前专门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的税收被转用于偿还债务和“削减赤字”，希望能安抚“市场”。即使实际工资急剧下降，过去由政府提供的服务，如儿童保育，也被转移到家庭和社区——也就是说，主要是转移到妇女身上，她们同时被雇用从事不稳定的工作，因此被剥削和掠夺。此外，在中心地区，就像在边缘地区一样，对底层的竞争促使企业税收下降，进一步耗尽了国库，显然为更多的“紧缩”提供了理由——实际上，这是一场完成了的恶性循环。额外的企业赠予使来之不易的劳工权利遭到破坏，使曾经受到保护的工人受到侵犯。然而，他们和其他人一样，被期望购买其他地方生产的廉价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持续的消费支出需要扩大消费债务，这在使投资者发财的同时，也吞噬了各种肤色的公民工人，特别是种族化的债务人，他们被引导到被超额掠夺的次贷和发薪日贷款。因此，在每个层面和每个地区，债务都是推动金融化资本主义新一轮掠夺的引擎。

因此，在当前的制度中，我们遇到了一种新的剥削和掠夺的纠缠，以及一种新的政治臣民化逻辑。以前，可征用的依附性臣民和可剥削的自由工人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划分，现在则出现了一个连续体。

一端是越来越多的毫无防备的可掠夺的臣民；另一端是越来越少的受保护的公民工人，“仅仅”受剥削。在中心位置有一个新人物，在形式上是自由的，但却非常脆弱：被掠夺和剥削的公民工人。这个新人物不再局限于边缘人口和少数种族，而是成为常态。

然而，掠夺/剥削的连续过程仍然是种族化的。正如我们在美国看到的那样，有色人种被掠夺部分的比例十分巨大。黑人和棕色人种的美国人长期以来被拒绝信贷，被限制在劣质的隔离住房中，而且工资太低，无法积累储蓄，他们被次级贷款的传播者系统地盯上，因此经历了全国最高的房屋止赎率。同样，长期以来一直缺乏公共资源的少数民族城镇和社区受到了工厂关闭的沉重打击，这不仅使他们失去了工作机会，也失去了税收——因此，用于学校、医院和基本基础设施维护的资金，最终导致了密歇根州弗林特市和新奥尔良市下九区等地的崩溃。最后，黑人男子长期受到不同的判决和严厉的监禁、强迫劳动和社会容忍的暴力（包括在警察手中），被大量掠夺到批判性种族理论家所称的监狱工业综合体中——被关在针对拥有少量快克可卡因的“反毒品战争”和不成比例的高失业率所导致的监禁机构中。尽管前/后关系发生了变化，但种族主义在金融化的资本主义中依然存在，而资本主义确实是一个贪婪的惩戒者。

五 资本主义是否仍旧必定是种族主义的？

对于反种族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来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目前剥削/掠夺区分的弱化是否意味着支撑了四百年资本主义种族压迫的结构最终正在消解？资本主义是否不再必定是种族主义的？如果是这样，种族主义区分不同人口的力量是否也在消退？

这里的分析表明，历史上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种族主义的结构性基础的东西，即使没有完全消亡，也会逐渐崩溃。从起源到现在，资本主义一直都需要掠夺和剥削。然而，在过去，资本主义也要求区分掠夺和剥削，并将人们区分为两种不同的人群，标准就是不同的肤色。相比之下，今天，第二个要求不再成立。恰恰相反，目前的政权几乎征召了所有没有身份的成年人从事有偿劳动，但它支付给绝大多

数人的工资却低于他们的社会必要的再生产成本。通过取消公共供给来减少“社会工资”，它使大部分没有财产的人陷入债务陷阱。金融资本主义使不稳定性普遍化，它几乎同时剥削和掠夺了每一个人。

然而，在资本主义的这个阶段，种族压迫依然存在。有色人种仍然被种族化，他们比其他人更有可能遭遇贫穷、失业、无家可归、饥饿和生病；成为犯罪和掠夺性贷款的受害者；被监禁和判处死刑；被警察骚扰和谋杀；被当作炮灰或性奴隶，变成难民或无休止战争的“附带损害”；被剥夺财产，被迫为暴力、贫穷和气候变化引起的灾难付出代价，只能被关在边境的笼子里或被丢到海上淹死。

综合来看，这些发展提出了一个分析性难题。一方面，金融资本主义正在摧毁以往政权中支撑种族压迫的政治经济结构。另一方面，它仍然隐藏着种族差异和煽动种族对立。问题是，为什么？为什么种族主义在掠夺和剥削的尖锐区分消失后依然存在？为什么那些现在分享剥削兼掠夺的客观条件的人不把自己看作是同一条（漏水的、不适合航行的）船上的同路人？为什么他们不联合起来反对对他们都有伤害的金融资本主义更模糊的掠夺和剥削的关系？

在资本主义历史的早期阶段，这种联合很少出现，这并不令人惊讶。此前，两个前任的种族化分离鼓励资本主义中心区的（双重）自由“工人”将他们的利益和目标与边缘区——包括中心区内的边缘区——的依附臣民分离开来。结果，被理解为阶级斗争的东西很容易与反对奴隶制、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脱节——如果不是直接针对它们的话。反之，有时也是如此：旨在克服种族压迫的运动有时会对与“劳工”的联盟感到绝望，有时甚至对它们不屑一顾。在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其结果是被削弱的解放力量。

但那是当时。今天，当资本主义社会的种族压迫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必要”时，这种联盟的前景如何？这里概述的观点提出了一个预言。客观地说，金融资本主义已经弱化了掠夺和剥削的区分，过去这是支撑种族主义的基础。然而，主观上，新的架构实际上可能会加剧种族对抗——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当数百年的种族污名和侵犯

满足资本对臣民剥削和掠夺的贪婪需求时，其结果是强烈的不安全感和偏执——因此，不顾一切地保障安全，以及种族主义的加剧。

当然，那些以前免受掠夺的人现在并不急于分担掠夺的负担——并不只是因为他们是种族主义者，尽管其中有些人确实是种族主义者。这也是因为他们也有合理的不满，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现出来——他们也应该如此。由于没有一个跨种族的运动来废除一个强加于人的社会制度，他们不满在日益增长的右翼民粹主义队伍中得到了表达。今天，这些运动在资本主义历史核心区的几乎每一个国家——及前边缘区的相当多的国家——都在蓬勃发展。它们代表了对我们时代的“进步的新自由主义”的完全可预见的反应。持这种观点的精英们冷酷地呼吁“公平”，同时扩大掠夺范围——要求那些曾经因为“白人”或“欧洲人”的地位而受保护的人放弃这种有利地位，接受他们日益增长的不稳定性，并向侵犯行为投降，同时将他们的资产输送给投资者，除了道德上的认可，他们没有任何回报。^③

在这种情况下，后种族社会的政治前景并不乐观，尽管有可能出现结构性开放。跨种族联盟不会从掠夺和剥削的新的、更模糊的架构中自发出现。相反，在金融资本主义的恶性掠夺性世界中，种族对立仍然在上升。今天，当非种族资本主义在原则上可能时，由于积重难返的格局、日益加剧的焦虑和犬儒主义操纵的剧毒组合，在实践中，这被禁止了。

然而，在我们哀叹这一事实之前，我们应该问，在目前的条件下，非种族资本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在一种解释中，这将是一个有色人种一方面在全球金融和政治力量的指挥高处，另一方面在后者的被掠夺和被剥削的受害者中占有一定比例的制度。对这种可能性的思考不应该给反种族主义者带来多少安慰，因为这意味着绝大多数有色人种及其他人的生活条件将继续恶化。日益扩大的不平等，让人们变得愈加偏激，这种类型的非种族的资本主义顶多只会随着种族仇恨逐渐增加，让人们有着平等机会去食人。

这里的分析表明，人们迫切需要进行更彻底的变革。尽管进步的新自由主义者声称，种族主义不能通过机会平等的食人化来被击败，

也不能通过普通自由主义者的法律改革来被打败。同样地，与黑人民族主义者的步伐一致，解药并不在企业、社区控制或自我决定中。也不像传统社会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只关注剥削就能解放种族化的人口——事实上，也不可能解放任何肤色的劳动人民。相反，正如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也有必要针对与剥削有系统关联的掠夺。事实上，需要的是克服资本主义的掠夺和剥削的关系，改变整个架构，通过废除产生它们的共生关系的更大的系统来根除资本主义的掠夺和剥削。

今天，要克服种族主义，需要建立跨种族联盟，以实现这一变革。虽然这种联盟不会因为结构性变化而自动出现，但它们可以通过持续的政治努力来构建。其必要条件是强调金融资本主义中剥削和掠夺的共生关系的观点。通过揭露它们的相互关系，这样的观点表明，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单独被克服。他们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就像那些曾经如此尖锐分裂而现在又如此令人不爽地接近的人群的命运。今天，当被剥削者也是被掠夺者，反之亦然时，也许最终有可能设想他们之间的联盟。也许在模糊了这两种人之间的界限时，金融资本主义正在为他们的共同废除创造物质基础。但是，还是要靠我们把握这一天，把历史的可能性变成解放的真正历史力量。

无论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但当我们考虑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额外的结构性特征时，它就变得更加复杂。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种族化的掠夺并不是这个社会中唯一根深蒂固的统治形式。相反，我们已经指出的其他隐秘场所中——政治的、生态的和社会的场所——的各种不公正现象，与种族化的资本主义有着同样的地位，并与那些不平等现象深深纠缠在一起。要充分理解种族主义，也需要理解它们。因此，我在下一章中转向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结构性区分所产生的性别化形式的食人现象。

-
1.  我的意思是，在国家资本主义中，种族化劳工的情况结合了掠夺因素和剥削因素。一方面，美国中心区的有色人种工人得到了工资，但这个工资低于他们再生产的平均社会必要成本。另一方面，他们拥有自由人和美国公民的正式地位，但他们不能要求公共权力来维护他们的权利。相反，那些本应保护他们免受暴力的人往往是暴力的实施者。因此，他们的地位融合了这两种状态的政治和经济方面。以这种方式来理解，作为剥削和掠夺的混合体，比通过更熟悉的“超级剥削”的概念更好。虽然这个术语不可否认地令人回

味，但它只关注种族工资差距的经济问题，而忽略了地位差异的问题。与此相反，我的方法旨在揭示经济掠夺与政治奴役的关联。关于超级剥削的讨论，参见Ruy Mauro Marini, *Dialéctica de la dependencia* (Mexico City: Ediciones Era, 1973)。

2. [!\[\]\(5268fb1e37dbaa0ec0d43058e1582268_img.jpg\)](#) 金砖国家指的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
3. [!\[\]\(d32a77ed237efbc9c4ac65588b21e3a5_img.jpg\)](#) 对于进步的新自由主义，参见Nancy Fraser, “The End of Progressive Neoliberalism,” *Dissent* (Spring 2017)。也可以参见 Nancy Fraser, *The Old Is Dying and the New Cannot Be Born: From Progressive Neoliberalism to Trump and Beyond*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9)。

第三章

护理消耗者：为什么社会再生产是资本主义危机主要场所？

如果资本以种族化人口的财富为食，那么它也是一个护理的消耗者(guzzler of care)。①它食人的这一方面在今天表现为广泛的社会倦怠和缺少时间——这些经历在社会现实中源自结构性基础。事实是，我们的社会系统正在消耗照顾家庭、维持家庭、维持社区、滋养友谊、建立政治网络和建立团结所需的能量。这些活动通常被称为护理工作，对社会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它们每天和每代人都在补充人类的能量，同时也维持社会联系。此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们保证了商品化的劳动力的供应，资本从这些劳动力中汲取剩余价值。没有这种我称之为社会再生产的劳动，就不可能有生产、利润或资本；不可能有经济、文化或国家。事实上，可以说，任何社会，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其他社会，如果系统地吞噬社会再生产，都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然而，目前的资本主义形式就是这样做的：将本应用于护理工作的情感和物质资源转移到其他非必要的活动之中，这些活动在使我们挨饿的同时，也使企业的库房变得更为丰盈。其结果是一个重大的危机——不仅仅是护理，而是最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再生产。

尽管这场危机很糟糕，但它只是本书中所描述的更大的饕餮盛宴的一种表现。在这个时期，资本不仅在吞噬社会再生产，也在吞噬公共权力和政治能力，以及自然和种族化人口的财富。其结果是我们整个社会秩序的普遍危机，这个危机的各个环节相互交织，相互加剧。然而，目前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经济或生态方面，忽视了社会再生产，

尽管其非常紧迫和重要。这种忽视无疑与性别歧视有关，阻碍了我们迎接挑战的能力。“护理”是更广泛的危机的核心，以至于没有任何其他方面可以从它那里得到适当的理解。然而，反过来也是如此：社会再生产的危机不是孤立的，我们不能单独来理解它。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呢？

我建议将目前的“护理紧缩”解释为资本主义内在的社会再生产矛盾的尖锐表现。这一表述提出了两个观点。首先，目前护理方面的压力不是偶然的，而是在我们目前的社会秩序中有着深刻的结构性根源的，我在前几章中把它称为金融资本主义。然而——这是第二点——目前的社会再生产危机表明，不仅在系统的当前形势中，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本身也有一些腐朽的东西。不仅仅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本身也必须变革。

那么，我的主张是，每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社会都隐藏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矛盾或危机倾向：一方面，社会再生产是资本持续积累的必要背景条件；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对资本无限积累的驱动力导致它吞噬了它所依赖的社会生产活动本身。资本主义的这种社会矛盾是我们所谓的护理危机的根源。尽管资本主义本身是固有的，但它在每一个历史上特定形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都呈现出不同和独特的面貌。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护理赤字是这种矛盾在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金融阶段所表现的形式。

一 在生活世界中自由驰骋

要了解其原因，我们需要发展什么是资本主义矛盾的看法。大多数分析家强调该系统经济的内部矛盾。他们说，其核心是一种内在的自我稳定的倾向，它在经济危机中定期表现出来：在股市崩溃、枯荣周期和全面萧条中。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就其本身而言。但它未能提供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全景，因为它忽略了这个社会系统的一个关键特征：资本不止在经济领域中（或者，正如我所说的，在经济领域后面）吞噬着财富。然而，当我们采用前几章所概述的扩展版资本主义的概念时，就可以很快补救这种疏忽。因为它包括官方经济和非经济

背景条件，这种观点允许我们对资本主义的全部矛盾进行概念化和批评，包括那些进入社会再生产的矛盾。让我解释一下。

资本主义经济依赖于——可以说是搭便车——自给、护理和互助的活动，这些活动产生并维持社会关联，尽管它没有赋予它们货币化的价值，并把它们当作免费的。这种活动被称为“护理”“情感劳动”或“主体化”，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人类主体，维持他们作为有形的自然人，同时也使他们作为社会人存在，形成他们的习惯和他们所处的文化精神。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就是养育和教化年轻人。正如照顾老人、维持家庭、建立社区和维持共同的意义、情感处置和支撑社会合作的价值视野。

从广义上理解，这样一来，社会再生产工作对每个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承担着另一个更具体的功能：生产和补偿资本剥削其劳动力以获得剩余价值的阶层。那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护理工作产生的劳动被系统称为“生产性的”，但其本身却被视为“非生产性的”。当然，许多（尽管不是全部）护理工作确实位于官方经济的价值积累循环之外——家庭和社区、民间社会机构和公共机构。而且，在资本主义意义上产生价值的工作相对较少，即使是有报酬的工作。但是，无论在哪里做，无论是否有报酬，社会生产活动对于资本主义的运作都是必要的。如果没有家务劳动，那些生产性的有偿工作和从中榨取的剩余价值都不可能存在。只有通过家务劳动、养育子女、学校教育、情感关怀以及一系列相关活动，资本才能获得在质量和数量上适合其需求的劳动力。社会再生产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②

然而，至少从工业时代开始，资本主义社会已将社会再生产的工作与经济生产的工作分开。他们把前者与妇女联系在一起，把后者与男人联系在一起，把再生产活动放在感情的云雾笼罩之中，似乎这种工作应该是它自己的奖励，或者如果不是这样，似乎它只需要得到绵薄的回报，而不像直接为资本所作的工作，（在理论上）可以得到工人实际生活所需要的工资。通过这种方式，资本主义社会为新的、现代形式的妇女从属关系奠定了制度基础。他们把社会再生产劳动从更

大的人类活动中分离出来，而妇女的工作在人类活动中曾有公开的地位，他们把社会再生产劳动归入一个新的制度化的家庭领域，掩盖了其社会价值，任其笼罩在新发明的女性特征概念的迷雾中。在这个新的世界里，金钱成为权力的主要媒介，它的无偿劳动或低偿劳动使问题得到解决：那些从事社会再生产工作的人在结构上从属于那些在官方经济中通过产生剩余价值的劳动赚取生活费的人，即使前者的工作是使后者的工作成为可能的基本条件。

总的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将社会再生产与经济生产分开，将社会再生产与妇女联系起来，并掩盖了其重要性和价值。然而，矛盾的是，官方经济同样依赖于同一个社会再生产过程，而他们不承认这些过程的价值。这种分裂 (division)— 依赖 (dependence)— 异议 (disavowal) 的特殊关系是动摇 (destabilization) 的秘诀。事实上，这四个D字开头的单词概括了一个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生产不是自给自足的，而是依赖于社会再生产；另一方面，它对资本无限积累的驱动力有可能破坏资本和我们其他人所需要的再生产过程和能力的稳定性。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效果将定期危及资本主义经济的必要社会前提条件。

实际上，这里有一个深藏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结构中的“社会矛盾”。像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的经济矛盾一样，这个矛盾也是危机趋势的基础。然而，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不是位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而是位于分隔（和连接）生产和再生产的边界之上。它既不是经济内部的，也不是家庭内部的，而是在这两个领域各自的规范语法—行动逻辑之间建立起了冲突。当然，通常情况下，这种矛盾是不明显的，相关的危机趋势也是不明显的。然而，当资本对扩大积累的驱动力与它的社会基础脱节，并与之背道而驰时，它就变得更为尖锐了。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经济生产的逻辑凌驾于社会再生产的逻辑之上，破坏了资本赖以生存的过程——损害了长期维持积累所需的社会能力，包括家庭内部能力和公共能力。破坏自己的可能性条件，资本的积累动态模仿了衔尾蛇，自己吃了自己的尾巴。

二 资本主义护理的历史阵痛

这种社会矛盾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矛盾，铭刻在资本主义的DNA之中。但它在这个系统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形式。事实上，社会再生产的资本主义组织经历了重大的历史转变，它往往是政治争论的结果。特别是在危机时期，社会行动者对划分经济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工作与家庭的不同边界提出争议，有时还成功地重新划分了这些边界。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说，这种“边界斗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与经常被左派所推崇的生产斗争一样，都是它的核心问题，它们与生产斗争交织在一起。而这些斗争产生的转变，往往标志着划时代的变革。

以这些变革为前提的看法，在资本主义史上区分四种社会再生产和经济生产制度。这些制度与第二章中调查的种族化资本积累制度的顺序相吻合，它们与这些制度的变革相互交叉和重叠。在这里，我们也遇到了16至18世纪的商业资本主义制度，19世纪的自由殖民制度；20世纪中期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当今时代的金融资本主义制度。然而，我在这里的重点是社会再生产的劳动，它是如何组织的，以及它在每个阶段的位置。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被定位为家庭成员、在私人家庭中工作的（无偿或低偿）家务人员、营利性公司的雇员、社会活动家和公民社会的志愿者，还是受薪的公务员？

对于每个政权来说，这些问题都得到了不同的答案。因此，经济生产的社会再生产条件在每个时代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危机也是如此，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就是通过这些危机现象表现出来的。最后，在每一个政权中，这种矛盾激起了独特形式的社会斗争——当然这些是阶级斗争，但也是边界斗争，而且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它们都是解放斗争。

三 殖民化与家庭主妇化

首先，看一下16世纪到18世纪的商业资本主义制度。在新兴的帝国商业中心区，这一制度使创造和维持社会关联的事务与以往差不多，即在村庄、家庭和延伸的亲属关系中，由习俗和教会来管理，国家并没有涉足其中，相对不受价值规律的影响。然而，与此同时，这

个政权暴力地破坏了边缘地区的前资本主义社会联系——掠夺农民、奴役非洲人、劫掠原住民，所有这些都无情地无视家庭、社区和亲属的礼节。随之而来的反抗代表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社会再生产斗争的第一个阶段。

在19世纪的所谓自由资本主义下，随着欧洲国家殖民统治的巩固，对边缘区域社会性的大规模攻击仍在继续。但大都市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资本主义中心区的早期制造业中心，工业资本家们把妇女和儿童拖进工厂和矿场，渴望得到他们的廉价劳动力和驯化。这些工人拿着绵薄的薪资，在不健康的条件下长时间工作，成为资本无视支撑其生产力的社会关系和能力的标志。^③因此，在这里，生产和再生产的必要性似乎是相互直接矛盾的。其结果是至少在两个层面上出现了危机：一方面是穷人和工人阶级的社会再生产危机，他们的维持和补偿能力已经到了极限；另一方面是中产阶级的道德恐慌，他们对自己摧毁了家庭和消除了无产阶级妇女的性别感到羞愧。这种情况是如此可怕，甚至像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精明的批判家都把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之间的早期正面冲突误认为是最后的结果。想象着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它的最终危机，他们认为，随着这个系统对工人阶级家庭的驱逐，它也在铲除妇女受压迫的基础。^④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社会找到了处理这一矛盾的资源——部分是通过创造现代形式的“家庭”；发明新的、强化的性别区别的含义；从而让男性统治现代化。

在欧洲的核心地区，调整过程以保护性立法开始。其目的是通过限制在工厂劳动中对妇女和儿童的剥削来稳定社会再生产。在中产阶级改革者与新生的工人组织的联合推动下，这一“解决方案”反映了不同动机的复杂组合。^⑤经济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一个著名论点是，在一场划时代的战斗中“保护社会，反对经济”，他将这场战斗命名为“双重运动”，即自由市场主义者与社会保护主义者之间的对抗。^⑥另一个动机是为了缓解对“性别平等”的焦虑。但这些动机也与其他东西纠缠在一起：特别是在家庭中，坚持男性对妇女和儿童的权威。^⑦因此，为确保社会再生产的完整性而进行的斗争，与维护男性统治的斗争结合在一起。

然而，它的预期效果是在资本主义核心区淡化社会矛盾——即使奴隶制和殖民主义在边缘地区将其提高到一个极端的高度。自由殖民资本主义创造了被女性主义社会学家玛丽亚·米斯(Maria Mies)称为“家庭主妇化”的东西^⑧，作为殖民化的反面，阐述了一种新的性别想象，即独立领域。将妇女塑造成“家庭中的天使”，其支持者试图为经济动荡创造稳定的压舱物。残酷的生产世界被一个“无情世界的避风港”所包围。^⑨只要每一方都保留自己的领域，并作为另一方的补偿，他们之间的潜在冲突就会一直被掩盖着。

在现实中，这种“解决方案”被证明是相当不稳定的。当工资仍然低于养家糊口所需的水平时，当拥挤的、被污染笼罩的公寓剥夺了隐私、损害了生育能力、损害了健康、缩短了生命时，当就业本身（如果有的话）由于破产、市场崩溃和金融恐慌而产生剧烈波动时，保护性立法无法确保劳工的再生产。这种安排也没有让工人满意。为了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条件，他们成立了工会，举行了罢工，并加入了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在日益尖锐、广泛的阶级冲突的影响下，资本主义的未来似乎没有任何保证。

可以证明，将各领域分开也同样有问题。贫穷的、种族化的和工人阶级的妇女无法满足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务理想；如果保护性立法减轻了她们的直接剥削，它也没有提供物质支持或对工资损失的补偿。那些能够符合维多利亚时代理想的中产阶级妇女也不总是满足于她们的处境，她们将物质上的舒适和道德上的声望与法律上的少数和制度上的依赖结合起来。对这两个群体来说，独立领域的“解决方案”主要是以妇女为代价的。但它也使她们彼此对立——例如19世纪关于卖淫的斗争，将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妇女的慈善关注与她们的“失足姐妹们”的物质利益结合起来。^⑩

在边缘地带，则是另一番景象。在那里，随着资源榨取的殖民主义对被奴役人口的蹂躏，没有人可以确保独立领域和社会保护。都市的强权非但没有寻求保护本地人的社会再生产关系，反而积极推动其破坏。农民被掠夺，他们的社区被破坏，以供应廉价的食物、纺织品、矿脉和能源，没有这些东西，对大都市工业工人的剥削就不会有

利润。同时，在美洲，被奴役的妇女的再生产能力被粗暴地剥夺，并屈从于种植者的利润算计，她们的家庭经常被拆散，因为她们会被转卖给不同的主人，相隔遥远。^{⑩11}原住民儿童也被带离了他们的社区，被塞入传教士学校，并接受强制性的同化训练。^{⑩12}当需要合理化的时候，辩解者可以很容易地援引原住民妇女不具有自然能力，还有非西方性别关系太过落后、处于父权制状态。后者的理由在殖民时期的印度很有效，慈善的英国妇女在那里找到了一个公共平台，敦促“白人男子从棕色男子手中拯救棕色妇女”^{⑩13}。

在边缘和中心这两种环境中，女权运动发现自己在政治雷区上踟蹰不前。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者拒绝隐蔽场所和独立领域，同时要求有选举权、拒绝性行为、拥有财产、签订合同、从事专业工作和控制自己的工资的权利，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似乎更看重像男人一样的对自主的渴望，而不是像女人那样被养育的理想。在这一点上，即使在其他方面，他们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实际上也会同意。后者认为妇女进入有偿劳动是通往解放的途径，他们也喜欢与生产有关的价值，而不是与生殖有关的价值。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性别关联是意识形态上的，但它们背后有一个深刻的直觉：尽管它带来了新的统治形式，但资本主义对传统亲属关系的侵蚀包含了一个解放元素。

在这种情况下，女性主义者陷入了双重困境。许多人在波兰尼的双重运动的任何一边都没有找到安慰。无论是依附于男性统治的社会保护，还是无视社会再生产的市场化，都不能很好地满足她们的需求。由于既不能简单地拒绝也不能完全接受自由主义秩序，一些人试图发展第三个方向，他们称之为解放。在女性主义者设法令人信服地体现这一术语的范围内，他们引爆了波兰尼的两极模式，有效地将其转化为一个三极运动。^{⑩14}在这种三极冲突中，保护和市场化的支持者不仅相互冲突，而且还与解放支持者发生冲突：他们当然会与女性主义者，但也与社会主义者、废奴主义者和反殖民主义者发生冲突，他们都努力将波兰尼的两极对立起来，甚至在它们之间发生冲突。

尽管在理论上很有希望，但这样的战略却很难实施。只要“在经济中保卫社会”的努力与维护性别等级制相联系，女性主义者对男性

统治的反对就很容易被理解为对蹂躏工人阶级和边缘区域的经济力量的认可。当自由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在其多重矛盾的重压下崩溃之后，在帝国主义战争、经济萧条和国际金融混乱的阵痛中，可以看到，这些关联长期存在，并最终在20世纪中期让位于一个新的体制。

四 福特主义和家庭薪资

进入国家资本主义阶段。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灰烬中诞生的这个体制，试图以一种全新方式来化解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之间的矛盾——将国家权力放在再生产的一边。这个时代的国家对所谓的社会福利承担了一部分公共责任，试图对抗剥削和大规模失业对社会再生产的侵蚀作用。资本主义中心区的民主福利国家和边缘地区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都接受了这一目标，尽管它们各自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有着天壤之别。

同样，其动机很复杂。一部分开明精英认为，资本榨取最大利润的短期利益必须服从于长期维持资本积累的要求。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建立，是为了避免让资本主义制度走向自我崩溃，避免在大众动员的时代出现革命幽灵。从生命政治角度来看，生产力和盈利能力要求培养一支健康的、受过教育的、与制度有关的劳动力，而不是一支衣衫褴褛的革命乌合之众。^{⑩15}在这个时代，资本主义关系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中，以至于工人阶级不再拥有自我再生产的手段，在医疗保健、学校教育、儿童保育和养老金方面的公共投资，由企业提供补充，这些都是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再生产不得不走向内在化，纳入资本主义秩序的管理范围。

该项目与经济“需求”的新问题相吻合。为了平息资本主义特有的枯荣周期，经济改革者试图通过使资本主义中心区的工人作为消费者承担双重责任来确保持续增长。接受工会（带来更高的工资）和公共部门支出（创造就业机会），政策制定者现在将家庭重塑为国内消费大规模生产的日常用品的私人空间。^{⑩16}这种福特主义一方面将流水线与工人阶级的家庭消费主义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又与国家支持的

再生产联系起来，形成了市场化和社会保护的新的综合体——波兰尼认为这两极是对立的。

但是，首先是工人阶级——包括妇女和男性——带头为公共供给而斗争；他们出于自身的原因而行动。问题在于，他们是民主公民在社会中的成员，因此，尊严、权利和受尊重程度，以及安全和物质福利，所有这些都被理解为需要稳定的家庭生活。因此，在拥护社会民主时，工人阶级也在评价社会再生产，以对抗经济生产的所有消耗性动力。实际上，他们是在为家庭、国家和生活世界投票，反对工厂、制度和机器。与之前体制的保护性立法不同，国家资本主义解决方案是阶级妥协的结果，代表了一种民主进步。与之前体制不同的是，新的安排至少对一些人来说，在一段时间内起到了稳定社会再生产的作用。对于资本主义中心区的多数种族化的工人来说，他们家庭生活的物质压力缓解了，这促进了政治融合。

但在我们急于宣布这是一个黄金时代之前，我们应该注意到，让这些成就成为可能的东西，存在一个基础性的排斥。和以前一样，在中心区对社会再生产的保护与（新）帝国主义纠缠在一起。福特主义为社会权益提供资金，部分是通过边缘——包括“中心国家中的边缘国家”——的长期掠夺，这在去殖民化后以或新或旧的形式持续存在。^{⑩17}同时，处于冷战夹缝中的后殖民地国家将已经被帝国掠夺殆尽的大部分资源用于大规模的发展项目，这往往需要掠夺“自己”的原住民。对于边缘地区的绝大多数人来说，社会再生产仍然不在治理的范围内，因为农村人口只能自生自灭。就像它的前身一样，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也与种族等级制度纠缠在一起，正如我们在第二章看到的那样。美国的社会保险排除了家庭和农业工人，有效地削减了许多非洲裔美国人的社会权利。^{⑩18}奴隶制时期开始的再生产劳动的种族分工，在吉姆·克劳法时期有了新的表现，有色人种妇女找到了低薪工作，为“白人”家庭照顾孩子和打扫房屋——这是以无法护理她们自己的家庭为代价的。^{⑩19}然后，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所看到的，国家资本主义也依赖于一个新的工业—能源综合体，以内燃机和精炼油为中心。其结果是将全球北方的社会再生产收益建立在大规模的生态破坏之上，但这种破坏不仅仅存在于全球南方。

在这些安排中依然存在性别等级制度。在一个时期——大约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末——当女性主义运动没有得到公众的关注时，几乎没有人质疑这样的观点：工人阶级的尊严需要“家庭薪资”，男性在家庭中的权威，以及明确意识到性别差异。因此，在中心国家，国家资本主义的广泛趋势是重视异性恋，男性养家糊口，女性勤俭持家这样两性分工的家庭模式。对社会再生产的公共投资强化了这些规范。在美国，福利制度采取了二元化的形式，一方面为缺乏男性薪资的（主要是“白人”）妇女和儿童提供名声不太好的贫困救济，另一方面为那些被视为“工人”的人（主要是“白人”男性）提供带来尊重的社会保险。^{②0}相比之下，欧洲的安排以不同的方式巩固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等级制度，在许多情况下，母亲的养老金和与有偿劳动挂钩的权利之间的划分，在许多情况下是由国家内部竞争产生的鼓励生育议题而推动的。^{②1}这两种模式都证明并鼓励家庭薪资。对家庭和工作的制度化理解，使异性恋、性别二元论和性别等级制度变得十分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将不平等现象从政治议题中剔除。

在所有这些方面，社会民主主义为社会保护和市场化的联盟牺牲了解放，即使它在数十年间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但国家资本主义制度逐渐开始解体；首先是政治上的解体，在60年代，全球新左派运动爆发，以解放的名义挑战其帝国、性别和种族隔离，以及其官僚家长制；然后是经济上解体，在70年代，滞胀、“生产力危机”和制造业的利润率下降迫使新自由主义者努力解除了市场化的束缚。如果这两方联合起来，最终被牺牲掉的将是社会保护。

五 双职工家庭

就像之前的自由殖民政权一样，国家资本主义秩序在漫长的危机中解体了。到20世纪80年代，有先见之明的观察家可以看出一个新体制的雏形，它将成为当今时代的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这个制度促进了国家和企业对社会福利的投资，同时大量招募妇女加入有偿劳动队伍——将护理工作外化到家庭和社区，同时削弱了她们的能力。其结果是一种新的、双重化的社会再生产组织，对那些有能力支付的人来说是商品化的，对那些没有能力支付的人来说是私

有化的，因为第二类人中的一些人提供护理工作，以换取第一类人的低薪。同时，女性主义批判和非工业化的一举两得，明确地剥夺了家庭薪资的所有可信度。这个社会民主的理想已经让位于今天的“双职工家庭”的新自由主义规范。

这些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以及这一制度的关键特征，是债务成为了中心。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所看到的，债务是全球金融机构向国家施压的工具，用来削减社会开支，强制执行紧缩政策，并与投资者勾结，从手无寸铁的人群中榨取价值。全球南方的农民也主要是通过债务被掠夺——被新一轮的企业土地圈地运动所掠夺，目的是垄断能源、水、耕地和“碳补偿” (carbon offsets) 的供应。在历史的中心区域，资本积累也越来越多地通过债务进行：随着低薪、不稳定的服务劳动取代了工会下的工业劳动，工资下降到社会必要的再生产成本以下；在这种“零工经济” (gig economy) 中，持续的消费支出需要扩大消费信贷，而消费信贷则以指数形式增长。^{②2}换句话说，现在资本越来越多地通过债务吞噬劳动力，规训国家，将财富从外围转移到中心，并从家庭家族、社区和自然界攫取价值。

其结果是加剧了资本主义在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基本矛盾。前一个体制允许国家使私人公司的短期利益服从于资本积累的长期目标，部分是通过公共供给来稳定再生产，而当下的体制允许金融资本为了私人投资者的直接利益来规训国家和公众，特别是要求公共投资脱离社会再生产。以前的制度是将市场化与社会保护结合起来，反对解放，而现在的制度则产生了一种更反常的构造，即解放与市场化结合起来，破坏社会保护。

新体制是在两个斗争的命运交汇中出现的。一个是自由市场主义者一心想要使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与核心国家日益衰落的劳工运动对立起来；后者曾经是支持社会民主的最强大的基础，现在即使没有完全被打败，也处于守势。另一个斗争使反对性别、种族、民族和宗教等级制度的进步的“新社会运动”与寻求维护既定的生活世界和（适度的）特权的人群对立起来，这些人现在受到新经济的“世界主义”的威胁。在这两个斗争的碰撞中，出现了一个令人震惊

的后果：一个进步的新自由主义，它推进“多样性”、贤人政治和“解放”，同时废除了社会保护，重新将社会再生产外部化。其结果不仅是将没有防御能力的人群抛弃在资本掠夺之下，而且还以市场方式重新定义什么是解放。^{②23}

解放运动参与了这个过程。所有这些运动——包括反种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性少数者(LGBTQ)解放和环保主义——都产生了对市场友好的新自由主义潮流。但鉴于资本主义长期以来对性别和社会再生产的关联，女性主义的发展尤为重要。像它之前的体制一样，金融资本主义在性别的基础上将生产与再生产的划分加以制度化。然而，与之前体制不同的是，它的主流相反是自由个人主义和性别平等主义：妇女应该在每个领域与男人平等，应该有平等的机会来实现她们的才能——也许特别是在生产领域。相比之下，再生产似乎是一种落后的残留物，是一种必须以某种方式甩掉的进步障碍——在通往解放的路上。

-
1. ^② 本章的早期法语版本已于2016年6月14日在巴黎作为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马克·布洛赫讲座发表，可在该研究院的网站上查阅。我感谢皮耶尔-西里尔·奥特考(Pierre-Cyrille Hautcœur)的讲座邀请，感谢约安娜·奥克萨拉(Johanna Oksala)的讨论，感谢马拉·吞(Mala Htun)和爱礼·撒列茨基(Eli Zaretsky)的有益评论，感谢塞兰·埃贝(Selim Heper)的研究协助。
 2. ^② 许多女性主义理论家都提出了这一版本的论点。标志性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表述包括Eli Zaretsky, *Capitalism, the Family, and Personal Life* (London: Pluto Press, 1986); and Lise Vogel,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Boston: Brill, 2013]。另一种更有力的阐述可以参看Nancy Folbre, *The Invisible Heart* (New York: New Press, 2002)。后来社会再生产理论家的阐述包括Barbara Laslett and Johanna Brenner, “Gender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5(1989); Kate Bezanson and Meg Luxton, eds., *Social Reproduction*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Isabella Bakker,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a Gendered Political Economy,” *New Political Economy* 12, no. 4(2007); *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 Remapping Class, Recentering Oppression*, ed. Tithi Bhattacharya (Pluto Books, 2017); Susan Ferguson, *Women and Work: Feminism, Labor,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Pluto, 2019); and Cinzia Arruzza, Tithi Bhattacharya, and Nancy Fraser, *Feminism for the 99%: A Manifesto* (Verso, 2019)。

3. [Ⓞ](#) Louise Tilly and Joan Scott, *Women, Work, and Family* (London: Routledge, 1987).
4. [Ⓞ](#)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Marx– Engels Reader*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1978), 487–8; Friedrich Engels,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Chicago: Charles H. Kerr, 1902), 90–100.
5. [Ⓞ](#) Nancy Woloch, *A Class by Herself*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6. [Ⓞ](#)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2001), 87, 138–9, 213.
7. [Ⓞ](#) Ava Baron, “Protective Labour Legislation and the Cult of Domesticity,”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 no. 1 (1981).
8. [Ⓞ](#) Maria Mies, *Patriarchy and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4), 74.
9. [Ⓞ](#) Eli Zaretsky, *Capitalism, the Family, and Personal Life* (London: Pluto Press, 1986); Stephanie Coontz, *The Social Origins of Private Life* (London: Verso, 1988).
10. [Ⓞ](#) Judith Walkowitz, *Prostitution and Victorian Societ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Barbara Hobson, *Uneasy Virtue: The Politics of Prostitution and the American Reform Tra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11. [Ⓞ](#) Angela Davis, “Reflections on the Black Woman’s Role in the Community of Slaves,” *Massachusetts Review* 13, no. 2 (1972).
12. [Ⓞ](#) David Wallace Adams, *Education for Extinction: American Indians and the Boarding School Experience, 1875–1928*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5); Ward Churchill, *Kill the Indian, Save the Man: The Genocidal Impact of American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s*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2004).
13. [Ⓞ](#) Gayatri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1988), 305.
14. [Ⓞ](#) Nancy Fraser, “A Triple Movement? Parsing the Politics of Crisis after Polanyi,” *New Left Review* 81 (May–June 2013) pp. 119–132.
15. [Ⓞ](#) Michel Foucault, “Governmentality,” in *The Foucault Effect*, ed. Graham Burchell, Colin Gordon, and Peter Mill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87–

104; Foucault,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8—1979*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64.

16. [!\[\]\(145e85c89d89b56a579e3876ae5212b3_img.jpg\)](#) Kristin Ross, *Fast Cars, Clean Bodies: Decolonization and the Reordering of French Culture* (Cambridge, MA, 1996); Dolores Hayden, *Building Suburbia: Green Fields and Urban Growth, 1820—2000* (New York: Pantheon, 2003); Stuart Ewen, *Captains of Consciousness: Advertising and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Consumer Cul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8).
17. [!\[\]\(84b285892277a3a460ccaad312647f7d_img.jpg\)](#) 在这个时代，国家对社会再生产的支持由税收和专项资金提供资金，大都市工人和资本根据特定国家内的阶级权力关系以不同的比例提供资金。但这些收入来源因通过外国直接投资的利润和基于不平等交换的贸易从边缘地区吸走的价值而增殖。参见 Raúl Prebisc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 (New York: U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ffairs, 1950); Paul Bar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57); Geoffrey Pilling, “Imperialism, Trade, and ‘Unequal Exchange’ : The Work of Aghiri Emmanuel, ” *Economy and Society* 2, no. 2 (1973); Gernot Köhler and Arno Tausch, *Global Keynesianism: Unequal Exchange and Global Exploitation*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2001)。
18. [!\[\]\(2248aa838117268516d68c3f7c82c935_img.jpg\)](#) Jill Quadagno, *The Color of Welfare: How Racism Undermined the War on Pover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Ira Katznelson, *When Affirmative Action Was White: An Untold History of Racial Ineq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2005).
19. [!\[\]\(db2d38bc7b7cce1a26a50a8eb2bde03e_img.jpg\)](#) Jacqueline Jones, *Labor of Love, Labor of Sorrow: Black Women, Work, and the Family from Slavery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Vintage, 1985); and Evelyn Nakano Glenn, *Forced to Care: Coercion and Caregiving in Americ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0. [!\[\]\(77edff6809b64db8c27f091ad6c8afeb_img.jpg\)](#) Nancy Fraser, “Women, Welfare, and the Politics of Need Interpretation, ” in *Unruly Practices: Power, Discourse, and Gender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Barbara Nelson, “Women’s Poverty and Women’s Citizenship, ”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10, no. 2 (1985); Diana Pearce, “Women, Work, and Welfare, ” in *Working Women and Families*, ed. Karen Wolk Feinstein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79); Johanna Brenner, “Gender,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Women’s Self-Organization, ” *Gender and Society* 5, no. 3 (1991).
21. [!\[\]\(411f805a6dc4823e2343701f692f6ad1_img.jpg\)](#) Hilary Land, “Who Cares for the Family?, ”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7, no. 3 (1978); Harriet Holter, ed., *Patriarchy in a Welfare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Mary Ruggie, *The State and Working Wome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Birte Siim, “Women and the Welfare

State, ” in *Gender and Caring*, ed. Clare Ungerson (London and 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0); Ann Shola Orloff, “Gendering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Welfare States, ” *Sociological Theory* 27,no.3(2009).

22. [◎](#) Adrienne Roberts, “Financing Social Reproduction, ” *New Political Economy* 18,no.1(2013).
23. [◎](#) 自由市场主义者和“新社会运动”之间不太可能结成联盟，新政权正在扰乱所有通常意义上的政治联盟，让希拉里·克林顿这样的“进步”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与唐纳德·特朗普这样的威权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者进行竞争。

尽管有女性主义的光环，或者也许正是因为有女性主义的光环，这种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在当前形势下的缩影，这种矛盾呈现出一种新的强度。金融资本主义在削减公共服务和招募妇女从事有偿劳动的同时，也降低了实际薪资，从而增加了每个家庭养活一个家庭所需的有偿劳动时间，并促使人们不顾一切地将护理工作转嫁给他人。^①为了填补护理缺口，该体制从较穷的国家向较富的国家输入移民工人。通常情况下，是来自贫困地区的种族化的农村妇女承担了以前由更有地位的妇女承担的生育和护理工作。但要做到这一点，移民必须将自己的家庭和社区责任转移到其他更穷的护理者身上，而这些护理者又必须做同样的事情——不断地，在越来越长的全球护理链中。护理的缺口完全没有得到补偿，其直接效果是劳动替代——从较富裕的家庭到较贫穷的家庭，从全球北方到全球南方。^②这种情况符合现金紧张、负债累累的后殖民地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计划下的性别战略。由于急于获得硬通货，其中一些国家积极推动妇女移民到国外从事有偿护理劳动，以获得汇款，而另一些国家则通过建立出口加工区来争取外国直接投资，这些加工区通常在纺织和电子组装等行业，而这些行业更愿意雇用女工。^③在这两种情况下，社会再生产能力受到进一步挤压。

美国最近的两项发展体现了这种情况的严重性。首先是卵子冷冻的普及，通常是一个10000美元的手术，但现在IT公司为高素质的、薪水高昂的女性雇员提供免费的额外福利。为了吸引和留住这些员工，苹果和Facebook等公司为她们提供了推迟生育的强大动力，实际上是在说：“等着在四十、五十，甚至六十岁时生孩子吧；把你的高能量、高产期奉献给我们。”^④美国的第二项发展同样体现了生殖和生产之间的矛盾：昂贵的、高科技的、用于挤母乳的机械泵激增。这是一个女性劳动力参与率高、没有强制性的带薪产假或育儿假，以及对技术情有独钟的国家的选择。在这个国家，母乳喂养也是理所当然的，但已经完全改变了。现在的“母乳喂养”不再是用自己的乳房喂养孩子，而是通过机械地挤出自己的乳汁，并将其储存起来，以后由保姆用奶瓶喂养。在时间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双杯免提泵效率更

高，因为它们允许人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上班时同时从两个乳房中挤出乳汁。^⑤

鉴于这样的压力，近年来社会再生产的斗争爆发了，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北方国家的女性主义者经常把他们关注的焦点描述为“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平衡”^⑥。但社会再生产的斗争包括更多的内容：为住房、医疗、食品安全、无条件的基本收入和生活工资的社区运动；为移民、家政工人和公共雇员的权利而斗争；为营利性养老院、医院和托儿所的服务部门工人成立工会的运动；为公共服务，如日托和老人护理，为缩短工作周，为慷慨的带薪产假和育婴假而斗争。总的来说，这些要求相当于要求对生产和再生产之间的关系进行大规模的重组：要求作出社会安排，使每个阶级、性别、性取向和肤色的人都能将社会生产活动与安全、有趣和有偿的劳动相结合。

关于社会再生产的边界斗争与关于经济生产的（狭义的）阶级斗争一样，都是目前的核心问题。它们首先回应的是植根于金融资本主义结构动力的“护理危机”。在全球化和债务的推动下，这种资本主义系统地吞噬了可用于维持社会联系的能力。它鼓励双职工家庭的新理想，恢复了解放运动，这些运动与市场化的支持者一起反对社会保护的拥护者，让他们现在变得越来越令人反感，越来越像是沙文主义者。

六 另一种资本主义，抑或新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

这场危机可能出现什么？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历史进程中曾数次不断改变自身。特别是在普遍危机的时刻，当多种矛盾——政治的、经济的、生态的和社会再生产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在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制度的分节点上爆发了边界战争：经济与政治的结合，社会与自然的结合，掠夺与剥削的结合，以及生产与再生产的结合。在这些边界上，社会行动家们被动员起来，重新绘制资本主义社会的地图。他们的努力首先推动了从现代早期的商业资本主义到19世纪的自由殖民资本主义的变革，然后到20世纪的国家资本主义，最后到当今时代的金融资本主义。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也构成了沉

淀危机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划分社会再生产和经济生产的边界已经成为斗争的主要场所。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社会的性别秩序都受到了挑战，其结果取决于三极运动的主要两极之间的联盟：市场化、社会保护、解放。这些动力首先推动了从独立领域到家庭薪资的转变，然后变成双职工家庭。

目前的情况是什么？目前金融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否严重到足以导致一场普遍危机，我们是否应该预见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次重大变革？目前的危机是否会激发出具有足够大范围和远见的斗争来变革目前的制度？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会不会成功地打破主流资本主义对市场化的热爱，同时在解放和社会保护之间建立一种新联盟，倘若如此，这种新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目的是什么？再生产与生产的区分在今天可能被重新启用，可以用什么来取代双职工家庭？

我在这里所说的一切都不是为了直接回答这些问题。但在为我们提出这些问题打下基础时，我试图说明目前的这种情况的结构和历史基础。我特别提出，今天的“护理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或者说在于这种矛盾在今天金融资本主义中所呈现的尖锐对立形式。倘若如此，那么这场危机将不会通过修复性社会政策来解决。解决危机的道路只能变革这一社会秩序的深层结构。最重要的是，需要克服金融资本主义对生产的贪婪奴役——但这次不能牺牲解放或社会保护。这意味着重塑生产/再生产的区分，重新构想性别秩序。结果它是否能与资本主义相容，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我们是否以及如何能够设想一种新社会秩序，在不吞噬自然的情况下滋养社会再生产，这也有待观察。这个问题是下一章的核心问题。

-
1. [Elizabeth Warren and Amelia Warren Tyagi, The Two-Income Trap: Why Middle-Class Parents Are Going Brok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2. [Arlie Hochschild, "Love and Gold," in Global Woman: Nannies, Maids, and Sex Workers in the New Economy, ed. Barbara Ehrenreich and Arlie Hochschild \(New York: Henry Holt & Co., 2002\), 15—30.](#)

3. [!\[\]\(ebd3ad924d2eb49f4993acbf12874d26_img.jpg\)](#) Jennifer Bair, “On Difference and Capital, ” *Signs: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36,no.1(2010).
4. [!\[\]\(b521a26b07df211a25774f523649a7f3_img.jpg\)](#) “Apple and Facebook Offer to Freeze Eggs for Female Employees, ” *Guardian*,October 15,2014.
5. [!\[\]\(87926809c3a6f3b1ce5c96638e3b0c10_img.jpg\)](#) Courtney Jung,*Lactivism:How Feminists and Fundamentalists,Hippies and Yuppies,and Physicians and Politicians Made Breast-feeding Big Business and Bad Policy*(New York:Basic Books,2015), esp.130—131. 平价医疗法案（又称“奥巴马医改”）现在强制要求医疗保险公司向其受益人免费提供这种机械泵。因此，这项福利也不再是有特权的妇女的专属特权了。其结果是为制造商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新市场，这些制造商正在其中国分包商的工厂中大批量生产这种机械泵。见Sarah Kliff, “The Breast Pump Industry Is Booming,Thanks to Obamacare, ” *Washington Post*,January 4,2013。
6. [!\[\]\(2a8d6ecff98f55bd895151a55d60232e_img.jpg\)](#) Lisa Belkin, “The Opt-Out Revolution, ” *New York Times*,October 26,2003;Judith Warner,*Perfect Madness:Motherhood in the Age of Anxiety*(New York:Penguin,2006); Lisa Miller, “The Retro Wife, ” *New York*,March 17,2013;Anne-Marie Slaughter, “Why Women Still Can’t Have It All, ” *Atlantic*,July—August 2012,and *Unfinished Business*(New York:Random House,2015); Judith Shulevitz, “How to Fix Feminism, ” *New York Times*,June 10,2016.

第四章

胃中自然：为什么生态政治学必须超环境和反资本主义？

气候政治已经转移到中心舞台。即使部分拒绝论仍然存在，各色政治行动家正在转向绿色政治。新一代的青年活动家坚持认为我们面临着全球变暖带来的威胁。这些激进分子指责长辈们偷走了他们的未来，声称有权利和责任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拯救地球。与此同时，去增长的运动正在赢得支持。他们确信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正在把我们推向深渊，因此他们寻求生活方式的转变。同样地，北方和南方的原住民社区为最近才被承认为生态的斗争赢得了更多的支持。长期以来，他们致力于保护他们的栖息地、生计和生活方式不受殖民主义的入侵和企业的开采，今天他们在那些寻求与自然的非工具性方式的人中找到了新的盟友。女性主义者也在为她们所涉及的生态问题吸引新的关注。她们认为厌女症和蔑视地球之间存在着心理和历史上的联系，她们提倡维持社会和自然的再生产的生活形式。同时，新一轮的反种族主义行动论将环境不公正列入其斗争目标。“黑人生命运动”(Movement for Black Lives)对“警察津贴”的含义持有宽泛的看法，要求将资源大规模地转移到有色人种的社区，部分用于清理破坏健康的有毒废弃物。

即使是最近与新自由主义同流合污或士气低落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在气候政治中找到了新的活力。他们将自己重新塑造成绿色新政的支持者，旨在通过将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与工会的高薪工作联系起来，挽回业已失去的工人阶级支持。右翼民粹主义也不甘示弱，也在进行绿化。他们拥护生态民族沙文主义，提议通过排斥（种族化）

“他者”来保护“自己”的绿色空间和自然资源。全球南方国家的力量也参与其中。有些人宣称有“发展权”，坚持认为减排的责任应该由两百年来一直在排放温室气体的北方大国来承担，另一些人则主张公有制或社会团结经济，还有一些人披着环境精神主义者的外衣，利用新自由主义的碳补偿计划来圈地，剥削掠夺那些生活在其中的人，并获取新形式的垄断租金。最后，我们不要忘记，企业和金融利益集团也参与了这场博弈。他们从蓬勃发展的生态商品投机中获得丰厚的利润，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投资，以确保全球气候制度仍然以市场为中心，对资本有利。

一句话，到处都是生态政治学。气候变化不再是独立的环境运动的专有财产，现在似乎是一个紧迫的问题，每个政治行为者都必须采取立场。这个问题被纳入一系列相互竞争的议程中，根据与之相伴的不同承诺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其结果是，在表面的共识之下，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现在认为全球变暖是对我们所知的地球上的生命的威胁。另一方面，他们对推动这一议程的社会力量并未达成共识，对阻止全球变暖所需的社会变革也没有共识。他们在科学上有（或多或少）的共识，但在政治上有（或多或少）的分歧。

实际上，“同意”和“不同意”这两个词太过苍白，无法反映真实情况。目前的生态政治学是在一个划时代的危机中浮现的，其标志就是这场危机。当然，这是一场生态危机，也是一场经济、社会、政治和公共健康的危机，也就是说，这是一场普遍危机，其影响无处不在，动摇了对既定世界观和统治精英的信心。其结果是霸权危机——以及在公共空间中的肆虐。政治领域不再符合统治者的常识，它拒绝了框架之外的选择，现在是一个疯狂探索的年代，他们的探索不仅是为了更好的政策，而且是为了新的政治项目和生活方式。这种不稳定的气氛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出现苗头，但由于疫情爆发而大大加强，这种不稳定的气氛渗透到生态政治学之中，而生态政治学也被迫在其中出场了。因此，气候方面的分歧充满了矛盾，不仅是因为地球的命运悬而未决，也不仅是因为时间紧迫，还因为政治气候也受到了世界动荡的困扰。

在这种情况下，保护地球需要建立一个反霸权框架。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的是将目前的意见分歧化解为一种生态政治学的共识，从而引导一个广泛共享的改革项目。当然，这样的共识必须消除大量相互冲突的观点，并确定社会中哪些方面必须改变，以阻止全球变暖，从而有效地将气候科学的权威发现与气候变化的社会历史驱动因素的同样权威描述联系起来。然而，要反霸权主义，一个新的共识必须超越“纯环境”。为了解决我们总体危机的全部范围，它必须将其生态诊断与其他重要关切联系起来，包括生计无保障和劳动权利被剥夺；公众对社会再生产的投资减少和护理工作的长期低估；民族—种族—帝国压迫以及性别和性统治；掠夺、驱逐和排斥移民；以及军事化、政治独裁主义和警察暴力。显然，这些问题与气候变化交织在一起，并因气候变化而加剧。但新的共识必须避免简约版的“生态主义”。它绝不是把全球变暖当作唯一压倒一切的王牌，它必须从这种威胁回溯到潜在的社会动力系统，这套动力系统也推动着当前危机在其他方面的表现。只有通过解决这场危机的所有主要方面，包括“环境”和“非环境”，并揭示它们之间的联系，我们才能设想出一个反霸权的架构，支持一个共同计划，并拥有实际可行的政治力量。

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但使其成为可能的领域的的是一个“快乐的巧合” (happy coincidence)：所有的道路都指向一个观念——资本主义。根据前几章定义的意义，以及在这一章中的延伸，资本主义代表了气候变化的社会历史驱动力，因此是为了阻止资本主义，并废黜资本主义核心制度的形态。但是，如此定义的资本主义也深深牵涉看似非生态形式的社会不公平，从阶级剥削到种族—帝国压迫以及性别和性统治。而资本主义也在看似非生态的社会难题中占据中心地位：护理和社会再生产的危机；金融、供应链、工资和工作的危机；治理和去民主化的危机。因此，反资本主义可以——确实应该——成为新共识的核心议题。它揭示了多种不公正和不合理的联系，代表了发展一个强大的反霸权的生态社会变革计划的关键。

无论如何，这就是我在本章中要论证的论点。我在三个不同的层面上发展它。首先，在结构层面，我认为资本主义，正确地理解，隐藏着一个根深蒂固的生态矛盾，这使它倾向于环境危机。但这一矛盾

与其他几个矛盾纠缠在一起，同样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不能从这些矛盾中抽象出来完全加以解决。接下来，我将转向历史领域，描绘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在该系统发展至今的各个阶段所采取的具体形式。与单一问题的生态主义相反，这段历史揭示了生态危机和生态斗争与其他危机和斗争的广泛关联，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从未完全分离出来。最后，在政治层面上，我认为今天的生态政治学必须超越“纯环境”，成为全面的反系统。在强调全球变暖与我们总体危机的其他紧迫方面的纠缠时，我提出绿色运动应该转向超环境，将自己定位为更广泛的反霸权集团的参与者，以反资本主义为中心，至少在原则上，可以拯救地球。

一 资本主义生态矛盾：结构论证

说资本主义是全球变暖的主要社会历史动因是什么意思？在一个层面上，这种说法是经验性的，是一种因果关系的陈述。与通常的“人为的气候变化”的模糊说法相反，它不是把责任归咎于一般“人”，而是归咎于以利润为导向的企业家阶层，他们设计了化石燃料的生产和运输系统，向大气中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当转向我论证的历史部分时，我将在后面的论证中以经验方式为这一主张辩护。但这里有比历史因果关系更多的工作。根据我的理解，资本主义因其结构本身，非偶然地推动全球变暖。我现在要解读的正是这一强有力的系统性主张，而不是其较弱的经验表达。

我首先要预先说明一个可能的误解。说资本主义非偶然地推动气候变化，并不是说生态危机只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相反，许多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环境困境而灭亡，包括一些他们自己造成的困境——比如古代帝国由于砍伐森林或轮种作物失败而毁坏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农田。同样，一些自称是后资本主义的社会通过无休止的日常燃煤和惨烈的一次性灾难（如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造成了严重的环境破坏。这些案例表明，生态破坏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

然而，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独特之处在于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结构性联系。尽管有“爱护自然”的世界观，并且主要是由

于无知——例如，未能预测到森林砍伐和过度种植的后果，前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还是发生了。这些危机本来是可以预防的，而且有时是通过社会学习，促使社会实践的转变来预防的。这些社会的内在动力并没有要求产生这些损害的做法。对于自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然而，至关重要的是，这些世界观和这些承诺都不是来自社会主义的内部动力。它们的根源在于这些社会主义发芽的地缘政治土壤——一个由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所构成的世界体系，由这种环境所培育的“追求”资源开采的心态，以及由它所青睐的化石燃料的巨型工业化模式。这样说并不是要让这些社会的统治者脱罪；他们将永远为在充满恐惧和痴迷于保密的官僚体制环境中作出的灾难性决定负责，这是他们有意培养出来的素质。问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并不要求这种环境或这种决定。如果没有普遍的外部限制和内部变形，这样的社会原则上可以发展出与非人类自然互动的可持续模式。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情况并非如此。在已知的社会体系中，资本主义社会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的核心是巩固了生态危机的根深蒂固的趋势。正如我将解释的那样，资本主义社会在其整个历史过程中已经准备好产生反复的环境危机。与其他社会不同的是，他们的生态困境不能通过增加知识或绿色的名义来解决。所需要的是深刻的结构性变革。

为了了解为什么，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的概念。如我们在前几章看到的，资本主义不是一个经济体系，而是一个更宏大的东西。它不仅仅是一种组织经济生产和交换的方式，也是一种组织生产和交换与其非经济可能性条件的关系的方式。许多人都明白，资本主义社会将一个专门的经济领域——一个所谓的“价值”的抽象概念的领域——制度化，在那里，商品由被剥削的雇佣劳动者在私人拥有的生产工具上生产，由私人公司在定价市场上出售，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创造利润和资本积累。然而，人们经常被忽视的是，这一领域在构成上依赖于——或者可以说是寄生于一系列社会活动、政治能力和自然进程，而这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定义为非经济活动。这些不具有“价值”，并在经济之外的东西，构成了经济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当然，正如我在第三章所说，如果没有形成和维持从事雇佣劳动的人

类的社会再生产的无偿劳动，商品生产是不可想象的。同样，我们将在第五章看到，如果没有支撑私有制和契约性交换的法律秩序、镇压武力和公共财产，这种生产亦不可能存在。最后，我将在这里详细解释，如果没有保证重要投资（包括原材料和能源来源）可用性的自然过程，利润和资本也都无法存在。这些“非经济”方面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前提，它们不是资本主义的外部因素，而是资本主义的整体要素。忽略这些方面，资本主义概念就是意识形态。将资本主义与它的经济等同起来，就是鹦鹉学舌，是这个系统自己的经济主义的自我理解，从而错过了对它进行批判性质疑。为了能进行批判，我们必须更广泛地理解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社会秩序，它不仅包括“经济”，还包括那些所谓的非经济的活动、关系和过程，它们让经济成为可能。

从这一经过修订的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更为关键的东西：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及其“他者”之间建立的关系——包括所谓的“自然”。在本质上，这种关系是矛盾的，而且容易爆发危机。一方面，该系统的经济基本上依赖于自然，既是生产投入的水龙头，又是处理其废物的水槽。同时，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两个“领域”之间建立了十分鲜明的区分——将经济构建为生产价值的人类创造性活动，而将自然定位为物质领域，没有价值，但可以无限地自我补充，一般可以在商品生产中加工为商品。

当资本进入这个混合体时，其本体论上的鸿沟变成了汹涌的地狱。一个被设计成“自我”增殖的货币化抽象物，资本永无止境地进行资本积累。其效果是激励那些希望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资产者尽可能便宜地掠夺“自然的馈赠”，这些馈赠是完全免费的，同时也免除了这样的义务，即补偿自然因掠夺而损失的东西，修复自然遭受的伤害。损害是利润的反面。由于他们的生态再生产成本打了折扣，让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的所有主要投资都大大获益——不“只是”原材料、能源和运输，还有劳动力，因为当资本从自然界以廉价的价格夺取食物时，工人的工资随着生活成本的下降而下降。在每一种情况下，资本家都会以利润形式将节省下来的资金攫为己有，同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那些不得不承受这些恶劣后果的人，包括人类的后代。

那么，资本不仅是一种与劳动的关系，也是一种与自然的关系——一种吃人的、榨取的关系，它消耗越来越多的生理和物理财富，以积累越来越多的“价值”，同时不承认生态的“外在性”。并非偶然的是，同样积累起来的，还有一座不断攀升的生态残骸之山。大气层被碳排放破坏；气温攀升，极地冰架消融，海平面上升，塑料岛堵塞航道；生物大规模灭绝，生物多样性下降，气候性的生物和病原体迁移，致命病毒的人畜共患传播风险增加；超级飓风，肆虐的干旱，巨型蝗虫群，到处蔓延的森林火灾，滔天的洪水；死亡区域，毒化的土壤，无法呼吸的空气。资本主义经济在系统上已经准备好搭上便车，但代价是一个无法真正自我补偿的大自然，它总是动摇了让它自己成为可能的生态的前提条件。

实际上，这里有一个生态矛盾，它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这个社会在经济和自然之间建立了关系。这种矛盾深植于系统的结构之中，被概括为四个以字母D开头的单词^①：依赖、分裂、异议和动摇。一言以蔽之：资本主义社会使“经济”依赖于“自然”，同时在本体论上将它们区分开。这种安排允许最大限度地积累价值，同时将自然界定义为未参与经济之中的，这种安排使经济不承认它产生的生态再生产成本。随着这些成本成倍增加，其结果是破坏了生态系统的稳定——并且定期地破坏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豆腐渣式的大厦(jerry-rigged edifice)。在这方面，资本主义同时需要和破坏自然，它也是一个吞噬自己重要器官的食人者。像衔尾蛇一样，它吃掉了自己的尾巴。^②

这一矛盾也可以用阶级权力来表述。根据定义，资本主义社会把组织生产的任务交给了资本，或者说，交给了那些致力于资本积累的人。这个系统允许资本家阶级提取原材料、生产能源、控制土地使用、设计食品系统、生物勘探药物和处理废物，有效地将对空气和水、土壤和矿物、植物和动物、森林和海洋、大气和气候——也就是对地球上生命的所有基本条件——的大部分控制权交给他们。因此，资本主义社会赋予了一个有强烈动机去破坏自然的阶级以管理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的权力。

当然，政府有时会进行事后干预，以减轻损失，但总是被动的，以追赶的方式，并且不会影响所有者的特权。因为他们总是比温室气体的排放者晚一步，所以环境法规很容易被企业的变通方法所颠覆。而且，由于它们保留了允许私人公司组织生产的结构性条件，它们并没有改变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个系统给了资本家们掠夺地球的动机、手段和机会。是他们，而不是一般的人，给我们带来了全球变暖——但不是因为偶然或单纯的贪婪。相反，支配他们的行动并导致这一结果的动力已被纳入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中。

无论我们从哪种说法开始，我们得出的结论都是一样的：资本主义组织的社会在其DNA中镌刻着生态矛盾。他们有能力催生“自然灾害”，这些灾难在他们的历史上定期发生，但不是偶然的。因此，这些社会有一种内在的生态危机的倾向。他们不断地产生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作为他们工作方式的一部分和组成部分。尽管并不总是很严重，甚至不明显，但这些脆弱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堆积起来，直到达到一个临界点，危机就会爆发。

二 彼此关联的各种矛盾

说资本主义的生态问题是结构性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不消除我们社会秩序的一些核心的、关键特征，我们就无法拯救地球。首先需要的是把支配我们与自然关系的权力从目前垄断权力的阶级手中夺过来，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头开始重塑这种关系。但这需要摧毁他们的权力体系：武装力量和财产形式、有害的“价值”本体论和冷酷无情的资本积累，所有这些都共同推动了全球变暖。总而言之，生态政治学必须反资本主义。

这个结论在概念上十分重要。但它还没有说清楚整个故事。为了使画面更为完整，我们需要考虑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的结构性特征，这些特征也影响到自然，以及围绕自然而进行的斗争。这里最关键的是我之前提到的一点：自然界既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唯一非经济前提条件，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唯一危机爆发点。相反，正如我们知道的，资本主义生产还依赖于社会生产和政治前提。而这些安排也是有

矛盾的——不亚于围绕自然的布局。同样重要的是，它们以我们忽视的方式与后者相互作用，从而给我们带来危险。它们也必须包含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理论中。

看一下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生产条件。在这里，资本主义组织的也不仅仅是生产。正如我在第三章中说过，它还构建了生产与社区和家庭中——但不仅仅是妇女的事情——所从事的多种形式的护理工作之间的关系。为了维持构成“劳动”的人的生命，并建立使合作成为可能的社会联系，护理工作对任何社会供应系统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资本主义组织工作的独特方式与它组织自然的方式一样，都是有矛盾的。在这里，这个系统也是通过区分来运作的——在这种情况下，它把生产从再生产中区分开来，只把前者作为价值的中心。其结果是允许经济搭上社会的便车，在没有任何补偿的情况下吞噬掉护理工作，耗尽提供护理工作所需的能量，从而危及其自身可能性的一个基本条件。因此，在这里，危机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它是社会再生产危机。

一个类似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必然依赖一系列的政治支持：依赖遏制异议和实施镇压；依赖保障私有制和允许资本积累的法律制度；依赖使私营企业能够盈利的多种公共产品。如果没有这些政治条件，资本主义经济就不可能存在。但资本主义将经济与政治联系起来的方式也会动摇自己的根基。这种安排将资本的私人力量与国家的公共力量区分开来，激励了前者掏空后者。那些以永无止境的资本积累为存在理由的企业完全有理由逃税，逃脱监管，将公共产品私有化，并将其业务离岸化——吞噬其让其成为可能性的政治前提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吞噬其尾巴的准备，它也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政治危机，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更详细地探讨这个问题。

那么，这里是资本的另外两个矛盾，它们也遵循分裂、依赖、异议和动摇的四个D打头单词的逻辑。从这个角度考虑，作为分析性的抽象概念，它们与这里剖析的生态矛盾密切相关。但这种说法误导了人们。这三个矛盾事实上并不是平行运作的，而是彼此互动的，而且

是与马克思所提出的经济矛盾互动的。事实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如此密切，如此相辅相成，以至于若其中某个矛盾一旦脱离其他矛盾，我们就无法完全理解它。

我们看一下，社会再生产劳动，和生与死的问题密切相关。对儿童的护理不仅包括社会化、教育和情感培育，还包括妊娠、分娩、产后护理和持续的身体保养。同样，对病人和临终者的护理也侧重于治疗身体和减轻痛苦，以及提供安慰和保证他们的尊严。每个人——无论年轻还是年老，无论生病还是健康——都要靠护理工作来维持他们的住所、营养和卫生，以利于身体健康和社会联系。总的来说，社会再生产工作的目的是维持同时具有自然和文化的人的存在。它融合了这种区别，是社会性和生物学、共同体和栖息地可以彼此交互的界面。

因此，社会再生产与生态逻辑再生产紧密地关联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前者的危机也是后者的危机，以及为什么这么多关于自然的斗争也是关于生活方式的斗争。当资本破坏了支持人类栖息地的生态系统时，它同时也危害了护理工作——以及他们赖以谋生的生计和社会关系。反之，当人们反击时，往往是为了一举捍卫整个生态—社会关系，似乎是为了忽略资本主义的划分的权威性。生态批判理论家应该以他们为榜样。除非我们把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与它的社会再生产矛盾放在一起考虑，否则我们无法充分理解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尽管该系统致力于将自然、护理与经济区分开来，但它同时在它们之间建立了广泛的互动关系。但这些互动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理论中占据着一个重要位置。

这同样也适用于生态和政治，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是密切相关的。公共权力，通常是国家，提供法律和军事力量的保障，使资本能够免费或廉价地掠夺自然财富。而当生态破坏变成直接的威胁，以至于其威胁无法再忽视时，人们就会求助于公共权力。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社会责成国家监督经济 and 自然之间的界限：促进或限制“发展”，监管或放松排放；决定在哪里丢弃有毒废弃物，是否以及如何减轻其影响，保护哪些人，以及将哪些人置于危险之中。

因此，关于经济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性——意义不止一种。这些斗争通常集中在国家为保护自然不受经济影响而采取或应该采取的具体政策上，它们往往变成关于公共权力的限制、其控制私人（公司）权力的权利和能力的冲突。这种斗争的关键还在于管辖权：对全球变暖等问题进行干预的适当规模和机构，根据定义是跨地域的管辖。同样有争议的还有自然的语言：赋予它的社会意义，我们在其中的位置，以及我们与它的关系。最后，正如我们将在第五章看到的，每一场生态竞赛背后都隐藏着一个重要的元政治问题。究竟谁应该决定这些问题？因此，在每个层面上，自然与经济的关系都是政治性的。除非我们掌握资本主义当前危机的生态层面与政治层面的相互作用，否则我们无法理解它。若不解决第二个问题，我们也不可能解决第一个问题。

最后，生态学也与资本主义在剥削和掠夺之间的基本区分纠缠在一起。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看到的，这种划分大致相当于全球的肤色区分线，把那些社会再生产成本由资本通过支付生活工资而被剥削的人口，与那些劳动和财富被资本纯粹掠夺而几乎没有任何补偿的人口区分开来。前者被定位为自由的、有权利的公民，能够获得（至少是某种程度的）政治保护，而后者则被定位为依附性或不自由的臣民，他们被奴役或被殖民，无法要求国家保护，并不拥有一切自卫手段。这种区别一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心，从新世界的种族化产权奴隶制时代到直接统治的殖民主义时代，再到后殖民主义的新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在每一种情况下，对一些人的掠夺都是对其他人进行有利可图的剥削的一个前提条件。我们需要反对这一配置，这一配置是资本主义自身叙事的核心，并让其长期继续存在。

掠夺也是一种方法，通过这种方法，资本可以非常廉价地获得能源和原材料，即使不是免费的。这个系统的发展部分是通过吞并自然界的大块土地，而它不需要为这些土地的再生产支付费用。然而，在掠夺自然的同时，资本也掠夺了人类社区，对他们来说，被没收的物质和被污染的环境是他们的栖息地、他们的生计手段和他们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因此，这些社区承担了全球环境负荷中极不相称的份额。他们的掠夺使其他（“白人”）社区有机会得到庇护，至少暂时

不受资本吞噬自然的最坏影响。因此，这个系统对生态危机的内在倾向与它为掠夺而创造有种族特征的人口的内在倾向紧密相关。在这种情况下，生态批判理论也不能脱离第二种情况而充分理解第一种情况。

总而言之，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不能与该系统的其他基本矛盾不合理地和不公正地区分开来。采用单一视角的环境主义的还原性的生态学观点会忽视后者，就是错过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的制度结构。这个社会不仅将经济与自然区分开来，而且还将经济与国家、护理和种族/帝国的掠夺区分开来，这个社会建立了一个相互影响的矛盾关联，批判理论必须在一个框架内部来共同追踪这些矛盾。

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到历史上，这一结论会获得更多支持。

三 讨论“自然”的三种方式

不过，首先要谈一下“自然”。这个词被普遍认为不好理解，它在前面几页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含义，我现在建议将其区分开来，然后再引入第三种含义。在谈到全球变暖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时，我假定自然界是气候科学研究的对象：当碳汇^③(carbon sinks)被淹没时，自然界会通过生物物理过程，在我们背后进行反噬，与我们是否理解这个过程无关。这种科学实在论的概念，称为“自然一”(Nature I)，与我用来解释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的另一个含义相抵触。那里的“自然”是指从资本的角度，作为“人类”的本体论的另一个方面：一个东西的集合，没有价值，但可以自我补偿，可以作为实现价值增殖的系统手段。这种概念，称为“自然二”(Nature II)，它是资本主义的建构，在历史上特定阶段上出现的，但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虚构或单纯的观念。它在资本积累的动态中运作，而资本积累也是系统地进行的，独立于我们的理解，它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对自然一有重大的实际影响。

然而，现在，当我们转向历史时，我们准备迎接另一种自然的观念。这个概念，即自然三(Nature III)，是历史唯物主义所研究的对象：具体的、随时间变化的、总是已经被其人类和非人类元素之间先

前的物质变换所标记的。这是与人类历史关联在一起的自然，由后者塑造，也塑造了后者。我们从生物多样性的草原转变为单一种植的农田；从用树木种植园取代古老的森林；从破坏雨林为采矿和养牛开路；从保护“荒野”和开垦湿地；从养殖动物和转基因种子；从气候和“发展”引起的物种迁移引发人畜共患的病毒传播中看到了这一点，这些都是地球历史上（相对短暂）资本主义阶段的例子。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杰森·W.摩尔(Jason W.Moore)提出用小写的复数“历史上的诸多自然”^④取代大写的单数“自然”时，让我们想起了“自然三”的观念。我将在下文中使用摩尔的说法，以及“社会生态学”，将社会/自然描绘成一个互动的历史关联——一个资本试图控制但现在有可能将其抹去的关联。

-
1. ④ 这四个以D开头的单词分别是依赖(dependence)、分裂(division)、异议(disavowl)和动摇(destabilization)。——译者注
 2. ④ 我对资本主义生态矛盾的阐述，得益于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对“资本主义第二矛盾”的开创性理论思考。他借鉴了卡尔·波兰尼的思想，他概括了“生产条件”和资本破坏这些条件的趋势，从而为此铺平了道路。参见“The Second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 with an Addendum on the Two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in James O'Connor, *Natural Causes: Essays in Ecological Marxism* (New York: Guilford, 1998), 158—77。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资本主义与生态学》中正确地指出了奥康纳论述的一些还原论的方面。“Capitalism and Ecology: The Nature of the Contradiction,” *Monthly Review* 54, no. 4 (2002), 6—16。但这些对于奥康纳的中心观点并不重要，并不影响我对他的见解的采纳。
 3. ④ 碳汇一般是指从空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机制。主要是指森林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多少，或者说是森林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能力。1997年12月，为缓解全球气候变暖趋势，由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日本京都通过了《京都议定书》，2005年2月16日在全球正式生效。由此形成了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简称“碳汇”）。——译者注
 4. ④ Jason W. Moore, *Capitalism in the Web of Life: Ecology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5). 不幸的是，摩尔似乎假设自然三可以简单地取代自然一，他接着将其斥为“笛卡尔式”的自然。这种假设在政治上是无效的，因为它实际上使气候科学失效。它在概念上也是混乱的。正如我在下面解释的那样，这些自然的观念事实上并不冲突，而且可以协调使用。关于我与摩尔的分歧，参见Nancy Fraser and Rahel Jaeggi, *Capitalism: A Conversation in Critical Theory*, ed. Brian Milstein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18), 94—6。

这第三个自然概念与人类历史密不可分，它将成为我下一步论证的中心，将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置于历史之中。但这一重点绝不是排除或否定自然一或自然二。与摩尔相反，这两种概念都是正当的，并与自然三兼容。^①两者都将在我的叙事中找到一个位置——作为在我们背后的客观历史力量，以及作为激励我们行动的（相互）主观信念。我们还将看到，这些信念不仅相互冲突，而且还与其他对自然的次级理解发生冲突，这些理解也拥有“反噬”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是通过社会斗争和政治行动。总而言之，我们需要所有三种自然概念协同工作，以规划资本主义生态矛盾的历史进程。

四 资本积累的社会生态体制

到此为止，我已经从结构上阐述了资本主义的生态逻辑危机倾向，然而，仿佛它存在于时间之外。实际上，这种趋势只在历史上的具体形式中找到表达，或者，正如我所说的，“资本积累的社会生态体制”。我用这个短语来指代各种阶段，这些阶段的继承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每种制度都代表了一种组织经济/自然关系的方式。每种制度都有产生能源、榨取资源和处理废物的方法。同样，各种政治也表现出独特的扩张轨迹——在历史上特定的征服、偷窃、商品化、国有化和金融化的组合，吞并以前作为外部的大部分自然界。最后，各种政治制定了外部化和自然管理的战略：将损害转嫁给缺乏政治影响力的家庭和社区的方法，并认为他们的家庭和社区是可有可无的；以及在国家、政府间组织 and 市场之间分配缓解责任的计划。那么，一个体制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它在哪里划定经济和自然之间的界限，以及它如何操作这种分界线。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同样重要的是一个体制赋予自然的具体含义——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含义。

这些事项不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而一劳永逸。相反，它们在历史上发生转变，往往是在危机时期。那时候，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长期酝酿的影响变得如此明显，如此顽固，以至于它们再也无法被细化或忽视。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经济/自然关系的既定组织就会出现功能失调、不公正、无利可图或无法持续的情况，并成为争议的对象。其

结果是激起与之对立的政治集团之间的广泛斗争，它们的竞争项目旨在捍卫或改变这种关系。当这些斗争不会以僵局结束时，这些斗争可能会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生态体制。一旦建立起来，新的体制就会提供临时性的救济，至少克服其前任的一些困境，同时孵化出自己的新困境，其影响会在以后的成熟期变得明显。不幸的是，只要新体制不能克服资本主义对生态危机的固有矛盾，而只是以创造性的方式化解或取代它，那么这一结果就会得到保证。

无论如何，这就是迄今为止的普遍情况。因此，资本主义的历史现在可以被看作是一系列的资本积累的社会生态体制，其间夹杂着特定体制的发展性危机，每一个危机都由继任体制暂时解决，而继任体制在适当的时候又产生了自己的发展危机。^②稍后，我们将考虑这一序列是否现在即将结束，这要归功于一个更深层次的动态：全球变暖的划时代的、超政治的发展——逐渐累加的危机升级趋势，似乎难以阻挡，并威胁会摧毁整个过程。不管我们怎么说，不可否认的是，在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中，经济/自然的区分已经发生了几次变化，自然的组织也是如此。我在这一章的主要目的是描绘这些变革以及推动这些变革的危机。

资本主义生态矛盾的历史生涯跨越了我们在前几章中遇到的四个资本积累体制：16至18世纪的商业资本主义阶段；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自由殖民制度；20世纪后三分之一的国家资本主义阶段；以及当前的金融资本主义体制。在每一个阶段，经济/自然的关系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由它产生的危机现象也是如此。每种制度也都引发了不同类型的掠夺自然的斗争。然而，有一点始终是不变的：在每一种情况下，生态危机和生态斗争都与其他危机和斗争深深地纠缠在一起，也都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为基础。

五 动物体力

我从商业资本主义和能源问题开始说起。在那个阶段，和以前一样，风为帆船提供动力，而风车和水车在一些地方磨制谷物。但农业和制造业主要依靠动物的体力，包括人和其他动物（牛、马等），就

像他们几千年来所做的那样。在这方面，商业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社会一样，是环境史学家麦克尼尔(J.R.McNeill)所说的“体力”体制(somatic regime)：化学能转化为机械能主要发生在生物体内，因为它们消化食物，而食物来源于生物质。^③这意味着，与早期时代一样，增加可用能源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征服。只有通过吞并土地和掠夺额外的劳动力供应，重商主义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增加他们的生产力。正如我们在前几章中所看到的，他们充分使用了这些经过时间考验的方法，但其“新”世界和“旧”世界规模大大扩展。

甚至，在边缘地区，商业资本主义代理人建立了残酷的社会生态榨取系统。从波托西(Potosí)的银矿到圣多明戈(Saint-Domingue)的奴隶种植园，他们将土地和劳动力耕作榨取到枯竭的地步，没有努力去补偿他们的消耗。^④相反，他们选择吞噬从“外部”强行纳入的新人类和非人类“投入”，在整个大陆留下了环境和社会破坏的痕迹。那些接受者以不同程度的成功进行了反击。为了反抗资本对栖息地、共同体和生计的全面掠夺，他们的抵抗必然是综合性的。无论是共同体主义、反帝国主义还是共和主义，它都将我们现在所说的“环境”斗争与劳动、社会再生产和政治权力的斗争结合起来。

同时，在大都市里，资本通过其他方式扩大规模。英格兰的圈地运动促进了农田向羊群牧场的转化，即使在没有机械化的情况下也能扩大纺织品的生产。土地使用和财产制度的转变与16世纪的一轮重大行政国家建设——以及17世纪改变世界的科学革命——交汇在一起。后者为我们提供了自然的机械观，这是自然一的早期版本，对自然二的产生起了重要作用。机械观点强化了从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继承下来的区别，将自然从意义的宇宙中驱逐出去，有效地用一个深刻的本体论鸿沟取代了对社会—自然近似性的假设。自然被对象化和外部化，现在看来是人类的对立面——这种观点对一些人来说似乎是允许人类“强取豪夺”的依据。^⑤事实证明，这类哲学思想对现代科学来说是不重要的，并最终从后来的自然一中删除。

那么，总的来说，商业资本主义将边缘区域的征服和榨取资源与中心区域的剥夺和现代科学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说，事后看来，在

这个时代，资本积累了生物力和认识力，其更大的生产潜力只有在后来随着新的资本积累的社会生态体制的出现才会显现。

六 煤炭为王

这一体制在19世纪初的英国开始形成，英国是向使用化石能源转变的历史先驱。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发明的燃煤蒸汽机为世界上第一个“外生”(exosomatic)体制开辟了道路：第一个从地壳下获取碳化的太阳能并将其转化为生物体外的机械能。由于它只是间接地与生物物质挂钩，自由殖民制度似乎将生产力从土地和劳动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同时，它也唤起了一种新的历史性。煤炭，以前只是作为一种供人燃烧取暖的物质在当地受到关注，现在却成为一种国际贸易商品。从被掠夺的土地上开采出来，经过长途运输，数亿年形成的能源矿藏在眨眼之间就被消耗掉了，以便为机械化工业提供动力，而不考虑补充或污染。同样重要的是，化石能源为资本家提供了一种重塑生产关系的手段，使之对他们有利。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纺织品制造商因工人罢工而陷入困境，其将大部分业务从依靠水力发电转变为依靠蒸汽动力，这也意味着企业从乡村迁移到城市。这样一来，他们就能集中利用无产阶级化的劳动力——与农村的工人相比，他们获得的生活资料更少，对工厂规训的容忍度更高^⑥。显然，煤炭的成本（与水不同，煤炭必须购买）被强化剥削的收益所抵消。

如果说燃煤蒸汽机推动了生产方面的工业革命，那么它也彻底改变了运输。铁路和蒸汽船压缩了空间，缩短了时间，加速了原材料和产品的远距离运输，从而加快了资本的周转，增殖了利润。^⑦对农业的影响也是深远的。随着饥饿的无产者大量涌入城市，在农村产生了无法持续的、以利润为导向的耕作就会有钱赚的现象。但当然，这种安排大大加剧了城乡之间的物质变化的裂缝。从农村土壤中掠夺的营养并没有在开采时偿还，而是作为有机废物排入城市水道。因此，以煤炭为燃料的自由—殖民政权一举耗尽了农田，污染了城市。^⑧

这种对土壤养分循环的大规模破坏是资本主义在其自由—殖民阶段的生态矛盾的缩影。同样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应对措施，因为声称要

解决欧洲土壤耗竭危机的方案只能取代或加剧它。一项不可能但有利可图的事业以鸟粪为中心，由半奴隶制的华工从秘鲁海岸的陡峭岩石上刮下鸟粪，运到欧洲作为肥料出售——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英国投资者的主要利益。一个结果是为争夺贸易控制权而发生的一系列反帝国战争和帝国之间的战争。^⑨另一个结果是，由于数世纪以来积累的矿藏在几十年内开始减少，化学肥料的发明和广泛使用，其下游影响包括土壤酸化、地下水污染、海洋死亡区和大气中氧化氮水平的上升——所有这些都对人类和其他动物非常有害。

还有一个更讽刺的问题。资本主义中心区的化石燃料生产在整个自由—殖民时代不断扩大。但是，正如鸟粪策略(guano gambit)所显示的，从土地和动物体力中解放出来的表象是一种幻觉。欧洲、北美和日本的外在工业化是建立在边缘地区基于身体的榨取资源主义的隐秘场所之中。使曼彻斯特的工厂嗡嗡作响的是大量进口的“廉价的自然资源”^⑩，这些“廉价的自然资源”是由大量不自由和依赖他人的劳动力从殖民地的土地上掠夺而来的：用廉价的棉花来喂养工厂；用廉价的糖、烟草、咖啡和茶来刺激“看不见之手”；用廉价的鸟粪喂养哺育工人的土壤。因此，表面上的劳动力和土地的节约实际上是一种环境负荷的转移——对生物物质的需求从中心地带转移到了边缘地带。^⑪殖民国家通过精心策划的努力来消灭其殖民地的制造业，从而加剧了这一过程。英国故意破坏埃及和印度的纺织品生产，使这些土地沦为其工厂的棉花供应商和其产品被掌控的市场。^⑫

生态帝国主义的理论家和历史学家们现在才开始计算这种成本转移的全部范围^⑬，同时也揭示了反殖民主义和原环境主义的密切联系。农村反对自由—殖民掠夺的斗争也是“穷人的环境主义”，是争取环境正义的先驱。^⑭这些斗争也是关于自然的意义和价值的斗争，因为欧洲帝国主义者以遥远的科学概念为基础，试图征服那些没有明确区分自然和文化的社区。

在资本主义中心区，的确出现了人们做出的这种区分，（原）环保主义看似有些不同。最著名的版本是将“自然”视为人类的他者，就像资本所幻想的那样，但却被认为是崇高的自然，不在价格系统之

内，因此需要敬畏和保护。作为“自然二”的反面，这种自然也是意识形态的自然。但它远没有为资源榨取提供许可，而是为浪漫主义和保守主义对工业社会的批判提供了依据。自然崇高最初是游牧式的，而且是倒退的，它为独立的“富人的环境主义”注入了活力^{⑩15}，而这种环境主义的重点是保护荒野。在这个时代，人们常常认为它穷尽了整个（原）环境主义，但实际上它与另一种观点共存，即把资本对自然的攻击与阶级不公正联系起来。这一观点的主要支持者是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和恩格斯，前者的生态社会主义包括一个强大的美学维度，后者的社会环境主义最初侧重于工业主义对城市工人阶级健康的有害影响，后来侧重于“自然的辩证法”，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共同进化论和生物突变论。这两位思想家都孕育了丰富的社会主义生态学传统，这些传统后来被狭隘的对环境主义的单一问题的理解所掩盖，但现在正在被恢复和扩展。^{⑩16}

七 汽车时代

当然，自由—殖民资本主义的主要遗产不是环保主义，而是改变世界的外生能源转变，它“解放”了无数年来安全封存在地壳下的碳化石燃料的储备。这一遗产给我们带来了全球变暖，在接下来的国家资本主义时代被接受和扩展，因为一个新的全球霸主导致了大量温室气体排放。美国取代了英国，围绕内燃机和精炼石油建立了一个新的外生工业综合体。结果是汽车时代的到来：消费主义自由的标志，催生了大量的高速公路建设，推动了住宅郊区化，排放了二氧化碳，并重塑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因此，燃煤的“碳民主”让位于美国提供的以石油为燃料的形态。^{⑩17}

精炼的石油也为社会民主提供了动力。汽车及相关制造业的利润为战后富裕国家的社会供给提供了相当大的税收收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全球北方国家增加社会福利的公共开支，而全球南方国家却加强了对自然的掠夺，这一点基本上没有人注意到。显然，只有允许资本在这里为一些社会再生产成本买单，才能在那里躲避更大的自然再生产成本账单。^{⑩18}这一安排的关键是石油，没有石油，整个行动就会停滞不前。为了保证供应和控制，美国在波斯湾和拉丁美洲发起了

一系列政变，确保了大石油和大水果的利润和地位。后者和大食品公司一样，利用不断发展的耗油、消耗臭氧的冷藏运输技术，将不可持续的工业化食品系统区域化，同时进一步污染了大气。^{②19}总而言之，国内以石油为燃料的社会民主是建立在海外军事扶植的寡头统治之上的。^{②20}

同时，美国也孕育了一场强大的环境运动。一股源自前政权的自然浪漫主义的潮流，滥觞于19世纪，通过建立保护区和国家公园来保护荒野，通常以迫使土著人迁移来达到目的。这种富人的环境主义是“进步的”，而不是落后的，是补偿性的；目的是使（一些）美国人能够暂时逃离工业文明，它既不对抗后者，也不寻求改变它。然而，随着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它孵化了另一种环境主义——一种针对政权的工业核心的环境主义。在生物学家和保护主义者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书的激励下，这股潮流推动了国家采取行动，遏制企业污染。其结果是成立了环境保护局，与支持社会再生产的新体制相类似。环保局成立于1970年，处于国家管理时代的尾声，是该体制通过将外部因素“内在化”作为国家监管对象来化解系统性危机的最后一次重大努力。其皇冠上的明珠是超级基金，其任务是用资本的钱来清理美国领土上的有毒废物堆放场所。该基金的资金主要来自对石油和化学工业的税收，通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制机构实现了“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这与目前的碳交易计划不同，后者用胡萝卜代替大棒，依靠市场来推进。

无论在这方面如何进步，国家资本主义对自然的监管（就像对社会再生产的监管）是建立在不承认的成本转移基础上的。它把生态外部性不成比例地转嫁给中心地区的贫困社区——特别但不仅仅是有色人种社区——同时在边缘地区加强资源开采和环境负荷转移。此外，美国环保主义的工业部门对其企业污染的核心问题存在框架错误(misframing)。它把国家—领土作为生态政策的相关单位，没有考虑到工业排放的固有的跨国界特点。^{②21}有人证明这种“疏忽”在温室气体方面特别致命，因为温室气体的影响从定义上讲是全球性的。虽

然这个过程在当时还没有被完全理解，但随着该制度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无情地排放二氧化碳，这大大加快了这颗定时炸弹的引爆速度。

八 新圈地运动，金融化自然和“绿色资本主义”

今天，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所有这些“坏事”都以类固醇的方式继续存在——虽然基础有所改变。制造业转移到全球南部，扰乱了以前的能源地理学。体力和外生形态现在在亚洲、拉丁美洲和南部非洲的一些地区并存。与此同时，全球北方越来越擅长于IT、服务和金融的“后物质”三要素，即谷歌、亚马逊和高盛。但是，从自然界中解放出来的表象又一次被误导了。北方的“后物质主义”依赖于南方的物质主义（采矿业、农业、制造业）——以及在其后院使用液压破裂技术和海上钻井。同样重要的是，全球北方的消费更加碳密集：见证了航空旅行、吃肉、水泥铺路和整体物质吞吐量的急剧上升。

同时，资本继续快速地产生新的历史本质。其中包括新的必备矿物，如锂和钶钽铁矿——后者是智能手机的基本成分，是中非的矿产，也是一种超级有利可图的商品，在某些情况下是由受奴役的刚果儿童开采的。其他新自由主义性质的商品是新圈地运动的熟悉物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水，水的私有化受到民众的激烈抵制，他们不仅要保护自己的“物质利益”，还要保护“生命之源”以及对自然/共同体关系的相关次生观点。^{②22}

虽然圈地运动是资本主义每个阶段的组成部分，但目前的体制产生了新的形式，既隐蔽又巧妙。著名的是，尖端的生物技术与先进的知识产权法相结合，设计出新型的垄断药品的租金。在某些情况下，大药厂声称拥有本土植物药的所有权，例如那些来自印度楝树的药，他们最近对楝树的基因组进行了解码，尽管有关的治疗特性在整个南亚地区已经有几个世纪的认知和使用。同样地，大农业公司试图以所谓的基因“改进”为基础，为印度香米(basmati rice)等作物品种申请专利，以剥夺开发这些品种的农业社区的权利。相比之下，在其他情况下，征用者通过生物工程创造新的历史性质，而这些性质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是孟山都公司的“无籽”种

子，它被故意设计成不育的，因此农民必须每年购买这些种子。在这里，一个跨国公司故意扼杀了种子繁殖的自然生命更新过程，以充实（强化）了资本赖以再生产自身的人为的生命灭绝过程。^{②3}资本现在有效地颠覆了它自己对自然二的概念，拒绝他人使用它自己一直依赖的“免费礼物”：自然的自给自足能力。其结果是超级利润和多重痛苦的纠缠，其中环境与社会纠缠在一起。农民债务的急剧上升导致了农民自杀的浪潮，使已经在全球环境负荷中占有越来越大份额的地区更加贫困：城市的极端污染，农村的过度采掘，全球变暖日益形成巨大影响，与之相对，这个全球环境太脆弱了。

这些不对称性因新的、金融化的监管模式而变得更加复杂，其前提是新的、新自由主义的自然二。随着公共权力的去合法化，出现了新/旧观念，即市场可以作为有效治理的主要机制，现在的任务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拯救地球。但是，碳交易计划只会将资本从世界经济去化石化和改变其能源基础所需的大规模协调投资中抽走。资金反而流向了排放许可证、生态系统服务、碳补偿和环境衍生品的投机性交易。促成这种“监管”的是一种新的绿色资本主义想象，它使整个自然界受到一种抽象的经济化逻辑的制约，即使它没有直接将其商品化。这里的烧煤工厂可以被那里的植树造林所“补偿”，这种想法假定了自然是由可替代的、可交换的单位组成的，其地点的特殊性、质量和经验意义都可以被忽略掉。^{②4}环境经济学家所钟爱的假设性拍卖方案也是如此，该方案旨在根据不同行为人为实现其对“自然资产”的竞争性“偏好”而付出的代价，为“自然资产”分配价值：原住民社区是否对保护其当地的渔业资源有足够的“投资”，以平衡威胁要耗尽这些资源的大企业队伍的行为？若非如此，对“资本”的合理使用就是允许其商业开发。^{②5}这些绿色资本主义方案代表了一种复杂的内化自然的新方式，它将认识论的抽象性提高了一个档次，达到了元水平(meta level)。但有些事情永远不会改变。如同其前身自然二一样，金融化的自然也是一种吞噬的工具。

在这些条件下，生态政治学的语法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全球变暖取代化学污染成为核心问题，排放许可市场也取代了强制性的国家权力，成为首选的监管机制，而国际也取代了国家，成为生态治理的首

选舞台。环境行动主义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荒野保护的潮流已经减弱和分裂，一个分支倾向于绿色资本主义的权力中心，另一个则倾向于日益坚定的环境正义运动。后者现在包括了广泛的次级行动者——从南方的穷人环境主义抵制圈地和土地掠夺，到北方的反种族主义者针对暴露于毒化物质的差异，到土著人的反抗运动，到生态女性主义者反抗森林砍伐——其中有许多重叠并在跨国网络中相互联系。同时，最近被搁置的国家重点项目现在正以新的活力重新出现。由于左右两派的民粹主义起义打破了对“自由市场”的神奇特性的信念，一些人又回到了国家权力可以作为生态社会改革的主要工具的观点：一方面是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的“新生态”，另一方面是绿色新政。工会也是如此，长期以来致力于维护其成员的职业健康和安全，但对限制“发展”持谨慎态度，现在期待绿色基础设施项目来创造就业机会。最后，在光谱的另一端，“去增长”(de-growth)的潮流在年轻人中找到了新的成员，他们对不断上升的物质投入和消费生活方式进行了大胆的文明批判，并通过素食主义、平民化和/或社会和团结经济来实现“美好生活”(buen vivre)的承诺。

但是，所有这些加起来是什么，它会产生什么？

九 时空之中的食人化自然

到此为止，我已经提供了结构性的论据和历史性的思考，以支持两个命题：第一，资本主义本身的基本生态矛盾，使其非偶然地倾向于环境危机；第二，这些动力与其他“非环境”的危机倾向纠缠在一起，不能孤立地解决这些危机。其政治含义在概念上非常简单，但在实践上是具有挑战性的：一个能够拯救地球的生态政治学必须是反资本主义和超环境的。

这里提供的历史思考加深了这些命题。我最初提出的是一个抽象的以四个字母D打头的单词的逻辑，其中资本被设定为破坏它所依赖的自然条件的稳定性，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具体的过程，在空间和时间上展开。它的轨迹大致是这样的：源自中心区的社会生态僵局引发了边缘区（包括中心地区的边缘）的新一轮掠夺，其目标是毫无自我保

护的人的自然财富。无论如何，这种修复也涉及对一种新的历史性的创造和占有，以前是废物，但突然变成了黄金，一种必须拥有的世界商品，被随便看成是无主之物，任人榨取。最后，在每个案例中，随之而来的是不受控制的下游效应，这引发了新的社会生态困境，促使循环的进一步迭代。长期循环往复。

这一过程在每个体制中都重复出现，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展开。通过糖和银、煤和鸟粪、精炼油和化肥、钨钽铁矿和转基因种子，它分阶段进行，从征服到殖民化，到新帝国主义，到金融化。其结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中心/边缘地缘环境，这两个共同构成的空间之间的边界定期变化，经济和自然之间的边界也是如此。产生这些变化的过程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特的空间性。

这一过程也塑造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时间性。每一次困境都来自我们三种自然的碰撞，它们在不同的时间维度上运作。在每一个事件中，资本在其对永恒给予的自然二的幻想中，能够无止境地自我补偿，按照自己的规格重新设计自然三，这决定了生态再生产的最小支出和最大的周转时间速度；同时，自然一在“自己的”时间维度上进行，在生物物理上记录效果并“反噬”。随着时间的推移，随之而来的生态破坏与其他“非环境”的伤害汇聚在一起，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非环境”的矛盾。在这一点上，有关体制进入了发展的危机，导致其努力塑造一个继任体制。继任体制一旦走向前台，就会重组自然/经济关系，以消除具体的障碍，但保留价值法则，该法则要求资本以最大的速度扩张。这样，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远没有被克服，而是在时间和空间上被反复转移。成本不仅被“只”加载到现有的边缘区域的人口身上，而且还被加载到后代身上。未来后代的生命也被打了折扣，以便资本可以无拘无束地生活下去，没有尽头。

最后表明，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的时间性可能不“只”是发展性的。在这个系统催生一连串无穷无尽的体制危机的趋势下，存在着更深层、更不祥的东西：一个划时代的危机的前景，其根源在于几个世纪以来不断升级的温室气体排放，其数量现在超过了地球的整合能力。全球变暖的跨体系预示着一个不同秩序的危机。气候变化在整个

体制和历史性质的序列中不可避免地累积起来，越来越快地触动定时炸弹的引信，这可能会使人类历史的资本主义阶段——如果不是人类历史的全部——走向一个不太光彩的结局。

然而，说到史无前例的危机，并不是说即将崩溃。它也不排除一个新的资本积累体制的出现，可以暂时管理或暂时推迟当前的危机。事实是，我们无法确定资本主义是否有更多的技巧，可以至少在一段时间内避免全球变暖；如果有，也无法确定能避免多久。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系统的拥护者是否能足够快地发明、销售和实施这些伎俩，因为他们和我们都在与自然争夺时间。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任何超过临时性的权宜之计都需要对经济/自然的关系进行深入的重新布局，即使不是完全废除，也需要严格限制资本的特权。

-
1. [◎](#) 人们应该采用全部三种自然概念。每种概念都与不同的分析层次和研究有关。“自然一”方面指生物物理科学；“自然二”指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分析；“自然三”指历史唯物主义。准确来说，它们之间并不互相矛盾。只有当人们未能区分这些层次并混淆概念时，才会出现相互矛盾的表象。因此，目前批判实在论者和社会建构主义者（或“反笛卡尔主义者”）之间的辩论在很大程度上是错位的。每一方都紧紧抓住一个概念，犹如盲人摸象一般，错误地排除了其他的概念。参见Andreas Malm, *The Progress of This Storm: Nature and Society in a Warming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8)。
 2. [◎](#) 我把“发展性”和“时代性”危机这两个术语归功于杰森·摩尔，他从华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和阿里齐 (Giovanni Arrighi) 那里为生态批判理论吸收了这些术语。参见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as Environmental History? Ecology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Theory and Society* 32, no. 3 (2003)。
 3. [◎](#) 关于“体力”和“外生” (exosomatic) 能源制度的区别，参见 J. R. McNeill, *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2000), esp. 10—16。
 4. [◎](#) Jason W. Moore, “Potosí and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Underdevelopment, 1545—1800,”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Economics* 4, no. 1 (2010), 58—103.
 5. [◎](#) Philippe Descola, *Beyond Nature and Culture*, trans. Janet Lloy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and in Carolyn Merchant’s classic, *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San Francisco: Harper One, 1990).

6. [◎](#) Andreas Malm, “The Origins of Fossil Capital: From Water to Steam in the British Cotton Industr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1(2013), 15—68.
7. [◎](#) Matthew T. Huber, “Energiz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ossil Fuels, Space and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Geoforum* 40(2008) 105—15.
8. [◎](#) “物质变换裂缝”一词来自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这也是对土壤—养分循环中断的解释。参见Foster, “Marx’s Theory of Metabolic Rift: Classical Foundations for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 no. 2(1999), 366—405。
9. [◎](#) John Bellamy Foster, Brett Clark, and Richard York, *The Ecological Rift: Capitalism’s War on the Earth*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1).
10. [◎](#) 这个说法来自杰森·摩尔, Jason W. Moore, “The Rise of Cheap Nature,” in *Anthropocene or Capitalocene? Nature, History,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ed. Jason W. Moore (Oakland: PM Press, 2016), 78—115。
11. [◎](#) Alf Hornborg, “Footprints in the Cotton Field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s Time-Space Appropriation and Environmental Load Displacement,” *Ecological Economics* 59, no. 1(2006), 74—81.
12. [◎](#) Aaron G. Jakes, *Egypt’s Occupation: Colonial Economism and the Crises of Capitalism* (Redwood City,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13. [◎](#) 例如, 参见Mike Davis, “The Origins of the Third World,” *Antipode* 32, no. 1(2000), 48—89; Alf Hornborg, “The Thermodynamics of Imperialism: Toward an Ecological Theory of Unequal Exchange,” in *The Power of the Machine: Global Inequalities of Economy,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Lanham, MD: AltaMira 2001)。
14. [◎](#) Joan Martinez-Alier,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 A Study of Ecological Conflicts and Valuation*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2003).
15. [◎](#) 我应将若安·马丁内兹-阿里耶(Joan Martinez-Alier)的“穷人的环保主义”这一表述反过来用, 我受惠于彼得·道夫涅(Peter Dauvergne)的用法, 参见Peter Dauvergn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Rich* (Cambridge MA: The M. I. T. Press, 2016)。
16. [◎](#) 关于英国19世纪和20世纪社会主义环保主义的精彩描述, 请参见Bellamy Foster, *The Return of Nature: Socialism and Ecolog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20)。最近, 这一传统有许多新发展, 参见Murray Bookchin, *Social Ecology and Communalism* (Chico, CA: AK

- Press, 2005), and Michael Löwy, *Ecosocialism: A Radical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t Catastrophe* (Chicago: Haymarket, 2015)。
17. [◎](#) Timothy Mitchell, “Carbon Democracy, ” *Economy and Society* 38, no. 3 (2009), 399—432.
 18. [◎](#) Alyssa Battistoni, “Free Gifts: Nature, Households, and the Politics of Capitalism, ” 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2019.
 19. [◎](#) Susanne Friedberg, *Fresh: A Perishable History* (2010).
 20. [◎](#) Mitchell, “Carbon Democracy. ”
 21. [◎](#) “框架错误”的概念, 可以参看Nancy Fraser, “Reframing Justi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 *New Left Review*, n. s., 36, (Nov—Dec 2005), 69—88。
 22. [◎](#) Adrian Parr, *The Wrath of Capital: Neoliberalism and Climate Change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23. [◎](#) 关于生物技术和知识产权的结合, 进行掠夺的最好描述仍然是Vandana Shiva’s “Life Inc: Biology and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ist Markets, ” *Sostenible?* 2 (2000), 79—92。
 24. [◎](#) Larry Lohmann, “Financialization, Commodification, and Carbon: The Contradictions of Neoliberal Climate Policy, ” *Socialist Register* 48 (2012), 85—107.
 25. [◎](#) Martin O’Connor, “On the Misadventures of Capitalist Nature, ” in *Is Capitalism Sustainable?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Politics of Ecology*, ed. Martin O’Connor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4), 125—51; Joan Martinez-Alier,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 A Study of Ecological Conflicts and Valuation*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2003).

十 彼此关联的各种斗争

这一结论证明了我的主要论点：旨在预防灾难的生态政治学必须是反资本主义和超环境的。如果说第一个形容词的理由已经很清楚，那么第二个形容词的理由就在于这里所展示的生态掠夺与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其他形式的功能障碍和统治之间的密切联系。首先，看一下自然掠夺和种族/帝国掠夺之间的内部联系。与“无主之地”的说法相反，资本侵占的大块自然界几乎总是一些人类群体的生活条件：他们的栖息地和充满意义的社会互动场所；他们的生计手段和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基础。此外，被资本盯上的人类群体几乎总是那些被剥夺了自我保护能力的群体，而且往往是那些被贬到全球肤色区分线另一侧的群体。这一点在一系列的体制中被反复证明了。它表明，生态问题一方面不能与政治权力问题分开，另一方面也不能与种族压迫、帝国统治、土著人被剥夺和种族灭绝的问题分开。

类似的主张也适用于社会再生产，它与自然再生产也密切相关。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大多数时候，生态系统的破坏给照顾他人、提供社会服务、照顾身体和心理的工作增加了沉重的压力，有时会把社会关系带到崩溃的边缘。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压力对妇女的影响最大，因为她们对家庭和社区的福祉负有主要责任。但也有例外情况，证明了这一规则。比如在国家资本主义时代，富裕的北方福利国家通过加强离岸资源榨取来为国内的社会支持提供资金，这时权力的不对称使一些群体能够将“外部因素”转嫁给其他人。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将国内社会民主与外国统治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动态使社会再生产与生态掠夺之间的种族化、性别化交易成为可能——资本的支持者后来通过设计一种新的金融制度，使他们能够两全其美，从而取消了这种交易。

因此，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个阶段上，关于自然的斗争都与关于劳动、护理和政治权力的斗争深深纠缠在一起。单一问题的环保主义在历史上也是例外的，而且在政治上是有问题的。回顾社会生态体制的序列，环境斗争的形式和定义不断变化。在商业时代，银矿开采毒

害了秘鲁的土地和河流，而圈地运动破坏了英国的林地，这两种情况都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噬。但这些斗争的参与者并没有把保护自然或栖息地与捍卫生计、政治自治或社区的社会再生产分开。相反，他们为所有这些因素而战，并为它们所融合的生活形式而战。在自由—殖民时代，当“自然包括”作为一个独立事业出现时，它是在那些生计、社区和政治权利没有受到生存威胁的人中出现的。由于不受这些问题的影响，他们的独立环保主义必然是富人的环保主义。^①

因此，它与同时代中心地区的社会环境主义和边缘地区的反殖民环境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者都针对自然和人类相互交织的伤害，预示着当今生态社会主义和环境正义的斗争。但是，这些运动被从环境主义的官方历史中剔除了，因为官方将单一问题的定义奉为圭臬。在接下来的国家资本主义时代，官方的定义有所扩大，因为荒野保护主义者加入了敦促直接部署资本主义国家力量来对付企业污染者的活动家。这个制度在生态方面取得的成功是由于它对权力的使用，而它的失败则是由于拒绝认真思考超环境的关联——排放物固有的跨地域性；本土的环境种族主义的力量；资本通过游说、变通和监管掌握来颠覆监管的力量；以及关注生态侵权而不是关注化石燃料消费主义经济的常规的、合法运作的内在限制。今天，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所有这些规避都是鲜活的事实，而且仍然在造成破坏。特别有问题的是，当时和现在，指导性的前提是“环境”可以得到充分的保护，而不会干扰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框架和结构动力。

十一 超环境，反资本主义的生态政治学

这些失败会在今天重演吗？我们是否会因为我们未能建立一个超环境和反资本主义的生态政治学而浪费掉这次拯救地球的机会呢？这种政治的许多基本构件已经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环境正义运动原则上已经是超环境的了，针对的是生态破坏与一个或多个统治轴线的纠缠，通常是性别、种族、民族和国家，其中一些是明确的反资本主义。同样，劳工运动、绿色新经销商和一些生态民粹主义者也掌握了对抗全球变暖的阶级先决条件，特别是需要把向可再生能源的过渡与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收入和工作政策联系起来，以及需要加强国家对

企业的力量。最后，非殖民主义和土著人的运动也影响了榨取资源和帝国主义的关系。与去增长化的潮流一起，他们要求对我们与自然和生活方式的关系进行深刻的反思。这些生态政治观点中的每一个都蕴含着一些真正的洞察力。

然而，这些运动的现状还不足以完成手头的任务——无论是单独看还是作为一个整体。只要环境正义运动仍然过度关注生态威胁对次级人口的不同影响，他们就没有充分注意到社会系统的基本结构动力，这种动力不仅产生了结果上的差异，还产生了威胁所有人福祉的普遍危机，更不用说地球了。因此，他们的反资本主义还不充分，他们的超环境主义还不够深入。

以国家为中心的运动也是如此，特别是（反动的）生态民粹主义者，但也有（进步的）绿色新经销商和工会。只要这些行为者对国家—领土的框架和通过绿色基础设施项目创造就业机会给予特权，他们就假定对“工人阶级”的看法不够广泛和多样，实际上不仅包括建筑工人，还包括护理人员和服务人员；不仅包括那些有偿劳动的人，还包括那些无偿劳动的人；不仅包括那些“在国内”工作的人，还包括那些海外工作的人；不仅包括那些被剥削的人，还包括那些被掠夺的人。以国家为中心的潮流也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个阶级的对立面的地位和权力，因为他们保留了经典的社会民主主义前提，即国家可以为两个主人服务，也就是说，它可以通过驯服资本来拯救地球，而不需要废除它。因此，他们也仍然不会那么反资本主义和跨越环境，至少在目前是这样。

最后，去增长化的活动家倾向于将资本主义中必须增长的东西——“价值”，与资本主义中应该增长但不能增长的东西——能够满足全球范围内巨大的未满足的人类需求的商品、关系和活动混为一谈，从而搅浑政治的浑水。一个真正的反资本主义的生态政治学必须废除前者增殖的硬性要求，同时将如何可持续地增长后者的问题作为一个政治问题，由民主讨论和社会规划来决定。同样，与去增长相关的取向，例如生活方式的环境主义，以及共同化的预言性实验，都倾向于回避反抗资本主义权力的必要性。

此外，这些运动的真正见解加在一起，还没有形成一种新的生态政治学。它们也没有汇聚到一个反霸权的生态社会转型项目上，至少在原则上，可以拯救地球。可以肯定的是，基本的超环境元素——劳工权利、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反帝国主义、阶级意识、支持民主、反消费主义、反资源榨取——都存在。但它们还没有被纳入对当前危机的结构性和历史性根源的诊断中。迄今为止，我们所缺少的是一个清晰而令人信服的观点，它将我们目前所有的困境，无论是生态还是其他方面，都与同一个社会系统联系在一起，并通过这个系统关联在一起。

在这里，我坚持认为，这个体系有一个名字：资本主义社会，被广义地设想为包括资本主义经济的所有必要背景条件——非人类的自然和公共权力、掠夺和社会再生产——所有这些都不约而同地受到资本的吞噬，现在都在破碎球(wrecking ball)之下，并从破碎球中挣扎逃脱出来。为这个系统命名，并对其进行广泛的构想，是为我们需要解决的反霸权难题提供另一个答案。这篇文章可以帮助我们协调其他人，揭示他们可能的紧张关系和潜在的协同作用，澄清他们来自哪里以及他们可能会走到哪里。反资本主义为超环境主义提供政治方向和批判力量。如果后者向更广阔世界开放了生态政治学，那么前者则将注意力集中在主要敌人身上。

因此，反资本主义划定了“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界限，这是每个历史集团所必需的。揭开碳交易这个骗局的面纱，它促使每一个潜在的生态政治学解放潮流公开与“绿色资本主义”脱离关系。它也促使每个潮流注意自己的致命弱点——它避免与资本对抗的倾向——无论是通过追求（虚幻的）脱钩，（片面的）阶级妥协，还是（悲惨的）极端脆弱的平等。此外，通过坚持他们共同的敌人，反资本主义拼图的一部分表明了一条路径，即消除增长、环境正义和绿色新政的党派可以一起前进，即使他们现在无法想象一个明确的目的，更不用说达成一致了。

当然，是否真的能达到任何目的，或者地球是否会继续升温到沸点，还有待观察。但我们避免后一种命运的最好希望是，再次建立一

个超环境和反资本主义的反霸权集团。这样一个集团究竟应该把我们引向何方，仍然目的不够明确。但如果我必须给这个目标起一个名字，我会选择“生态社会主义”。

为了澄清这样一个计划的前景，我在下一章中转向了当前食人资本主义危机的政治部分。

-
1. [◎](#) 这一点与黑人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一再提出的单一的女性主义相类似，后者旨在将“真正的”性别问题与“不相干”的关切分离开来，从而最终形成一种“资产阶级”或大企业的女权主义，专门针对职业—管理阶层妇女的情况，对她们来说，那些关切是无关紧要的。

第五章

屠戮民主：为什么政治危机是资本的红肉？

我们目前正面临着一场民主危机，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人们不了解的是，这场危机并非独立存在的，其根源也不完全在于政治领域。与常识相反，它不能通过恢复文明、培养两党关系、反对部落主义或捍卫以真相为导向、以事实为基础的话语来克服。与最近的民主理论相反，这场危机也不能通过改革政治领域来解决——也就是说，不能通过加强“民主精神”，重新激活“宪定权力”，释放“争胜主义”(agonism)的力量，或促进“民主的迭代”。^①所有这些建议都陷入了一个我称之为“政治主义”的错误中。通过与经济主义的类比，政治主义思维忽略了政治以外的社会的因果力量。他们认为政治秩序是自决的，他们完全没有思考过带来巨大变革更大规模的社会母体(social matrix)。

不要搞错了：目前民主危机牢牢扎根于一个社会母体之中。就像前几章所分析的困境一样，它代表了一个更广泛的危机综合体的一个部分，不能孤立地去理解。今天的民主问题既不是独立存在的，也不仅仅是某一个部门的危机，它构成了吞噬我们整个社会秩序的总体危机中具体的政治部分。其基础根植于该秩序的肌腱——后者的制度结构和基本动力。民主危机与超越政治的过程联系在一起，只有通过对社会整体的批判性视角才能把握。

这个社会整体到底是什么？许多精明的观察家将其与新自由主义相提并论，而且并非没有理由。诚如科林·克劳奇(Colin Crouch)所

言，民主政府现在被具有全球影响力、最近从公共控制中解放出来的寡头垄断公司所击败，如果不是完全被他们控制的话。^②正如沃尔夫冈·斯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所言，民主在全球北方的衰落恰逢企业资本协调一致的税收反抗和全球金融市场的建立，这是民选政府必须臣服的新主权国家。^③人们也不能质疑温迪·布朗(Wendy Brown)的说法，即民主权力正在被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合理性从内部掏空，这些政治合理性重视效率和选择，主体化模式要求“自我负责”和让自己的“人力资本”最大化。^④最后，斯蒂芬·吉尔(Stephen Gill)坚持认为民主行动正被一种“新宪政主义”所取代，这种宪政主义通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等条约在全球范围内锁定了新自由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些条约将自由贸易的规定奉为圭臬，并排除了符合公众利益的强有力的社会和环境立法。^⑤无论是单独看还是一起看，这些描述都传达了一个完全合理的观念，即威胁我们民主的是新自由主义。

然而，问题会更为深入一些。新自由主义毕竟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而今天的民主危机绝不是资本主义的第一次危机。如果资本主义继续存在，它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危机。相反，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个主要阶段都产生了政治动荡，并被政治动荡所变革。商业资本主义定期被一连串的边缘区域奴隶起义和大都市民主革命所扰乱并最终被摧毁。它的自由放任的继任者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政治动荡，包括多次社会主义革命和法西斯主义暴动、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次反殖民主义起义，然后在世界大战时和战后时代让位于国家资本主义。后者的体制的政治危机并不鲜见，在屈服于新自由主义之前，它经历了大规模的反殖民主义叛乱浪潮、全球新左派起义、旷日持久的冷战和核军备竞赛，从而迎来了当前全球化的金融资本主义体制。

这段历史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当前的民主危机。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困境，无论多么尖锐，都是一个更悠久的历史最新章节，它涉及资本主义本身的政治变迁。不仅是新自由主义，而且只要是资本主义都很容易出现政治危机，且不利于民主。

这就是本章的前提。在这里，我把目前的民主困境作为当代金融资本主义的普遍危机的一部分。但我也沿袭了前几章的做法，论证了一个更有力的论点：不仅仅是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而是每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都有一个矛盾，使其倾向于政治危机。与本书前面讨论的那些矛盾一样，这种危机，我称之为“政治”的基本矛盾，是刻在资本主义系统的DNA中的矛盾。那么，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民主危机远不是一种反常现象，而是这种矛盾在资本主义目前的金融化阶段所具有的形式。

一 “这样”的资本主义的政治矛盾

我的论点依赖于我在第一章中阐述的扩展版资本主义的理解。正如我在那里指出的，许多左翼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的理解过于狭隘，将其视为一种简单的经济体系。他们专注于经济内在矛盾，将资本主义危机等同于经济功能紊乱，如大萧条、产业链断裂和市场崩溃。其结果是排除了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全面说明，忽略了其非经济矛盾和危机形式。最重要的是，被排除在外的是基于领域之间矛盾的危机——当资本主义的经济需求与非经济领域的再生产需求相碰撞时产生的矛盾，而非经济领域的健康对长期持续的资本积累至关重要，更不用说它对人类福祉的重要价值。

第三章中探讨的一个例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再生产矛盾。马克思主义者正确地将积累的秘密置于商品生产的“隐蔽场所”，即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地方。但他们并不总是充分认识到，这一过程依赖于更隐蔽的无偿护理劳动的场所，这些工作往往由妇女来完成，形成并补充“劳动”的人类主体。资本深深地依赖这些社会再生产活动，但却没有赋予它们任何（货币化的）价值，将它们视为免费的和无限的，并且很少或没有努力去维持它们。因此，如果任由它自己发展，并且鉴于它对资本无限积累的驱动，它总是有可能破坏它所依赖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稳定。

第四章阐述的另一个例子是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一方面，资本的积累依赖于自然——既作为“水龙头”，为商品生产提供物质和能

源投入，又作为“水槽”，吸收后者的排放废物。另一方面，资本不承认它所产生的生态成本，有效地假设自然可以自主地、无穷无尽地自我补偿。在这种情况下，蛇也倾向于吃自己的尾巴，吞噬它所依赖的自然条件。在这两种情况下，一个领域间的矛盾导致了一种超越经济的资本主义危机的倾向：一种是社会再生产危机，另一种是生态危机。

我现在建议将同样的逻辑应用于民主目前的困境，从而摆脱政治主义(politicism)的陷阱。这样看来，我们目前的政治困境不再是独立存在的。相反，它们的基础是领域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是资本积累的必要性和资本积累所依赖的公共权力的维护之间的矛盾。核心问题可以这样说：合法的、有效的公共权力是持续的资本积累的可能性条件；但资本对永无止境的资本积累的驱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会破坏它所依赖的公共权力的稳定性。我将在此论述这一矛盾，它是我们目前民主危机的根源所在。但我也将论证，后者与系统的其他困境密不可分，无法单独解决。

二 公共权力

首先，让我们通过注意到资本依赖公共权力来建立和执行其基本规范追求这一假设。毕竟，如果没有一个支撑私人企业和市场交易的法律框架，资本积累是不可想象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共权力来保证产权、执行合同和裁决争端；镇压叛乱、维持秩序和管理异议；维持构成资本命脉的货币制度；努力防止或管理危机；制定和执行身份等级制度，如区分公民和“外国人”的身份等级制度，以及非官方的身份等级制度，如区分有权出售其劳动能力的可剥削的自由工人和可征用的“其他人”的身份等级制度，后者的资产和人身权利可以被剥夺。

从历史上看，有关的公共权力大多存在于领土国家，包括那些作为殖民国家运作的国家。正是这些国家的法律体系建立了看似非政治化的舞台，私人行为人在其中追求他们的“经济”利益，不受“政治”干扰。同样，也是领土国家调动了“合法武力”来镇压对征

用的抵抗，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产生和维持的。然后，也是民族国家，将主观权利赋予一些人，而剥夺另一些人的主观权利。最后，正是这样的国家将货币国有化和低价化。在这样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之后，这些政治力量采取了后续措施，以加强资本积累利润和面对挑战的能力。他们建设和维护基础设施，对“市场失灵”进行补偿，引导经济发展，支持社会再生产，缓解经济危机，并控制相关的政治后果。

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资本主义经济在地缘政治层面也有政治上的可能性条件。这里的问题是领土国家所处的更广泛空间的组织。这是一个资本似乎很容易流动的空间，因为它有固有的扩张主义的动力，以及从边缘地区向其中心地区吸纳财富的内在动力。但是，它跨越国界、通过国际贸易进行扩张、从对被征服的人民的掠夺中获利的能力，不仅取决于国家—帝国的军事力量，也取决于跨国政治安排：取决于国际法、大国之间的中介协议，以及部分安抚（以有利于资本的方式）有时被想象为自然状态的全球空间的超国家制度。在整个历史上，资本主义的经济一直依赖于一系列全球霸权的军事和组织能力，这些霸权试图在多国政治制度的框架内促进规模逐步扩大的积累。^⑥

因此，在国家领土和地缘政治这两个层面上，资本主义经济都深深地欠着外部政治力量的债。对所有主要的资本积累流动，这些“非经济”力量都是不可或缺的：对（双重）自由劳动的剥削和商品的生产与交换；对种族化臣民族群的掠夺，让其财富从边缘向中心的吸纳；对金融、空间和知识的组织；以及对利息和租金的积累。政治力量（像社会再生产和非人类自然）绝不是边缘的衍生品，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要素。公共权力对其运作至关重要，它是资本主义制度化社会秩序的一部分。

然而，维护政治权力与资本积累的必要存在着紧张关系。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独特的制度地形学，它将“经济”和“政治”区分开。在这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与早期形式不同，在早期形式中，这些情况被有效地融合在一起——例如，在封建社会中，劳动、土地和军事力量

被控制在单一的领主和臣僚制度之下。相比之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被区分开来；每一种权力都被分配到自己的领域，被赋予自己独特的媒介和运作方式(modus operandi)。⑦组织生产的权力被私有化，并被移交给资本，而资本应该只应用于那些饥饿和需求的“自然”“非政治”的制裁。管理“非经济”秩序的任务，包括那些为资本积累提供外部条件的秩序，落在了公共权力上，只有它可以利用法律和“合法”国家暴力的“政治”媒介。因此，在资本主义中，经济是非政治的，而政治也是非经济的。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社会秩序的构成，这种区分严重限制了该秩序中的政治范围。将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交给“市场”统治（实际上是交给大公司），它宣布它们不受民主决策、集体行动和公共控制的限制。这种安排剥夺了我们在什么样的能量基础上，通过什么样的社会关系集体决定要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的能力。它也剥夺了我们决定如何使用我们集体生产的社会盈余的能力；剥夺了我们与自然和后代的有关系的能力；剥夺了我们组织社会再生产的工作及其与生产的关系的能力。那么，根据其内在结构，资本主义在根本上是反民主的。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也必须是有限和脆弱的民主。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通常不处于最佳状态，无论它是否包容什么民主，也一定是不稳定和不安全的。麻烦的是，资本就其本质而言，试图两全其美。一方面，它从公共权力中免费获得一些保护，利用法律制度、镇压力量、基础设施和监管机构，这些都是资本积累所不可或缺的制度保障。同时，对利润的渴求不时地诱惑着资产阶级的某些部分对公共权力进行抵抗，说它比市场调节要恶劣，并计划削弱公共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当短期利益压倒长期生存时，资本再次威胁要摧毁其自身可能性的政治条件。

那么，这里有一个深藏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结构中的政治矛盾。像我讨论过的其他矛盾一样，这个矛盾也是以危机为基础的，它不是在经济之内，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区分经济与政治的边界

上。就资本主义而言，这种区域之间的矛盾使资本主义社会的每种形式都走向政治危机。

三 资本主义史上的政治危机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阐述资本主义本身的这种政治危机的结构。然而，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像这样”存在的，而只是以历史上特定形式或资本积累体制存在。而且，资本主义在“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基本区分并非恒定的，而是饱受争议和变化的。特别是在危机时期，社会行动者在区分经济和政治的边界上进行斗争——有时会成功地重新划定这些边界。例如，在20世纪，日益尖锐的阶级冲突迫使国家承担起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新责任。相比之下，在21世纪，“自由市场”的拥护者改变了国际规则，强烈刺激国家放弃这种努力。在这两种情况下，其结果都是修改了以前确立的经济和政治之间的边界。在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中，这种划分已经发生了几次变化，就像在每个阶段使资本积累成为可能的公共权力一样。

在第一章中，我所谓的“边界斗争”，这种变革标志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划时代的变革。如果我们采用一种视角，我们可以区分出我在前几章中确定的四种历史上的资本积累制度的政治对应物：现代早期的商业资本主义制度、19世纪的自由—殖民资本主义制度、20世纪中期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当前的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制度。在每一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条件在国家—领土和地缘政治层面上都采取了不同的制度形式。在每一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矛盾也采取了不同的表现形式，并在不同的危机现象中得到体现。最后，在每个政权中，资本主义的政治矛盾激发了不同形式的社会斗争。

首先，考虑一下资本主义最初的商业阶段，这个阶段维持了几百年的时间，大约从16世纪到18世纪。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的经济只是部分地与国家分离。土地和劳动力都不是真正的商品，道德—经济规范仍然支配着大多数日常生活交往，甚至在欧洲中心地带的城镇也是如此。专制主义统治者利用他们的权力来管理其领土内的商业，即

使他们从外部掠夺（通过军事力量实现）和远程贸易（在热那亚和荷兰的霸权下以资本主义方式）中通过扩大奴隶、贵金属和奢侈品的世界市场而获利。其结果是内部/外部的划分：国家领土内的商业监管，国家领土外的“价值规律”。

虽然这种区分维持了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无法持久。随着在国际上运行的价值逻辑开始渗透到欧洲国家的国内空间，这种秩序中的紧张关系加剧，改变了地主及其家属之间的社会关系，并在城市中心培养了新的职业和商业环境，成为自由主义甚至革命思想的温床。同样具有腐蚀性的后果是统治者的债务不断增加。由于急需收入，他们中的一些人被迫召开他们最终无法控制的议会机构。而这在一些情况下导致了革命。

由于这种经济腐蚀和政治动荡的结合，重商主义资本主义在19世纪被一种新的制度所取代，这种制度通常被称为“自由”或“放任”资本主义——尽管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些术语具有很大的误导性。在这个阶段，经济/政治的关系得到重新配置。欧洲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再直接使用公共权力来管理内部商业。相反，他们构建了“经济”范畴，其中生产和交换似乎通过“纯经济”的供需机制自主运作，不受公开的政治控制。这种构建的基础是一种新的法律秩序，它体现了合同、私有财产、定价市场和相关的“自由人”的主体权利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被视为功利最大化、公平交易者。其结果是，在国家层面上，国家的公共权力和资本的私人权力之间似乎形成了鲜明的分野。

但是，当然，国家一直在使用镇压权力，使土地掠夺神圣化，将农村人口转变为双重自由的无产阶级。这样一来，他们就为大规模剥削雇佣劳动创造了阶级的前提条件，而雇佣劳动与化石能源相结合，为工业制造的大规模起飞提供了动力——同时也带来了激烈的阶级冲突。在一些大都市中，激进的劳工运动和他们的盟友能够迫使统治阶级妥协。主体族裔的工人赢得了投票权和政治公民权，同时有效地承认了资本统治工作场所并在其中剥削他们的权利。相比之下，在边缘地区，这种妥协并不存在。欧洲殖民国家撕下了一切政治的伪装，调

集军事力量镇压反帝国的叛乱。为了确保对被征服人口的大肆掠夺能够长期继续，他们在英国霸权下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基础上巩固了殖民统治——所有这些都让人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这一说法产生怀疑，并让我改为说“自由—殖民资本主义”。

此外，几乎从一开始，这个体制就受困于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不稳定。在中心区域的民主化国家，政治平等与社会经济不平等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在一些人看来，政治权利的扩大与边缘地区正在进行的残酷压迫之间的密切关系，让他们感到不安。同样具有影响力的是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所诊断的自由殖民主义经济逻辑的无限性、超地域性和其民主政治的有限性、局限于地域的特点之间的矛盾。^⑧难怪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强调，可以证明，这种经济/政治的区分会带来长期不断的危机。在经济方面，“自由”资本主义会遭遇周期性的萧条、崩溃和恐慌；在政治方面，它产生了激烈的阶级冲突、边界斗争和革命——所有这些都被国际金融混乱、反殖民主义叛乱和帝国主义之间战争所助长和推动。^⑨到了20世纪，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的多重矛盾已经转移到了一个长期的总危机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一个新体制的确立，这个危机才最终得到解决。

在这个新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中，中心国家开始在自己的领土上更积极地使用公共权力，以防止或缓解危机。在美国霸权下，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他们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承担社会再生产的一些成本，促进（接近）充分就业和工人阶级消费主义，接受工会作为三边合作主义谈判(trilateral corporatist bargaining)的伙伴，积极引导经济发展，对“市场失灵”进行补偿，并为了自身利益普遍约束资本。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确保持续的私人资本积累的条件，同时在广义的政治范围内也驯服了资本：它们通过提高公民身份价值和给予他们在系统中的利益来吸纳潜在的革命阶层。其效果是在几十年内稳定了局势，但也付出了代价。为资本主义中心区主体民族产业工人提供“社会公民权”的安排建立在一些不太良好的背景条件上：建立在妇女对家庭工资的依附性上，建立在对种族和民族的排斥上，建立在当时被称为第三世界的持续帝国式的掠夺上。即使在非殖民化之后，后者仍以新的手段进行，严重限制了新独立国家稳定其

社会、引导发展和保护其人民免受市场媒介掠夺的能力。其结果是埋下了一些政治定时炸弹，这些炸弹的引爆最终会与其他进程汇合，促使这个政权垮台。

最后，国家资本主义也遇到了自己的矛盾，包括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矛盾。工资上涨和生产力提高的普遍化结合在一起，降低了中心地区制造业的利润率，促使资本方面作出新的努力，使市场力量摆脱政治监管。同时，一个全球性的新左派爆发了，挑战整个大厦所依赖的压迫、排斥和掠夺。随之而来的是一段漫长的危机，时而尖锐，时而缓慢沸腾，在此期间，国家资本主义解决方案被目前的金融资本主义制度悄然取代，我现在要谈的就是这个问题。

四 双重打击

金融资本主义再次重塑了经济/政治的关系。在这个制度中，中央银行和全球金融机构已经取代国家成为日益全球化的经济的仲裁者。现在是他们，而不是国家，制定了许多最重要的规则，支配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关系：劳工和资本之间，公民和国家之间，中心和边缘之间，以及对上述所有关系至关重要的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最后这些关系是金融资本主义的核心，并渗透到所有其他关系中。现在，资本主要是通过债务来吞噬劳动力，约束国家，将价值从边缘地区转移到中心地区，并从社会和自然界吸走财富。当债务流经国家、地区、社区、家庭和公司时，其结果是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以前的制度允许国家让私人公司的短期利益服从于资本积累的长期目标。相比之下，这个制度允许金融资本为私人投资者的直接利益而约束国家和公共机构。其效果是双重打击。一方面，以前（某种程度上）对公民有反应的国家机构越来越没有能力解决后者的问题，或满足他们的需求；另一方面，阻碍国家能力的中央银行和全球金融机构“政治独立”：不对公众负责，可以代表投资者和债权人自由行动。同时，紧迫问题，如全球变暖，其规模超过了公共权力能解决的范围和分量。在任何情况下，后者都会被跨国公司和全球资金流动所

超越，而这些都是被束缚在边界范围之内的政治机构所无法控制的东西。总的结果是，公共权力越来越没有能力控制私人权力。因此，金融资本主义与“去民主化”和“后民主”这样的新词汇联系在一起。

通过对国际秩序的重大调整，向以债务积累为中心的制度转变。其中最重要的是，一方面废除了布雷顿森林危机管理框架中的资本控制、固定汇率和黄金兑换制度，另一方面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定位为经济自由化的推动者——这两个举措都是由美国推动的，有助于延长其霸权。很快，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主导的对发展型国家进行攻击，首先是通过“华盛顿共识”，然后通过“结构调整”进行的。当大国将自由化强加在全球南方大部分地区的债务下时，债务国通过开放出口加工区和促进劳动力移民以获得汇款来争夺硬通货。同时，制造业向半边缘地区的转移在两个方面增强了资本的力量：首先，在南方建立了一场向底层的竞赛；其次，在资本主义中心地区消灭了强大的工会，从而削弱了对社会民主的政治支持。同时，废除资本管制和欧元的建立，剥夺了几乎所有国家对其货币的控制权，使其受制于债券市场和评级机构，并使这个关键工具失效了。^⑩中心国家被推到一个边缘国家早已熟悉的位置上：服从于他们不可能希望控制的全球经济力量。

一个反应是政策的转变，该政策由知名学者科林·克劳奇提出，即从公共凯恩斯主义到私有化的凯恩斯主义。^⑪前者利用税收和支出来刺激消费需求，而后者则鼓励消费债务，以促进在实际工资下降、不稳定因素增加和公司税收下降等其他不利条件下的持续高消费水平。这种转变被“证券化”提升到了新的高度，给我们带来了次贷危机，引发了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者的结果是最不正常的。当权者的反应非但没有促使经济/政治关系的深度重组，反而巩固了私人债权人对公共权力的控制。在策划了主权债务危机之后，中央银行和全球金融机构迫使受到债券市场攻击的国家实行“紧缩政策”，这意味着将他们的公民放在盘子里供国际贷款人吃掉。曾经被认为是“后国家民主”的化身的欧盟，急于听从银行家和投资者的吩咐，在许多人的眼中已经丧失了其民主合法性的主张。

一般来说，金融化的资本主义是一个“没有政府的治理”的时代，也就是说，没有同意的遮羞布的统治时代。在这个制度中，不是国家，而是跨国治理结构，如欧盟、世界贸易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制定了大部分可强制执行的规则，现在制约着世界各地的大量社会互动。这些机构不对任何人负责，而且绝大多数是为了资本的利益，它们正在将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和“知识产权”概念“宪政化”，将它们硬塞进全球制度中，并预先阻止劳工民主化和环境立法。最后，通过各种手段，这个制度促进了私人（公司）权力对公共权力的攫取，同时也在内部对前者进行殖民化，以私人公司的运作方式为模式。

其总体效果是掏空了各个层面的公共权力。政治议程遭到严重缩水，既有外部膨胀（“市场”“新宪政”的要求），也有内部收编（公司收购、私有化、新自由主义政治理性的传播）。曾经被认为完全属于民主政治行动范围的事项，现在被宣布为禁区，移交给“市场”——也就是金融和公司资本。那些反对者祸不单行。在当前的体制下，资本的帮凶们公然针对任何可能挑战新体制的公共权力或政治力量，无论是通过取消拒绝紧缩政策的选举和公投，如2015年的希腊，还是通过阻止那些似乎可能选择该道路的民众人物获得候选资格，如2017—2018年的巴西。与此同时，在这个时代，主要的资本主义利益集团（大水果、大医药、大能源、大军火、大数据）一直在继续他们长期以来的做法，在世界各地推动独裁主义和压迫、帝国主义和战争。我们目前的难民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们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国家行为者造成的。

那么，总的来说，目前的资本积累制度已经催生了一场民主治理的危机。但这一危机远非孤立的，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性和自我破坏性的动态系统中。一些人所说的“民主赤字”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固有的政治矛盾在其目前阶段所采取的历史特定形式——在这个阶段，失控的金融化淹没了政治领域，使其权力减少到无法解决紧迫的问题，包括那些危及资本长期积累前景的问题，如全球升温，更不用说地球上的生命。在资本主义的这个阶段，就像在其他任何阶段一样，民主危机不仅仅是单个部分的，而是一个更大的危机综合体的

一个方面，还包括其他方面——生态、社会、再生产和经济。我们目前的民主危机与其他的危机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是金融资本主义总体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不解决总体危机，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秩序，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五 一个重大的历史十字路口

然而，关于当前的民主危机，还有更多的东西要讲。到目前为止，我主要是从结构的角度来考虑它，作为金融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非偶然性展开。正如我在这里和前几章中所论述的，这种观点是必然的。但它并不足以澄清当前危机的全部范围，就像每一次普遍的危机一样，它也包括一个霸权主义的层面。

-
1. [◎](#) 我用这些用词来代表民主理论中的一系列不同观点，分别是威廉·康诺利(William E. Connolly)、安德烈亚斯·卡利瓦斯(Andreas Kalyvas)、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和塞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的观点。但我也可以列举一些其他人。
 2. [◎](#) Colin Crouch, *The Strange Non-death of Neoliberalism*(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11).
 3. [◎](#) Wolfgang Streeck, *Buying Time: The Delayed Crisis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4).
 4. [◎](#) Wendy Brown, *Undoing the Demos: Neoliberalism's Stealth Revolution*(New York: Zone Books, 2015).
 5. [◎](#) Stephen Gill, "New Constitutionalism, Democratisation, an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Pacifica Review* 10, no.1(1998), 23—38. 有关最近的说明，请参见Stephen Gill, "Market Civilization, New Constitutionalism, and World Order," in *New Constitutionalism and World Order*, ed. Stephen Gill and A. Claire Cutler(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29—44.
 6. [◎](#)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4).
 7. [◎](#) Ellen Meiksins Wood, "The Separa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the Political in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127(1981), 66—95.
 8. [◎](#)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Jovanovich, 1973). 关于资本无限积累的跨地域驱动力与政治统治的地域逻辑之间的冲突，可以参见David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 Socialist Register 40 (2014), 63—87。

9. [◎](#)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2nd ed. (Boston: Beacon, 2001).
10. [◎](#) 有一个例外是美国，美国可以印大量的美元，充当“世界货币”。
11. [◎](#) Crouch, The Strange Non-death of Neoliberalism.

毕竟，危机并不仅仅是社会机制中的一个困境。无论是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障碍，还是治理系统中的不畅通，都不值得在真正意义上称为“危机”。在这种意义上，危机不仅包括系统性的困境，还包括社会行为者对它们的反应。与贫乏的“系统理论”理解相反，在经历危机之前，没有什么东西能完全算作是危机。在外部观察者看来是危机，在社会参与者将其视为危机之前，不会成为历史性的危机，例如，直到他们直觉到，他们所经历的紧迫问题不是在既定秩序下出现的，而是因为既定秩序无法在其中得到解决。只有到那时，当一个临界点出现时，认为秩序可以而且必须通过集体行动加以改变，客观困境才会获得主观上的呼声。然后，也只有在那时，我们才能在更恢宏的意义上来谈论危机，即一个需要作出决定的重大历史十字路口。^①

这正是我们今天的情况。金融资本主义的政治功能失调不再“只”是客观的，它已经找到了一个主观因素。观察家们早先可能认为的危机本身已经变成了危机本身，因为世界各地的人民群众已经脱离了常规政治。最戏剧性的事件发生在2016年，当时全球金融的两个主要大本营的选民投票通过英国脱欧，以及特朗普选举胜利，打了新自由主义的政治设计师的脸。但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无论是在那里还是在其他地方，因为民众放弃了推动金融化的执政中间派政党，而选择了声称反对金融化的民粹主义新贵。在许多地区，右翼民粹主义者通过承诺从全球资本、“入侵”的外来移民和种族或宗教少数群体手中“夺回”自己的国家，成功地吸引了主体族裔的工人阶级选民。他们的左翼同行虽然在选举上不太成功（除了在拉丁美洲和南欧），但在公民社会中表现强劲，为“99%的人”或“劳动家庭”（定义为包容性的群体）欢呼，反对有利于“亿万富翁阶层”操纵的制度。

当然，这些政治组织之间判若云泥，它们各自的命运在随后几年里跌宕起伏。但总体来看，它们的出现标志着政治风向的重大转变。在刺破了新自由主义常识的面纱，破除了市场的浪漫之后，民粹主义浪潮使许多人敢于跳出条条框框去思考。由于最好通过私人公司之间的全球自由市场竞争来实现社会调节的“确定性”，政治创造的范围扩大了，以前无法想象的替代方案变得可以想象了。结果是资本主义

危机孕育的一个新阶段。各种制度困境的“单纯”汇聚起来，现在就是一场全面的霸权危机。[注2](#)

在这场霸权危机的中心，是对当前经济和政治之间界限的公开争议。公共规划大大低于竞争性市场的观点不再是自明的，现在已经被严厉驳斥。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新冠疫情，以及不断膨胀的阶级不平等和肆虐的种族不公正，新近活跃起来的社会民主党人与民粹主义者和民主社会主义者一起，试图恢复公共权力。一些人以国家为框架，倡导政府采取大胆行动，保护公民免受金融化的破坏性影响——经济、生态、社会和政治。另一些人——反全球化和环境正义活动家——则设想了建立新公共权力，在全球或跨国范围内，具有控制投资者和克服对地球的跨国界威胁的力量和管辖范围。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如何重组公共权力，人们存在着深度分歧。社会民主党人和民粹主义者认为，政府可以在不扰乱资本主义的基本财产关系和资本积累动力的基础上，保证就业和收入、公共卫生和一个宜居的地方。社会主义者和激进的生态学家则不同意这一点。这些问题被公开辩论，足以证明新自由主义的常识已经到崩溃的边缘。它也证明了更多的东西：现在存在着一个实质性的分界线，即使是在内部，它们是分裂的，这个分界线旨在重新划定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界限，以加强政治能力来管制经济能力。

在新冠疫情之下，这一主张得到了大力推动。尽管出现了反口罩、反疫苗的自由主义和经济导向的狂热，新冠病毒还是成为了我们需要公共权力的教科书式的证明。迫切需要采取公共行动来维护基础设施和保证供应链；通过强制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和就地封控来拉平感染曲线；通过核酸检测、病例跟踪和隔离感染者来减缓病毒传播；开发、资助、测试、批准和分发疫苗及治疗药物；保护一线工人和高危人群的安全；维持收入和生活水平；组织护理和学校教育——所有这些都要确保负担和利益的公平分配。事实证明，这些重要的需求都无法由私营部门来满足。各国在成果方面的巨大差异也证明了这一点。当涉及降低感染率和拯救生命时，那些在政治文化上重视公共权力并授权其广泛、积极行动的国家远远超过了那些贬低公共权力并

限制其使用的国家。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理性的世界里，新自由主义将是一个逐渐消失的记忆。[注3](#)

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中，根据定义，这个世界充满着非理性。因此，我们不能假设目前的危机会迅速或不费吹灰之力得到解决。相反，金融和企业资本的代表在跨国和全球层面牢牢控制着各种权力的制度杠杆，新自由主义的道路规则仍然有效，仍然阻碍着民众制定新路线的努力。此外，在国家层面，尽管有公开的反对意见，资本的代理人仍在操纵着一切，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以保持或重新获得政治权力。即使或特别是在他们的民粹主义挑战者上台后令人失望的情况下，他们也能得到坚决的支持。

最后一种情况在美国发生了，特朗普在2016年就任总统后，抛弃了他在竞选时宣称的支持工人阶级的政策，转而采取支持公司的选项。尽管特朗普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来转移注意力，但在少数几个关键的摇摆州，有许多的特朗普支持者叛变，从而使他在2020年被一个奥巴马队友击败，他承诺恢复进步的新自由主义，尽管事实上，正是这个政权为政治创造了条件，首先给我们带来了特朗普主义，并将继续滋养它到今天。然而，必须承认，左翼民粹主义政府也令人失望。并且可以肯定的是，后者依然存在着内部缺陷；但他们的脱轨牵涉很大一部分外部力量：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被欧盟“三驾马车”(Troika)碾压，意图表明任何将99%的需求置于投资者需求之前的任何要求，都不会被允许。

无论如何，特朗普、博尔索纳罗(Bolsonaros)、莫迪(Modis)、埃尔多安(Erdogans)等人都有些空洞。他们就像《绿野仙踪》中的表演者，在幕布前趾高气扬，而真正的权力却藏在幕布后面。当然，真正的力量是资本：大型企业、大型投资者、银行和金融机构，他们对利润的无止境的渴求使全球数十亿人的生命受到限制和缩短。更重要的是，这些表演者对他们支持者的问题没有任何解决办法；他们与造成这些问题的力量同流合污。他们所能做的就是用特技和奇观来转移注意力。随着困境的恶化和解决方案的失败，这些前台人物以更多离

奇的谎言和恶毒的替罪羊来提高赌注。这种态势必然会升级，直到有人拉开帷幕，揭穿这个骗局。

而这恰恰是主流进步反对派没有做到的事情。主流的“抵抗运动”不仅没有揭开幕后力量的面纱，反而长期与他们纠缠在一起。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性少数者权利和环保主义等流行社会运动的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分支就是这种情况。在自由主义的霸权下，它们多年来一直作为进步新自由主义集团的小伙伴发挥作用，该集团还包括全球资本的“前瞻性”部门（IT、金融、媒体、娱乐）。因此，进步人士也充当了前台的角色，尽管方式略有不同——为新自由主义的掠夺性政治经济披上一层解放魅力的外衣。

毫无疑问，他们运动的结果是绝对解放性的。这个邪恶的联盟破坏了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从而创造了滋养右派的土壤，这一切并不“简单”。此外，它还将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等与新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确保当大坝最终破裂，大批人拒绝后者时，其中许多人也会拒绝前者。这就是为什么主要受益者，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反动的右翼民粹主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陷入了政治困境，陷入了两个派别对立的前台演员之间的虚假作战，一个是倒退的，另一个是进步的，而幕后势力则一路笑到银行。

我们今天的情况又如何呢？如果没有新的方案，我们将面临一个不稳定的局面，没有更大氛围内的合法的霸权统治集团，也没有任何明确和可信的反霸权挑战者。在这种情况下，近期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一系列钟摆式的摆动，政府在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进步或倒退，包容多样性或排斥多样性，自由民主或亲法西斯）和自称的反新自由主义（左翼或右翼民粹主义或社会民主或共同体主义）之间来回摇摆，确切的组合将由各国的具体情况决定。

这种政治摇摆标志着目前是一个间歇期：用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话说，这是一个“旧事物正在死亡，新事物尚未诞生”的时期。这种间歇期的持续时间是任何人都能猜到的，就像它演变为全面的专制主义、重大战争或灾难性崩溃的可能性一样，而不“仅仅”是缓慢解体。无论如何，这个系统的僵局将继续磨灭我们的生活方

式，直到有一天能够组建一个可靠的反霸权集团。在此之前，我们将在大量的“病态症状”中生活（和死亡），这些症状标志着金融资本主义的死亡阵痛，以及它所造成的普遍危机。

无论发生什么，有一点是清楚的：像这样的危机不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从历史上看，这些危机代表着资本主义历史上的铰链点，是社会生活的形态争夺的关键时刻。在这种时候，最关键的问题是：谁将成功构建一个可行的反霸权力量，以及在什么基础上建构？换句话说，谁将引导社会转型的进程，为了谁的利益，以及为了什么目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普遍的危机导致社会重组的过程在现代历史上多次上演——主要是为了资本的利益。通过这个过程，资本主义一次又一次地重塑了自己。为了恢复盈利能力和驯服反对派，它的拥护者重新划分了经济/社会的分界线，重新分配了这两个“领域”，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和与社会再生产、非人类自然、种族和帝国的关系。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不仅重组了政治统治的模式，也重组了既定的剥削和掠夺形式——因此，这个过程也导致了阶级统治和不平等的地位等级，以及政治上的服从。重新塑造这些分裂层，他们往往设法将反叛的能量导入新的霸权计划之中，而这些计划对资本有极大的好处。

这个过程今天会不会重演？

解决当前民主危机的斗争，就像这场危机本身一样，不能局限于社会的某一部门，或整个危机的某一环节。它不仅涉及政治机构，还提出了社会组织的最基本和最普遍的问题。我们将把经济与政治、社会与自然、生产与再生产的界限划在哪里？我们将如何在工作和休闲、家庭生活、政治和公民社会之间分配我们的时间？我们将如何使用我们集体生产的社会剩余？究竟由谁来决定这些问题的答案？盈利者会不会设法把资本主义的矛盾变成积累私人财富的新机会？他们会不会在重组社会统治的同时，招安一些重要的反对派？或者，如本雅明所说，对资本的大规模反抗最终会成为“乘坐（这辆失控）火车的人类踩下急刹车的行为”？^④

答案部分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当前的危机。如果我们坚持熟悉的政治学家的解释，我们就会把民主的困境理解为一种孤立的政治问题。我们会把对文明、两党合作和尊重真理的需要道德化，而忽略了问题的深层结构来源。我们高瞻远瞩地超越了那些被蒙蔽的“可悲之人”的关切，我们将忽略全球那些拒绝新自由主义和要求根本变革的关键群众的主张。如果不承认他们的正当的不满（无论被如何错误地解释和误导），我们将使自己在目前建立反霸权的斗争中失去意义。我在这里提出的另一种选择，将民主目前的困境视为金融资本主义制度结构中的深层矛盾——也就是说，视为我们社会秩序总体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了其实质性的优势之外，这种解释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提供了一些实际的指导。它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激励我们揭开帷幕，找出真正的罪魁祸首，并废除资本主义这个功能失调的反民主秩序。

然而，应该用什么取代食人资本主义，目前并不那么清楚。我在下一章中研究了一些可能的情况。

-
1. [◎ Reinhart Koselleck, “Crisis,”](#) trans. Michaela W. Richter,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67, no. 2 (April 2006), 357—400.
 2. [◎ 关于目前民主危机的霸权层面的更全面分析，参见Nancy Fraser, *The Old Is Dying and the New Cannot Be Bor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9\)。](#)
 3. [◎ 有关将新冠疫情视为“资本主义非理性和不公正的狂欢”的全面讨论，请参阅本书后记。](#)
 4. [◎ Walter Benjamin, “Paralipomena to ‘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 ”](#) in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 4, 1938—40*, ed. Howard Eiland and Michael W. Jennings, trans. Edmund Jephcott et al.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2006), 402. 这句话来自“论历史的概念”的一个预备说明，但没有出现在最终版本中。引文全文如下。“马克思说，革命是世界历史的火车头。但也许事情是非常不同的。可能是革命是人类在火车行驶时踩下急刹车的行为。”

第六章

思想的食物：在21世纪社会主义应该意味着什么？

我在本书第一章开始时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归来。那么，我在结尾时，说“社会主义”归来，那是多么好哇。这个词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回归，部分是由于作为资本主义替代品，社会主义之名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如果“资本主义”回归反映了新自由主义霸权在当下的分裂状态，那么我们看到“社会主义”也重新出现，对此，不应感到震惊。

在任何情况下，“社会主义”也归来了！几十年来，这个词被认为是一种尴尬——人们鄙视它的失败，认为它是一个逝去时代的残余。现在不是了。至少在美国不是。今天，伯尔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亚历山大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等美国政治家自豪地佩戴着这个标签并赢得人民支持，而美国民主社会党等组织则大量吸引新党员。但他们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无论多么受欢迎，对这个词的热情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对其内容的认真反思。在当今时代，“社会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或应该意味着什么？

前面几章的论点提出了一个答案。那里概述的扩展版的资本主义概念意味着我们也需要一个扩展版的社会主义概念。毕竟，一旦我们放弃了资本主义只是一种经济体系的观点，我们就不能再将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替代性的经济体系。如果资本是在吞噬商品生产的“非经济”支持，那么一个理想的替代方案必须比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所有权

做得更多。除此以外——我全心全意地赞同——它还必须改变生产与它的背景可能性条件的关系：社会再生产、公共权力、非人类自然，以及位于资本的官方渠道之外但却在其范围之内的财富形式。换句话说，正如我将解释的那样，我们时代的社会主义不仅必须克服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而且还必须克服它对护理工作无偿劳动的压榨、对公共权力以及从种族化臣民和非人类自然中掠夺财富的免费利用。

一开始我们需要指出：扩展版社会主义的概念，并不是给它添加本轮^①(epicycle)。远远不是简单地把更多的特征附加到公认的理解上，而是有必要改变这个概念本身。这实际上就是我在前几章中试图为资本主义做的事情，通过将通常被认为是不重要的事项，即性别/性、种族/帝国、生态和民主，视为结构上的组成部分。现在，在本章中，我试图为社会主义做同样的事情。我的目的是把它也重新理解为一种制度化的社会秩序，一种和资本主义一样全面的社会秩序，因此，可以说，它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可靠的替代品。通过这种方式，我希望对社会主义思想的许多经典主题也有新的认识：关于统治和解放；关于阶级和危机；关于财产、市场和计划；以及关于必要劳动、自由时间和社会剩余。一旦我们把社会主义也看作是一种经济之外的东西，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都应该有不同的表现。应该出现的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轮廓，它一方面与苏联式的共产主义截然不同，另一方面也与社会民主主义截然不同，这是一种21世纪的社会主义。

然而，我必须首先重新看看资本主义，这是讨论社会主义的必要起点。毕竟，社会主义不应该是一个“纯粹应然”的事物或乌托邦的梦想。如果现在值得讨论社会主义，那是因为它囊括了真实的、历史上出现的可能性：资本主义带来了人类自由、福祉和幸福的潜力，但无法实现。同样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困境和不公正的回应：对该系统定期沉淀的、无法明确克服的困境的回应；对深深扎根于资本主义的、无法在其内部根除的统治形式的回应。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声称要祛除资本主义的弊病。因此，我们必须从这里开始。

那么，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它又有什么问题？

一 什么是资本主义？一个回顾

我们可以通过复述前面几章的论点来简单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在那里，我们把资本主义重新设想为一种制度化的社会秩序，其中包括让资本主义经济成为可能的四个非经济条件。第一，在第二章中阐述了，从被征服的人民，特别是种族化的人民那里掠夺的大量财富，首先包括土地、自然资源和依附性的无偿劳动或低龄劳动。这些财富实际上是抢来的，它作为免费或廉价的生产性投入的源泉，资本只需支付很少的费用或不需支付费用。这些投入与其他投入混合，包括（双重）免费的工资劳动，其再生产成本（据说是）得到了补偿。那么，积累的真正秘密就是剥削和掠夺的结合。如果没有对臣服民族的掠夺，对自由工人的剥削就不会有利润。然而，资本不承认它依附于掠夺而来的财富，并拒绝为其提供补偿。

第三章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二个非经济前提条件：专门用于社会再生产的大量无偿劳动和低偿劳动，这些劳动大多由妇女承担。这种“制造”人类的护理工作，对于系统所谓的生产来说，再生产是不可或缺的，而生产是为了赚取利润。我们看到，没有再生产劳动，就没有“工人”或“劳动力”，没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剩余劳动时间，没有剥削或剩余价值，没有利润或资本积累。然而，资本认为护理劳动几乎没有任何价值，不关心它的补偿，并试图尽可能地避免为之付费。

第四章讨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三个非经济先决条件，是来自非人类自然界的大量免费或非常廉价的投入。这些投入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了必需的物质基础：劳动转化的原材料；为机器提供动力的能源；为身体提供动力的食品；以及大量的一般环境前提条件，如可耕地、可呼吸的空气、可饮用的水和地球大气的碳承载能力。如果没有这些投入和前提条件，就不可能有经济生产者或社会再生产者，不可能有财富被掠夺或自由劳动力被剥削，不可能有资本或资本主义阶层。然而，资本将自然视为一个宝库，它可以无限制地帮助自己，而且不需要补偿或修复。

资本主义经济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前提条件是由国家和其他公共权力机构提供大量的公共产品。正如我们在第五章所看到的，这些包括法律秩序、镇压力量、基础设施、货币供应和管理系统性危机的机制。如果没有这些公共产品和保证它们的公共权力，就不可能有社会秩序，没有信任，没有财产，没有交换，也就没有持续的积累。然而，资本往往十分反感公共权力，并试图逃避维持公共权力所需的税收。

这四个条件中的每一个都代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支柱。每个条件都包含了社会关系、社会活动和社会财富，它们共同构成了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在资本主义的正式机构——雇佣劳动、生产、交换和金融——的背后，是它们的必要支持和有利条件：家庭、社区、自然；领土国家、政治组织和公民社会；以及大量和多种形式的无偿劳动和被掠夺的劳动。从根本上说，它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组成部分，也是它的构成要素。

指出了这些未被承认的背景条件，我们对最初的问题，即什么是资本主义，得出了一个非正统的答案。资本主义不是一种经济，而是一种社会类型——在这种社会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经济化的活动和关系的舞台，并与其他非经济化的区域区分开来，前者依赖于这些区域，但他们不承认这些区域。资本主义社会包括一个不同于（并依赖于）“政治”或政治秩序的“经济”；一个不同于（并依赖于）“社会再生产”区域的“经济生产”领域；一套不同于（并依赖于）不承认的掠夺关系的剥削关系；以及一个不同于（并依赖于）非人类自然的物质基础的人类活动的社会历史领域。

在采用这一观点时，我们把公认的、狭隘的资本主义观点换成了一个新版的、扩展的资本主义观点。这种转换，对重新想象社会主义的计划有重大影响。它改变了——实际上是扩大了——我们对资本主义的错误认识，以及必须做些什么来改变它。

二 资本主义有什么错？

对狭义的资本主义观点的批评者认为资本主义有三个主要错误：不公正、不合理和不自由。首先，他们认为这个制度的核心不公正正是资本对没有任何财产的自由工人阶层的剥削。后者无偿劳动了很多时间，生产了巨大的财富，但他们却没有任何收益。这些利益反而流向了资本家，资本家占有他们的剩余劳动和由此产生的剩余价值，并将后者重新投资于其系统目标，即积累更多的财富。更重要的后果是，资本作为一种敌对力量无情地呈指数增长，支配着从事生产的工人。这就是狭义的观点指出的资本主义最主要的不公正现象：在生产中对雇佣劳动的阶级剥削，其关键就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经济生产领域。

其次，在狭义的观点中，资本主义的主要不合理性是其内在的经济危机倾向。一个以剩余价值的无限积累为导向的经济体系，由营利性公司私下占有，本质上是不稳定的。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力来扩大资本的动力，导致了利润率的周期性下降、商品的过度生产和资本的过度积累。像金融化这样的尝试性补救措施只会推迟清算的日子，同时确保危机到来时破坏会更加严重。一般来说，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枯荣周期、股市崩盘、金融恐慌、破产链、价值的大规模清算和大规模失业。

最后，狭义的观点提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不民主的。诚然，它经常承诺在政治领域实行民主。然而，这种承诺一方面被社会不平等，另一方面被阶级权力系统地削弱了。然后，资本主义的工作场所也撕下了民主自治的伪装。这是一个资本下命令和工人只能服从的领域。

那么，一般来说，狭义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有三个主要错误——阶级剥削意义上的不公正；经济危机倾向意义上的非理性；以及民主被社会不平等和阶级权力削弱意义上的不自由。在每一种情况下，麻烦都是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动力引起的。因此，从狭义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的错误在于其经济组织。

这种狭义观念与其说是错误的，不如说是不完整的。虽然正确地识别了这个系统固有的经济弊端，但它没有记录一系列非经济的不公

正、不合理性和不自由，这些也同样构成了资本主义的错误。相比之下，当我们采用扩大的、食人的概念时，这些额外的错误就会清晰可见。

首先，食人资本主义的观点揭示了一个扩展版的不公正目录。这些不公正远非只存在于系统的经济中，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和其非经济的可能性条件之间的关系上。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经济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划分——在经济生产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现金工资作为报酬，而在社会再生产中，它是无偿的或低薪的，自然化的或感性化的，并且部分地以爱作为补偿。从历史上看，这种划分巩固了资本主义社会核心的主要统治形式：妇女的从属地位、性别二元论和异性恋。

同样，资本主义社会在（双重）自由工人和依附性的“他者”之间建立了一种结构性划分，前者可以用他们的劳动力换取他们的再生产成本，后者的人身、土地和劳动可以纯粹被掠夺。这种划分与全球肤色线相吻合。它将“只”可剥削的人与完全可掠夺的人区分开，将后者种族化，认为其本质上是可践踏侵犯的。其结果是巩固了一系列的结构性不公正，包括种族压迫、帝国主义（旧的和新的）、土著人被掠夺和种族灭绝。

最后，资本主义社会在人类和非人类自然之间进行了鲜明的区分，它们不再属于同一个本体论的宇宙。非人类自然被简化为一个水龙头和一个水槽，被开放给野蛮的资源榨取和工具化。如果这不是对自然（或非人类动物）的不公正，至少也是对现有和未来的人类的不公正，因为他们被留在一个越来越不适合居住的地球上。

那么，一般来说，对扩展版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更加凸显出结构上的不公正，其中包括且远远超过了阶级剥削。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也必须纠正这些其他的不公正现象。它绝不是“仅仅”改变经济生产的组织，还必须改变后者与社会再生产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性别和性秩序。同样，它必须结束资本对自然的自由驰骋和对被征服民族的财富的掠夺，以及随之而来的种族/帝国压迫。总之，如果社会主

义要纠正资本主义的不公正，不仅需要改变资本主义的经济，也需要改变资本主义的整个制度化秩序。

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扩展版的资本主义概念也扩展了我们对什么是资本主义危机的看法。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些内在的自我不稳定倾向，超越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危机。首先，有一种系统性的倾向，即吞噬社会再生产，从而引发护理危机。只要资本试图避免支付它所依赖的无偿护理劳动，它就会定期给这种工作的主要提供者带来巨大压力：家庭、社区，尤其是妇女。当前，金融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正在产生这样的危机，因为它既要求缩减社会服务的公共供应，又要求增加每个家庭（包括妇女）的有偿劳动时间。

扩展版资本主义的观点也使生态危机的内在倾向变得明显。由于资本避免为其从非人类自然界获取的投入支付任何接近真实的替代成本，它耗尽了土壤，污染了海洋，淹没了碳汇，并压垮了地球的碳承载能力。它在帮助自己获得自然财富的同时，却不承担后者的修复和替换成本，它周期性地破坏了自然界中人类和非人类组成部分之间的物质变换。我们今天正面临着这种后果。威胁要毁灭地球的毕竟不是“人类”，而是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对生态和社会再生产危机的倾向与它对从种族化人口那里掠夺财富的基本需求是分不开的：它依赖于盗窃的土地、胁迫的劳工和掠夺的矿物；它依赖于在种族化地区倾泻有毒废物，依赖于种族化人民作为低薪护理劳动的提供者，这些工作成为全球护理链中一部分。其结果是经济、生态和社会危机与帝国主义和种族—民族对立纠缠在一起。新自由主义在这里也加速了这个过程。

最后，扩展版的资本主义观点披露了政治危机的基本倾向。在这里，资本的目的也是为了两全其美，依靠公共产品生活，而它却试图不付任何费用。逃税和削弱国家法规是资本主义的首要任务，它倾向于掏空它所依赖的公共权力。目前，金融资本主义形式将这种游戏推向了一个全新的水平。大公司的力量超越了领土的公共权力，而全球金融则对国家进行约束，嘲弄那些与之相悖的选举，并阻止反资本主义政府解决民众的要求。其结果是一场重大的治理危机，现在与霸权

主义的危机相伴而生，因为全球各地的人们都在叛离既定的政党和新自由主义的共识。

那么，总而言之，扩展版的资本主义观点向我们表明，资本主义在经济之上和之外还隐藏着多种危机倾向。正如第五章所解释的，我跟随卡尔·波兰尼（和詹姆斯·奥康纳）将前者理解为“诸领域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存在于将资本主义经济与其非经济背景的可能性条件分开和联结起来的关节处。与我在前几章中解释的四个D字母打头的单词的逻辑相关联，资本有一种腐化、破坏或耗竭的内在倾向，但无论如何，都会破坏其自身的前设。就像衔尾蛇一样，它吃自己的尾巴。相互屠戮也是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也是社会主义必须克服的问题。

最后，还有资本主义的内在民主赤字。当我们对这个社会制度采取扩展版的观点时，这第三个错误严重得多。问题不仅在于老板们在工厂车间的指挥。也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和阶级权力嘲弄了政治领域中平等的民主声音的所有借口。同样重要的是，这个领域从一开始就被严重撕裂了。事实上，经济/政治的划分从根本上缩小了民主决策的范围。当生产被移交给私人公司时，控制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和地球命运的人不再是我们自己，而是资本家，正如我们在第四章看到的那样。同样，决定我们工作和非工作生活形态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资本家，他们决定我们如何分配我们的精力和时间，如何解释和满足我们的需求。最后，通过允许私人占有社会的剩余，这个系统的经济/政治关系授权资本家塑造社会发展的进程，从而决定我们的未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这些问题都被预先从政治议程中剔除。一心想要实现最大资本积累的投资者在我们背后决定它们。那么，资本主义绝不是仅仅吞噬自己，它还吞噬了我们——剥夺了我们共同决定如何生活的集体自由。为了克服这种形式的食人化，社会主义必须扩大民主政治自我统治的范围，大大突破目前捉襟见肘的有限范围。

三 什么是社会主义？

如果社会主义旨在纠正资本主义的所有错误，它将面临着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它必须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不仅要克服阶级统治，还要克服性别不平等、种族/民族/帝国压迫以及全面的政治统治。同样地，它必须废除造成多种危机的制度：不“仅仅”是经济和金融制度，也包括生态、社会再生产和政治的制度。最后，21世纪的社会主义必须极大地扩大民主的范围——不仅仅是通过在事先定义的“政治”区域内实现决策的民主化。更根本的是，它必须实现构成“政治”的定义和分界线、框架本身民主化。

这样定义的话，为21世纪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任务非常艰巨。如果这项工作能够完成（这是一个很大的“如果”），那需要通过许多人的共同努力，包括活动家和理论家，因为通过社会斗争获得的洞见与纲领性思维和政治组织协同作用。为了对这一过程作出贡献，我想提供三组简洁的思考，旨在说明前面的讨论是如何思考社会主义思想的经典问题，并给出新的见解。

第一个是关于制度分界线。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边界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制度性的区分：它将生产与再生产、剥削与掠夺、经济与政治、人类社会与非人类的自然区分开来。正如前面几章所解释的那样，这些划分已经准备好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和斗争的场所。因此，对社会主义者来说，社会领域是否以及如何被区分出来并相互连接的问题，至少与它们如何在内部组织的问题同样重要。社会主义者不应片面地关注经济（或自然、家庭、国家）的内部，而是需要思考经济与让其成为可能的前提的关系：与社会再生产、非人类自然、非资本化的财富形式和公共权力的关系。如果社会主义要克服资本主义不合理、不公正和不自由的所有制度形式，它必须重新想象生产和再生产、社会和自然、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社会主义者应该旨在一口气消灭这区分。相反，苏联废除“政治”和“经济”之间区别，这种灾难性的做法可以作为对人们想消除区分的普遍警告。但我们可以而且必须重新确定我们从资本主义社会继承的制度界限。我们的目标至少应该是重新划分这些界限，使资本主义归入经济领域的关键事项成为政治或社会问

题。我们还应该考虑改变它们的性质，使分界线变得更加柔软和多样。我们当然应该想办法使它们区分开来的各个领域相互兼容、相互呼应，不对立、不对抗。当然，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克服资本主义实行零和博弈的倾向，这种倾向分别从自然界、公共权力和社会再生产中拿走了给予生产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扭转目前这些领域中的优先次序。资本主义社会将社会、政治和生态再生产的需要置于商品生产的需要之下，而商品生产本身就是为了资本积累，社会主义者需要将事情颠倒过来，将培养人、保护自然和民主自治作为社会的最高优先事项，这比效率和增长重要得多。实际上，社会主义必须把那些被资本贬低到不被认可的背景中的事项放在前台。

最后，21世纪的社会主义必须使制度设计过程民主化。这意味着使社会领域的设计和范围变成一个政治问题。简而言之，资本主义在我们背后为我们决定的事情，现在应该由我们通过集体民主决策来决定。因此，我们自己应该参与法律理论家所谓的“重新划界” (redomaining)：重新划定划分社会领域的边界，并决定将什么纳入其中。^②这个过程可以被看作是“元政治的” (metapolitical)——动员（第二层次）政治进程的重新划界，以民主地构成（第一层次）政治空间。^③在这里，实际上，我们自己在政治上决定哪些事情将在哪些政治舞台上被政治解决。

然而，如果它要成为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的重新划界必须是公正的。这其中的一些含义已经十分清楚。首先，决策必须具有适当的包容性；对于正在审议的每一个议题，所有受影响或受制约的人都必须有权参与。^④此外，参与必须是平等的；民主要求平等参与，因此，与结构性统治不兼容。^⑤

但还有另一个人不太熟悉的想法，也应该引导这个过程。这就是“现收现付” (pay as you go)。摒弃一切形式的搭便车和所谓的原始积累，21世纪的社会主义必须保护所有那些被资本主义如此残酷破坏的生产条件的可持续性。换句话说：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承诺补充、

修复或替换它在生产和再生产中耗费的所有财富。首先，它必须补偿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包括维持人们生活的护理工作），以及生产商品的劳动。此外，它必须从“外部”补偿它——从边缘区域民族和社会以及非人类自然——掠夺的所有财富。最后，它必须补偿它在满足其他需求过程中所使用的政治能力和公共产品。换句话说：决不能存在资本主义既鼓励又反对的那种占尽便宜的方式。这个前提条件是克服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代际不公正的必要条件。只有符合这个条件，21世纪的社会主义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的多种危机和不合理性。

这使我想到了第二组思考，即关于经典社会主义的剩余价值问题。剩余价值是指社会集体创造的财富，如果有的话，超过了它在当前水平和当前形势下进行再生产所需的财富。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剩余价值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并由其所有者处置，该制度迫使他们对其进行再投资，希望能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不断地，没有限制地生产剩余价值。正如我们之前所说，这既不公平，也动摇了其根基。

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使对社会剩余价值的控制民主化。它必须民主地分配剩余价值，通过集体决策来决定如何处理现有的剩余能力和资源，以及它想在未来生产多少过剩的能力，实际上，面对全球变暖，它是否想生产任何剩余价值。因此，社会主义必须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硬性规定的增长要求非制度化。这并不意味着，像一些生态学家现在所争论的那样，我们必须把消除增长作为一种硬性的反措施而制度化。相反，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把增长的问题（如果有的话，增长多少；什么样的，怎样的，以及在哪里）作为一个政治问题，通过气候科学的多维反思来决定。事实上，21世纪的社会主义必须将所有这些问题视为政治问题，以民主方式解决。

剩余也可以被理解为时间上剩余：在满足我们的需求和补偿我们所使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后剩下的时间；因此可以成为自由时间。自由时间的前景一直是所有关于社会主义自由的经典论述（包括马克思的论述）的核心支点。然而，在社会主义的早期阶段，自由时间在很大程度上无法成为可能。原因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将从资本主义

处继承数量巨大的未被支付的账单。尽管资本主义以其生产力为荣，尽管马克思本人认为它是名副其实的生产剩余价值的引擎。但我的问题是，马克思几乎完全以无偿的劳动时间来计算剩余价值，这些劳动时间是资本在雇佣工人生产出足够的价值来支付他们自己的生活费用之后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相比之下，马克思几乎没有关注过资本掠夺和占有的各种免费获取物和廉价物，他对资本未支付其再生产成本关注得更少。如果我们在计算中包括这些成本呢？如果资本不得不为免费的再生产工作、为生态逻辑的修复和补偿、为从种族化的人口那里掠夺来的财富、为公共产品支付费用呢？它到底会产生多少剩余价值呢？当然，这是个反问句。目前还不清楚人们究竟会如何尝试回答这个问题。但很明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可以为几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从未支付的费用，列举一张巨额的账单。

社会主义还将继承全球各地大量未得到基本人类需求的巨额账单：医疗保健、住房、营养（和美味）食品、教育、交通等方面的需求。这些也不应该被算作剩余投资，而是绝对必要的事项。世界经济去碳化这一紧迫而巨大的工作也是如此，这绝不是一项可有可无的任务。总的来说，鉴于我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概念的扩展，对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剩余的问题就有了不同的回答。

对社会主义的社会理论思考的第三个主题也是如此：市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食人资本主义”概念的含义可以凝练为一个简单的公式：在顶层没有市场，在底层没有市场，但可能在两者之间有一些市场。让我解释一下。

我所谓的“顶层”是指社会剩余的分配。假设有社会剩余可供分配，它必须被认为是整个社会的集体财富。任何私人、公司或国家都不能挪用它，也无权单方面处置它。真正的集体财产，必须通过集体的决策和规划过程来分配，这种规划可以而且必须以民主方式组织分配。市场机制在这一层面不应发挥任何作用。这里的规则既不是市场，也不是顶层的私有制。

对于“底层”也是如此，我指的是基本需求的水平：住房、衣服、食物、教育、医疗保健、交通、通信、能源、休闲、清洁的水和

可呼吸的空气。当然，我们确实无法一次性地明确规定什么是基本需求，以及满足这些需求所需的具体条件。这也必须是一个民主讨论、争论和决策的主题。但无论决定是什么，都必须作为一项基本权利来提供，而不是基于支付能力。这意味着，我们为满足这些需求而生产的使用价值不能是商品。相反，它们必须是公共产品。顺带一提，这也指出了全民（或无条件）基本收入(UBI)提案的一个主要缺点，即向人们支付现金来购买东西以满足其基本需求，从而将基本需求的满足视为商品。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把它们当作公共产品。不应该有底层的市场。

因此，在底层或顶层没有市场。但是，在这两者之间呢？社会主义者应该把中间地带想象成一个融合各种可能性的实验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市场可以找到一席之地，同时还有合作社、公社、自我组织的协会和自我管理的项目。在我所设想的环境中，许多传统的社会主义对市场的反对意见将会消失或减少，因为它们的运作既不会被资本积累和社会剩余的私人占有的动力所影响，也不会被扭曲。一旦顶层和底层被社会化和非商品化，市场在中间的功能和作用就会被改变。这个问题似乎很清楚，即使我们现在不能具体说明它究竟是什么样子。

-
1. [◎](#) 本轮指的是。阿波罗尼乌斯最早发明了“本轮—均轮”模型，而这个模型最早是由希帕克斯继承使用。托勒密的宇宙模型里行星循着周转圆的小圆运行。而本轮的圆心循着称为均轮的大圆绕地球运行。这种模型可以定性地解释行星为什么会逆行。在托勒密“地心说”中，行星的运动是这样子的：行星绕着空间中的一个点做圆周运动（这个圆就是本轮），而这个点再绕着地球做圆周运动；所以从地球上看来，行星在向前行进之时偶尔会调头而行，然后再回头继续向前。在本书中，南希·弗雷泽应用托勒密的本轮—均轮模型指的就是她的这个扩展版的社会主义概念，并不是简单绕行原来的社会主义概念均轮旋转的本轮，而是在全新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概念。——译者注
 2. [◎](#) Mariana Prandini Assis, “Boundaries, Scales and Binaries of Women’s Human Rights: An Examination of Feminist Confrontations in the Transnational Legal Sphere,” PhD dissertation, 2019,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3. [◎](#) Nancy Fraser, *Reframing Justice: The 2004 Spinoza Lectures* (Amsterdam: Van Gorcum, 2005) and “Reframing Justi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New Left Review* 36 (November–December 2005), pp. 69–88.

4. [◎](#) 对于这个问题的全面讨论，可以参看Fraser, “Reframing Justice, ” and Nancy Fraser, “Publicity, Subjection, Critique: A Reply to My Critics, ” in Transnationalizing the Public Sphere, ed. Kate Nash (Malden, MA: Polity Press, 2014)。
5. [◎](#) 关于参与的平等以及民主与统治的不兼容，可以参看Nancy Fraser and Axel Honneth, Redistribution or Recognition? A Political-Philosophical Exchange, trans. Joel Golb, James Ingram, and Christiane Wilke (London: Verso, 2003)。

许多这样的不确定性要求，可以让人们反思和说明21世纪的扩展版的社会主义概念。我在这里描绘的观点显然是片面的和预备的。它只涉及最紧迫和最相关的问题的一个子集，而且是以一种公开研究的方式进行的。然而，我希望能够证明，对于社会主义在今天应该意味着什么的问题，这种方式有着明显优点。其中一个优点是有可能克服概念中的经济主义。另一个优点是有机证明社会主义与当前广泛关注的问题相关，而不是传统劳工运动关注的问题：社会再生产、结构性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去民主化和全球变暖。然而，第三个优势是能够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些经典主题进行新的阐释，包括制度划分、社会剩余价值和市场的作用。

此外，我希望能说明一些更简单但更重要的东西：在21世纪，我们值得追求社会主义计划；“社会主义”绝不是一个纯粹的流行语或历史遗迹，社会主义必须成为真正替代目前正在摧毁地球、妨碍我们自由、民主和美好生活机会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名称。

后记

巨噬细胞：为什么新冠是一场食人资本主义的狂欢？

名词解释

巨噬细胞(Macrophage)：名词，字面意思是“大吃”，来自希腊语的 μακρός (makrós , “大”) 和 φαγεῖν (phagein , “吃”) 。

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写的。在疫情前的些年里，当我在扩展资本主义概念时，我主要是说明使经济中的资本积累得以实现的各种“隐秘场所”。你们面前的成果包括一组章节，每个章节都以一个必要的但未被承认的前提条件为中心：种族化的掠夺和社会再生产、地球生态和政治权力。在每一种情况下，我都试图揭示一种社会秩序的矛盾和容易发生危机的特征，这种社会秩序在结构上已经准备吞噬其自身存在的基础：吞噬护理工作和在自然中圈地，破坏公共权力和吞噬种族化人口的财富。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也指出，没有任何一种食人狂潮是孤立地发展的，独立于其他的食人狂潮之外。恰恰相反，全部这些都在我们今天所处的所有消费危机中交织在一起。

新冠爆发为这些纠缠关系提供了一个教科书式的示范。当我在2022年4月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这场疫情是所有食人资本主义矛盾的交汇点：在这里，食人的自然和护理工作，政治能力和边缘化的人口，在一场致命的狂欢中合并在一起。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

功能紊乱的狂欢，毫无疑问，新冠疫情确立了一劳永逸地废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必然性。

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要看一下大自然。导致新冠病毒在2019年通过一些尚未确定的中介物种（可能是穿山甲）向我们进行了人畜共患的跳跃式传播。但是，是什么让蝙蝠与该中介接触，以及后者与我们接触，已经很清楚：一方面是全球变暖的综合影响，另一方面是热带森林的砍伐。同样清楚的是，这两个过程都是资本主义的后果，源自对利润贪得无厌的欲望驱动。它们一起吞噬了无数物种的栖息地，引发了大规模的迁移，在以前相距甚远但现在陷入困境的生物之间创造了新的接近性，并促进了病原体在它们之间新的传播。这种动态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的病毒流行，每一次都是通过一个“放大的宿主”从蝙蝠传给人类。艾滋病通过黑猩猩，尼帕病毒(Nipah)通过猪，非典通过果子狸，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通过骆驼，现在新冠可能通过穿山甲传播。以后会出现更多的病毒传播。这场疫情是一种社会秩序的非偶然的副产品，资本摆布着自然。那些致力于资本积累利润的人尽可能快地、廉价地榨取生物物理财富，而无需承担任何修复或补偿的责任，他们砍伐雨林，用温室气体破坏大气层。他们在每个时代都热衷于资本积累，但在新自由主义的支持下，他们已经释放出一连串的致命瘟疫。

在任何情况下，新冠对人类的影响都是可怕的。但是，目前危机的另一个方面让其无法估量地逐步恶化，它植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个结构性矛盾，这个矛盾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尖锐化到了极点。毕竟，资本在这个时期吞噬的不仅仅是“自然”，还有公共权力。这也是其食物的一个基本成分——在这个系统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会被消耗掉，但在过去四十年里，吞噬得特别凶猛。这就是问题所在。金融资本饕餮吞噬着政治能力，这恰恰是我们本可以用来缓解疫情传播的。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运气。早在新冠爆发之前，大多数国家都向“市场”的要求低头，削减社会开支，包括削减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和基础研究。除了一些例外，特别是古巴，他们削减了救生设备的库存（个人防护设备、呼吸机、注射器、药品和测试工具），削弱了诊断能力（测试、追踪、建模和基因测序），并缩减了协调和治疗能力（公立

医院、重症监护室以及疫苗生产、储存和分发设施)。①此外，在破坏了公共基础设施之后，我们的统治者将重要的医疗保健功能移交给了榨取利润的供应商和保险公司、制药商和制造商。这些公司在宪法上对公共利益根本不感兴趣，也不受公共利益的约束，现在控制着世界上与健康有关的大部分劳动力和原材料、机器和生产设施、供应链和知识产权、研究机构 and 人员，它们共同决定着个人和集体的命运。他们致力于保护自己的利润流，形成了一种无法抵抗的私人力量，阻止了代表人类一致的公共行动。这种影响力太令人绝望，但并不令人惊讶。一个将生死问题置于“价值规律”之下的社会体系，从一开始就在结构上准备好了将数不清的人抛弃在新冠病毒的肆虐之下。

但这还不是全部。已经疲软的公共系统的崩溃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个结构性矛盾相融合，以社会再生产为中心。护理工作一直是资本消费的主食，近年来被资本贪婪地吞噬掉了。从公共护理基础设施中撤资的同一个政权也破坏了工会，压低了工资，迫使每个家庭增加有偿工作的时间，包括初级护理人员。新自由主义把护理工作推给了家庭和社区，同时抽走了执行工作所需的精力，把资本主义破坏社会再生产的固有倾向变成了严重的护理危机。新冠的出现也加剧了这部分危机，给家庭和社区带来了大量新的护理工作，尤其是妇女，她们仍然承担着大部分无偿护理工作。在封锁状态下，儿童保育和学校教育转移到了人们的家中，使父母在不适合进行教育活动的狭窄的家庭空间里，除了承担其他负担外，还要承担这些新的负担。许多就业妇女最终不得不辞职，以照顾孩子和其他亲属，而许多人被雇主解雇了。这两个群体在重新加入劳动力市场时都面临着职位和薪酬的重大损失。第三类人享有特权，可以保留他们的工作，在家里远程工作，同时也从事护理工作，包括照顾家里的孩子，他们将多任务处理带到了新的疯狂高度。第四类人，没有严格的性别限制，他们拥有“重要工人”(essential workers)的荣誉称号，但工资微薄，基本上算是可有可无，需要每天冒着被感染的危险，以及被带回家的恐惧，以生产和分发使其他人能够在原地避难的东西。在每一种情况下，社会再生产的工作，现在因疫情而急剧扩张，主要任务仍然落在妇女身上，就

像在资本主义历史的每个阶段上一样。但是，哪些妇女最终属于哪个类别，最终取决于阶级和肤色。

同时，在国家层面上，肤色区分感染了陷入危机的政治和社会生产环节，因为许多国家的种族化人口被剥夺了获得促进健康的条件：负担得起的高质量医疗服务、清洁的水、营养的食物、安全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因此，难怪他们的成员被新冠感染和死亡的比例过高。这些原因并不神秘，它们是：贫穷和低劣的医疗保健；与压力、营养不良和接触病毒有关的已有的医疗条件；在不能远程工作的第一线工作中人数过多；缺乏允许他们拒绝不安全工作的资源；低劣的住房和生活安排，不允许有社交距离并促进传播；以及获得治疗和疫苗的机会减少。这些情况共同扩大了“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这一口号的含义，与它最初提到的警察暴力形成合力，并推动了2020年5月和6月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在明尼阿波利斯警察膝下被谋杀后，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此外，在一般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特别是在目前这个阶段，肤色与阶级深深地纠缠在一起。事实上，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正如“重要工人”这个类别所显示的那样。如果我们撇开医疗专业人员不谈，“重要工人”这一名称涵盖了移民农场工人、移民肉类包装和屠宰场工人、亚马逊仓库拣货员、美国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UPS)的司机、疗养院助手、医院清洁工、超市理货员和收银员，以及送杂货和外卖的临时工。在新冠时代尤其危险，这些工作大多是低薪、没有工会化和长期不稳定的，也没有福利和劳动保护措施。他们受到干涉性的监督和控制，几乎没有自主权，也没有晋升和获得技能的前景。妇女和有色人种从事这些工作的比例也很高。总的来说，这些工作以及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代表了金融资本主义中工人阶级的面貌。这个阶级不再是白人男性矿工、工厂工人和建筑工人的缩影，现在由护理人员、临时工和低工资服务人员组成。他们的工资低于其再生产的成本（如果有工资的话），他们被掠夺，也被剥削。新冠也揭露了这个肮脏的秘密。通过将该阶层工作的“基本”特征与资本对其的系统性贬低相提并论，新冠疫情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个主要缺陷：劳动力市场无法准确计算出工作的真正价值。

那么，总的来说，新冠是一场真正的资本主义非理性和不公正的狂欢。通过将这个系统的固有缺陷提高到突破点，它将一束刺眼的光束照在我们社会所有的隐蔽之处。把它们从阴影中拖到阳光之下，这场疫情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让所有人都能看到：资本固有的吞噬自然的动力，直到地球陷入大灾难的边缘；把我们的能力从社会再生产的真正重要工作中转移出来；它削弱了公共权力，削弱到无法解决该系统产生的问题；依赖于吞噬人们不断减少的财富和种族化的人口日渐恶化的健康为生；不仅剥削而且掠夺工人阶层。在社会理论方面，我们不可能奢求比新冠更好的教训了。但现在到了最艰难的部分：把这一教训用在社会实践中。现在是时候弄清楚应该如何饿死这头饕餮巨兽，一劳永逸地结束食人资本主义了。

1. [◎](#) 事出有因，由于美国自1962年起对古巴进行封锁，以燃料、食品、日用品到药品，美国对古巴的制裁封锁几乎覆盖了一切。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甚至阻碍古巴获取生产疫苗的原料。——编者注

阿克塞尔·霍耐特

《权力的批判：批判社会理论反思的几个阶段》

《为承认而斗争：论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

《承认：一部欧洲观念史》

《理性的病理学：批判理论的历史与当前》

《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交辩》

《正义的他者》

《时代的活体解剖：20世纪思想史画像》

南希·弗雷泽

《食人资本主义》

《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

《正义的尺度：全球化世界中政治空间的再认识》

《伤害 + 侮辱：争论中的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

哈特穆特·罗萨

《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

《不受掌控》

《危机中的晚期现代社会：社会理论能做什么？》

莱纳·福斯特

《辩护的权利：建构主义正义论的诸要素》

《正义的语境：超越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政治哲学》

《冲突中的宽容：一个争议性概念的历史、形态和当下境遇》

马克斯·霍克海默

《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

《批判理论》

《文化批判》

特奥多·阿多诺

◇ 阿多诺选集·哲学

《道德哲学的问题》

《否定的辩证法》

《美学理论（修订译本）》

《最低限度的道德：对受损生活的反思》

《黑格尔三论》

《认识论元批判：胡塞尔与现象学的二律背反研究》

《本真性的行话：论德意志意识形态》

《批判模式》

《棱镜》

◇ 阿多诺选集·音乐

《论瓦格纳与马勒》

尤尔根·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

《包容他者》

《后民族结构》

《欧盟的危机：关于欧洲宪法的思考》

《社会科学的逻辑》

《真理与论证》

《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

[美] 南希·弗雷泽 著 蓝江 译

Nancy Fraser

食人 资本主义

CANNIBAL
CAPITALISM



HOW THE SYSTEM IS DEVOURING
DEMOCRACY, CARE, AND THE
PLANET—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上海人民出版社